GIVE PEOPLE MONEY

HOW A UNIVERSAL BASIC INCOME WOULD END POVERTY, REVOLUTIONIZE WORK, AND REMAKE THE WORLD

贫穷的终结

智能时代、避免技术性失业与重塑世界

[美] 安妮·罗瑞（Annie Lowrey）◎著　万晓莉◎译



智能时代人类重塑世界还是机器取代人类？怎样避免技术性失业？
社会政策是在保障穷人还是在保护富人？怎样消除社会不公平现象？

沃尔特·艾萨克森　《史蒂夫·乔布斯传》作者
劳伦斯·萨默斯　美国原财政部长
沙姆斯·汗　哥伦比亚大学教授　《特权》作者
《纽约时报书评》《纽约客》《福布斯》《出版人周刊》《柯克斯书评》
共同推荐

中信出版集团

版权信息

书名:贫穷的终结：智能时代、避免技术性失业与重塑世界

作者:[美]安妮·罗瑞

译者:万晓莉

ISBN:9787508694894

中信出版集团制作发行

献给埃兹拉

引言

生存工资

七月闷热而潮湿的一天，我来到都罗山山顶的一处军事设施，从这里可以俯视韩国和朝鲜之间的非军事区。山顶的核心建筑用迷彩色装饰，墙上还有充满期待的标语——分裂的终结，统一的开始。一边是一个大型、开阔的观测台，这里有多个对准开城工业区的望远镜。开城工业区是韩朝之间一个特殊的区域，不久以前，朝鲜的工人在这里为韩国的企业工作，每年获取？9 000万美元的工资。一家小型的礼品店出售由朝鲜工人制作的烧酒以及涂裹了巧克力的黄豆，这些黄豆产于当地非军事区。（包装上写着：不喜欢？请寄回商品获取退款。）

另一边是一个电影院，这个电影院的座位面向的不是大银幕，而是可以观望朝鲜的窗户。前面是一个有标记的立体模型。游客在立体模型和笼罩着夏日薄雾的风景之间指点着说道，这是个旗子，这是个工厂，这是代表着主体思想（jucheinspiring）的金日成雕像。看到了吗？你能看出他的脸和手吗？

在四千米宽的非军事区，朝鲜的政治宣传音乐震耳欲聋，我不仅能听到曲调，还能听到歌词。我问导游秀真（Soo-jin）这首歌唱了什么，她说："老一套，韩国人是美国人的工具，朝鲜会把我们从资本主义的奴役中解放出来。"看着我们面前光秃秃的土地，让人感到异常伤感，脚下未完成的朝鲜通往韩国的隧道以及朝鲜特意建在观景台视野内的波将金村（Potemkin Village）注也都似乎有种难以名状的悲伤。朝鲜坚称这个村子里有200户居民，他们都在一个集体农场工作，共同使用村里的儿童保育中心、学校、医院等设施。但是首尔方面称，已经证实没有人在那里生活过，那些建筑里空无一人。朝鲜的同志会把灯打开、关闭，制造有居民生活的假象。朝鲜人将这里称作"和平村"，而秀真称之为"宣传村"。

面前和身后鲜明的对比让我和几个一起旅行的成员潸然泪下。在这个世界上，可能没有其他地方比这里能够更好地展现我们在政府政策方面的选择会带来的生死攸关的影响。不到一个世纪以前，这两个国家曾是一体，两国人民有共同的政体、统一的经济。但"冷战"时期意识形态方面的对抗将这个整体撕裂，拆散了无数家庭，给两国留下了伤疤。秀真毫不讳言地将朝鲜与韩国的分离称作"我们国家的悲剧"。

大韩民国——韩国——从第三世界迅速崛起，加入了第一世界的行列，成为战后少数几个完成这种转变的国家之一。在朝鲜半岛分裂大约15年之后的1960年，韩国人民的财富状况与科特迪瓦和塞拉利昂人民相当。而到了2016年，他们的收入水平已经接近曾殖民韩国的日本。花旗集团（Citigroup）预计，到2040年，韩国将成为全球最繁荣的国家之一，从某些方面来看，甚至可能会比美国还要富有。

然而，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一直风雨飘摇，遭受失败，自20世纪90年代以来尤其如此。对于一个国家而言，这样惨淡的增长模式往往伴随着自然灾害或战争的摧残。就在几年前，朝鲜大概还有40%的人口生活在极端贫困之中，是苏丹极端贫困人口数量的两倍多。如果爆发战争，朝鲜极端贫困人口的数量将不可避免地继续上升。

雾气笼罩中的观景台被铁丝网包围，无精打采的年轻士兵手持突击步枪在巡逻，从这里也能看出韩朝两国显而易见的差异。你可以看到，我也可以看到。在边界处，韩国境内森林郁郁葱葱，平整的公路交错分布。到处可见电线、火车、码头和高层建筑。朝南行驶一个小时就到了首尔。这座国际大都市像巴黎一样富有文化底蕴，基础设施状况远超纽约和洛杉矶。边界以北的朝鲜见不到树木。秀真告诉我，这边的树木都用作柴火和基本的建筑材料了。道路空旷而单调，建筑物矮小，居民也是如此：由于营养不良影响了成长，现在朝鲜人比他们的韩国同胞矮很多。

韩国和朝鲜的差异十分有力地证明：那些我们往往视作经济环境的许多因素，其实在很大程度上都是政策的产物。事情的现状是我们以前所做选择的结果。反事实的情况一直都有，也许不像在韩朝的非军事区那样明显，但它确实存在。

* * *

想象你的信箱或者银行账户每个月都出现一张支票。

这笔钱足够维持生活，但只能勉强度日。它也许可供负担合租公寓的一个房间、食物或公共汽车费用。如果你刚从监狱出来，或者需要离开施暴的配偶，又或者无法找到工作，这笔钱能够让你不至于一无所有，但是远不足以让你过上富足的生活。假设你可以用这笔钱做任何你想做的事，而且不附带任何条件。你可以用它支付账单，可以用它去上大学，或者把它存起来付房子的首付。你可以把它花在酒和香烟上，也可以用来支撑你在妈妈的地下室度过一生，每天玩糖果粉碎传奇（Candy Crush）[注]，在网络上打发时间。你还可以辞去工作进行艺术创作，投身慈善事业，或者照顾一个生病的孩子。让我们继续假设，你不需要做任何事情就能得到这笔钱。只要你活着，这笔钱每个月都会出现，月月如此，你不需要处于某个

特定的年龄，也不需要有孩子或者有住所，或者保持无犯罪行为的记录。你会自然而然地得到它，其他人也是如此。

这个简单、激进、巧妙的方案我们称作全民基本收入（Universal Basic Income，简称UBI）。它是覆盖全民的，国家或社会的每一位成员都会得到这笔收入。它只够维持基本生存，起不到更大的作用。

这个想法非常古老，它源自英国都铎王朝时期和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的论著。在过去500多年，这个想法像一个奇怪的思想漂浮物，一次次被海浪冲上岸，而且往往发生在经济革命的浪潮之中。过去几年里，中产阶级遭到压榨，民众对政府的信任度不断降低，科学技术快速发展，“共享”（Uberized）趋势越来越盛，关于用货币消除贫困的研究日益增多。这些变化使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格外引人关注，甚至在有些地方几乎从遥不可期的设想变成了现实。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希拉里·克林顿（Hillary Clinton）、“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比尔·盖茨（Bill Gates）、埃隆·马斯克（Elon Musk）等都曾提到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想法，并且热衷和支持这个概念。德国、荷兰、芬兰、加拿大和肯尼亚等国家正在启动或者已经开始了全民基本收入的试点，印度也正在计划当中。一些政客试图让美国加利福尼亚州通过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瑞士也就这个话题展开了全民公决，尽管最终并未通过，但民众对这个提案的认可度超出了活动人士的预期。

为什么要进行如此重大的政策变革，从根本上改变社会契约、安全网络以及工作的性质？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们给出了令人眼花缭乱的理由——从女权主义到环境政策，从政治理念到工作激励以及种族主义。

支持全民基本收入最突出的观点是技术性失业，这种观点认为，在未来，机器人将很快夺走我们所有的工作。牛津大学（Oxford University）的经济学家估计，美国有大约一半的工作，包括数百万个白领的岗位，都很容易由于技术进步而消失。分析人士警告说，卡车司机、仓库打包工人、药剂师、会计师、法律助理、出纳、翻译、诊断医生、股票经纪人、房屋估价师等众多职业都将面临哈米吉多顿（Armageddon）[注]般的世界末日。这种观点认为，在对人力工作的需求不大的世界，必须要有全民基本收入确保人的生存。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曾担任服务业雇员国际工会（Service Employees International Union）的主席，他说道，“并不是说我了解未来，或者将来一定会是这样”，但是如果“海啸即将来临，也许我们当中该有人看看周围是否有可以抵挡暴风雨的防风舷窗”。

另一种比较常见的观点不那么投机，更关注于当下而不是未来的问题。它强调了全民基本收入可以缓解美国和其他高收入国家日益严重的收入不平

等和工资增长停滞的问题。中产阶级正在萎缩。从经济增长中获益的是富人的经纪账户，而不是穷人的钱包。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声称，对于顶端的20%以外的家庭而言，全民基本收入是直接的收入支持。它也将极大增加工人的谈判筹码，迫使雇主提高工资和福利，改善条件以便留住人才。如果你每个月都有稳定1 000美元稳的收入，为什么还需要时薪7.25美元的差劲工作呢？美国经济安全项目（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新成立的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智库——认为，“在一个财富充溢的时代，没有人应该生活在贫困当中，中产阶级也不应该面临停滞和焦虑的未来”。

此外，在美国，甚至在全世界，全民基本收入都可以成为消除贫困的有力工具。截至2016年底，约有4 100万美国人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每月1 000美元的收入足够让他们当中的很多人摆脱贫困，并将确保美国成为有史以来最富有的国度，没有人会因为施暴的伴侣、疾病、自然灾害或者突然失去工作而陷入贫困。这一观点在低收入国家更有说服力，许多政府已经开始提供部分的、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cash transfer），以此降低贫困率。一些政策制定者和政党对这种举措的结果非常满意，正在考虑全面施行全民基本收入。在肯尼亚，一个名为“直接捐助”（Give Directly）的美国慈善机构正在开展一个试点项目，计划在十多年的时间里，给数千名成年人每月发放约20美元，以此来探索全民基本收入如何以低廉的成本大规模地终结贫困。“直接捐助”的联合创始人之一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e）告诉我说，“如果我们愿意，我们现在就可以消除极端贫困”。

一些自由主义倾向的支持者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有力而且高效地终结贫困。用全民基本收入取代目前美国的国家福利体系，这将消除官僚主义，减少政府对公民生活的干扰：你好，全民基本收入！拜拜，卫生与公众服务部（Departments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住房及城市发展部（Housing and Urban Development）、社会保障事务管理总署（Social Security Administration）、数不清的国家和地方办公室、农业部（Department of Agriculture）的绝大部分！中右派（right-of-center）智库美国企业研究所（American Enterprise Institute）的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说：“直接给人钱是一种很自然的解决办法，就像切断“戈尔迪之结”（Gordian knot）(注)一样，我们面临的问题不需要更复杂的解决方案。”

防止机器人带来世界末日，为工人提供讨价还价的筹码，促进中产阶级的发展，消除贫穷，使政府更加精简，听起来非常不错，对吧？但全民基本收入意味着政府每个月会给每个公民一笔钱，而且不管面临什么情况都要如此。这将不可避免地引发许多关于公平、政府支出和工作性质的问题。

当我第一次听到这个想法时，我担心它会对工作产生影响。每月收到一张1 000美元的支票可能会刺激数百万人退出劳动力队伍，获得应税收入的美国劳动人员越来越少，而政府却要将税收所得分配给越来越多不参加有偿劳动的人。美国最大的资产——美国人民——将丧失大部分的创造力和生产力。更重要的是，如果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来防止技术性失业，相当于放弃了美国劳动人员，只给他们钱，而不努力探索如何让他们融入活跃的技术型经济。不同政治立场的经济学家都表达了类似的担忧。

而且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将会带来沉重的代价。假设我们希望每个月给每个美国人1 000美元现金。粗略计算，每年将支出大约3.9万亿美元，加上政府已经负担的其他支出，这意味着联邦政府的总支出将增加一倍多，这也许就要求税收相应增加一倍。这可能会使经济放缓，并导致富裕的家庭和大公司出走海外。即使用全民基本收入取代社会保障（Social Security）和其他许多消除贫困的项目，政府每年仍然需要增加数千亿美元的支出。

再退一步讲，全民基本收入真的是稀缺资源的最佳使用方式吗？增加税收，给像马克·扎克伯格和比尔·盖茨这样的人，同时还有所有工薪阶层家庭、退休人员、孩子、失业人员等每月1 000美元，这样做是否真的有意义？向富人征税，再通过医疗补助计划（Medicaid）[注]和食品券（food stamp）[注]等基于受助对象经济情况的措施给穷人提供帮助，这样会不会更有效率？即使在“社会主义”的北欧国家，政府的支持一般也有一些具体情况的要求。此外，在美国和其他一些国家，许多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家庭每人每月从政府获得的收入已经远远超过1 000美元。如果全民基本收入取代了食品券和住房券（housing vouchers）等项目，是否能够保证全民基本收入比当前的系统更加公平有效？

还有一些对全民基本收入更富哲学性的反对意见。在世界上，除了王子、公主和像阿拉斯加（Alaska）这样盛产石油的地区的居民之外，没有任何一个国家或社会的居民拥有与生俱来自动获得某种东西的权利。为什么我们要无条件地给人钱呢？为什么不要求获得这些钱的人提供社区服务或者至少尝试去工作呢？美国人难道不是相信自力更生的吗？难道要靠施舍生活吗？

作为一名在华盛顿报道经济和经济政策的记者，我听到了所有这些支持和反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意见，看着一个模糊的、从来没有尝试过的想法成了全球性的现象。在我的职业生涯中，我还是头一次看到一个社会政策构想像病毒一样迅速传播。谷歌的数据显示，2011—2016年，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搜索热度增加了超过一倍。在2005年左右，新闻报道中极少提及全民基本收入，但此后便一发不可收拾，这个概念出现在著作里、会议中，

出现在与政治家的会谈、与进步人士和自由主义者的讨论中，还出现在了餐桌上。

我敏锐地发现了这一现象，进行了报道。我报道了瑞士那次失败的全民公投，以及加拿大的一项基本收入实验，这个实验为全民基本收入的辩论提供了证据；我采访了硅谷的投资者，他们对没有工作的未来、乘坐无人驾驶汽车感到恐惧。我不禁好奇，不知道多久以后人工智能才会威胁我的工作；我与国会两党成员讨论了衰败的中产阶级以及美国是否需要一个新的、宏大的再分配政策来扭转这种困境；我和欧洲痴迷全民基本收入的知识分子喝了啤酒；跟国会助手们进行了交流，他们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是2020年总统大选的一个热点；我还与倡导者们展开了讨论，他们坚信，在未来十年，全世界数百万人每月都会有稳定的收入，否则他们就会成为痛苦不堪的不稳定型无产者（precariat）；我还了解了哲学家们的看法，他们认为我们对工作和社会契约的理解以及我们经济的基础将经历一次划时代的变革。

对全民基本收入了解得越多，我就越是痴迷于这个想法，因为它在经济和政治方面引发了许多十分有趣的问题。美国的自由主义者、印度的经济学家、“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中的抗议者、硅谷的科技大佬们，这些人想要的东西真的一样吗？对每天生活费用只有60美分的肯尼亚村民和瑞士最富有的州的居民实施相同的政策，这样做是否正确？全民基本收入是解决问题的良方，还是没有实际作用的空谈？我也有几个哲学层面的问题：我们应该给家庭主妇等无偿照料他人的人发工资吗？美国如此富裕，我们为什么还能容忍儿童贫困？我们的社会安全网络是否有种族主义倾向？机器夺走人类工作的世界末日究竟是什么样子？

我着手写作这本书，主要不是为了描述一个迅速发展的国际政策运动，也不是为了倡导一个想法，而是为了回答上述这些问题。为了创作这本书，我进行了广泛研究，我前往遥远的肯尼亚村庄；到印度最贫穷的邦，参加了一场季风时期举行的婚礼；我拜访了无家可归者的收容所，还去了参议员的办公室；我采访了经济学家、政府官员、自给自足的农民和哲学家；我去韩国参加了全民基本收入的会议，见到许多支持这一想法的重要倡导者和深刻的思想家，和他们一起站在非军事区，看着我们的政策选择会带来多么可怕而深刻的影响。

我渐渐相信，全民基本收入这个宏大的构想遵循了普遍性、无条件性、包容性和简单性的原则，全球的决策者们如果能理解和实施这些原则，无论是通过每月现金补贴还是其他的方式，结果都会大有裨益。最终我发现，全民基本收入是一项技术性政策建议，也是一种社会思潮。它所坚持的是，每个人都应当有参与经济的权利、有选择的自由，都能过上不受贫困折磨的生活，而政府可以也应该提供这些权利和自由。

这本书分为三个部分。首先，我们将考察全民基本收入与工作的问题，然后讨论全民基本收入和贫困问题，最后是全民基本收入和社会包容问题。在本书末尾，我们将探索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前景、潜力和设计。我认为思考这种复杂、独特、具有变革性的政策可以让我们受益匪浅，我希望你们也能有所收获。

---

1. 波将金村系出自一个俄罗斯历史典故，代指弄虚作假、装潢门面的建设。——译者注
2. 糖果粉碎传奇，一款微策略消除类手游。——译者注
3. 哈米吉多顿是基督教《圣经》所述世界末日之时善恶对决的最终战场。——译者注
4. 戈尔迪之结，出自古希腊传说，指难以解决的问题。——译者注
5. 医疗补助计划，美国政府给符合条件的低收入或贫困家庭和个人提供医疗补助的制度。——译者注
6. 食品券，美国政府向低收入者发放的用于换取食物的凭证。——译者注

第一章
技术性失业

北美国际汽车展（The North International Auto Show）是一场隆重、热烈的盛会。在每年最惨淡的一月，汽车制造商前往汽车之城底特律（Detroit）向行业人士、新闻界和公众展示他们最新款车型、技术和概念车。每个汽车制造商都在昏暗的、铺着地毯的科博中心（Cobo Center）占据一个角落，他们把这个角落打造成类似游戏节目现场的样子：聚光灯、走秀、灯光展示、衣着暴露的女性，还有一辆又一辆的汽车，其中好多汽车都陈列在旋转着的巨型转盘上。在最近的一次展览中我逛了几个小时，体验了很多新车型，并与汽车制造商的高管和销代表交谈。我坐在一辆像鲨鱼一样线条流畅的SUV（运动型多用途车）里，这辆车仪表盘上的按钮、装置和标度盘被科幻小说里才会出现的虚拟驾驶座舱所取代。有一辆流线型的赛车底盘很低，我必须蹲下身才能进入。车展上还有一辆又一辆无人驾驶汽车。

这个展览给人不同程度的惊艳，有的展品非常炫酷，有的让人直呼“我的天哪”。例如，一辆巨大的福特卡车配备了一个加强了马力的巡航控制系统，能够在遇到行人时自动刹车，并在交通拥堵时自动决断是停下还是继续行驶，这样就“没有必要一直踩着踏板”，当我握着超大尺寸的方向盘时，一位代表这样对我说道。

另一边是一辆大众的概念车，看起来就像一辆给外星人开的嬉皮士大篷车。这种小型巴士没有车门碰锁，只有传感器。车子没有油箱，只有一个充电接口。在完全自动驾驶模式下，仪表盘会把方向盘收起来，然后众多的激光、传感器、雷达和摄像头开始驾驶车辆。驾驶员和前排乘客可以将座椅朝后转，将小型巴士变成一个舒适的太空时代起居室。大众公司的设计总监克劳斯·比绍夫（Klaus Bischoff）宣称这是“未来的汽车”。

这是我在底特律反复听到的几句话：我们正在研发未来的汽车，未来的汽车就要来了，未来的汽车已经出现了。我渐渐明白，汽车市场正在快速由自动化到自主化，再迈向无人驾驶。大量汽车已经具备了许多辅助驾驶的功能，包括先进的巡航控制、倒车提示、车道保持技术、紧急制动、自动停车等。综合其中的一些功能，再加上先进的传感器和几千行的代码，你就能得到可以从出发地自行驾驶到达目的地的自动驾驶汽车。很快，汽车、卡车和出租车都将可以在完全没有司机的情况下行驶。

无人驾驶技术仅用了15年就达到了传统汽车60年的发展成果。早在2002年，美国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Defense Advanced Research Projects Agency，简称DARPA）就宣布了一项“重大挑战”，邀请多个团队参与制造自动驾驶汽车，并在从加利福尼亚州（California）的巴斯托（Barstow）到内华达州（Nevada）普里姆（Primm）之间142英里（约228.53千米）的沙漠路线上竞赛，获胜者将赢得百万美元大奖。在这场盛大的赛事中，没有任何一辆参赛汽车跑完了全程，甚至没有任何一辆接近终点。但是巨额的奖金和围绕这一事件的宣传激发了一股投资和创新的浪潮。国防部高级研究计划局的斯科特·瓦德（Scott Wadle）中校说道：“那次竞赛创造了一个由创新者、工程师、学生、程序员、越野赛车手、机修工、发明家和梦想家组成的群体，他们聚集到一起，通过努力解决困难的技术问题来共同创造历史。……他们带来的新思维引发了随后几年自主式地面车辆技术的重大进展。”

随着这些科技更可靠、更安全、更便宜，并且随着政府法规和保险市场逐渐接纳适应它们，越来越多的人将能够体验这些科技。在车展上，谷歌旗下自动驾驶汽车公司Waymo的首席执行官约翰·克拉夫奇克（John Krafcik）展示了一辆完全自动驾驶的克莱斯勒太平洋（Chrysler Pacifica）厢式旅行车。他说道：“我们最近实现了一系列创新，这让我们距离数百万用户每天使用我们的技术这一目标更近了。”他讲述了在短短几年之内，帮助引导汽车的三维光探测雷达的成本如何降低了90%。宝马和福特等公司也表示，他们的自动驾驶科技产品将很快进入市场。丰田高管桑迪·洛本斯坦（Sandy Lobenstein）在底特律发表讲话时说道：“汽车技术的数量呈指数增长……汽车正在转变成未来学家长期以来梦寐以求的交通手段。”没有出租车司机的出租车，没有卡车司机的卡车，无人驾驶、定好目的地就可以在车里睡觉的汽车，这些正在向我们走来，并随之会威胁数百万工作岗位。

在密歇根州那个令人沉闷的一月，自动驾驶技术带来的兴奋是显而易见的。国内汽车产业在经济大衰退（Great Recession）时期几乎遭受了灭顶之灾，尽管在随后几年里，汽车产业强劲复苏，但美国人购买的汽车仍然没有20世纪90年代和21世纪最初十年那样多，一部分原因是美国人开车少了，还有一部分原因是新车的主要消费群体——年轻人——仍然资金匮乏。分析师们因此兴奋地将自动驾驶描述为汽车行业的“淘金热”。很多人认为，自动驾驶汽车将大大扩展全球市场。汽车制造商预计，到2035年，全球每年将售出1 200万辆汽车，销售额达到800亿美元。

但对许多人来说，无人驾驶汽车的繁荣似乎并不像有利的刺激，也不是翘首企盼的未来的最终实现，而更像是一种会导致灭绝的威胁。很多工业生产场地已经在使用无人驾驶和自动驾驶车辆，想想那些场地的工人的命

运，他们眼看着机器人开始取代自己的同事。在接受加拿大广播公司（Canadian Broadcasting Corporation）采访时，代表加拿大油砂工人的当地工会分会会长肯·史密斯（Ken Smith）说，“卡车不需要养老金，也不会休假。这是纯粹的经济利益问题”。这场“技术变革引发的失业潮将会导致严重的后果”。

面临这种威胁的不仅是挖掘现场的卡车司机，还有校车司机、市政公交车司机、穿越全国的巴士司机、送货司机、豪华轿车司机、计程车司机，长途卡车司机和港口工作人员等。甚至还可以算上那些运送货物的建筑和零售工作人员，以及送比萨的孩子。奥巴马担任总统时，白宫曾估计，自动驾驶汽车可能会减少220万~310万个就业岗位。自动驾驶汽车并不是唯一可以大幅减少人力工作需求的技术。现在的卡珊德拉（Cassandras）们警告说，所有的工作都面临着消失的风险。

如果你最近听说过全民基本收入，那很有可能是因为这些无人驾驶汽车以及对技术性失业问题的强烈关注。例如，特斯拉（Tesla）的埃隆·马斯克就认为交通运输行业的大规模自动化即将到来。他在2017年迪拜世界政府峰会（World Government Summit）上说道：“20年的时间不长，却将使12%~15%的劳动力失业，我们将别无选择。”当他说到全民基本收入时，表示“这将十分必要”。

在底特律，这种风险有着不祥的真实感。当我徘徊在科博中心的大厅里，与硅谷的技术投资者交谈时，我想知道的不是自动驾驶汽车和其他先进技术是否会让人失业，而是它们什么时候会让人失业，以及接下来还会发生什么。美国似乎完全没有为失业的世界末日做好准备。在非凡的科技奇迹改变我们的生活和整个世界的时候，全民基本收入提供了一种确保生计、支撑中产阶级以及防止贫困的方式。

* * *

科技对人类和世界的改变可以追溯到矛、网和犁。人类发明机器让生活更轻松，机器减少了对人力劳动的需求；人类发明汽车，汽车使马车夫和蹄铁匠退出了历史舞台；人类发明机器人生产汽车，机器人使工人失业；人类发明自动驾驶汽车，自动驾驶汽车使卡车司机失去工作。描述这种现象的经济术语叫作“技术性失业”，它是一个已知的常量。

在离车展不远的地方，我们就能看到发明的奇迹如何与失业的悲剧相伴相随。只要看看车展的主办城市就一目了然。在20世纪上半叶，一支小型军队，或者坦率地说，需要一支一定规模的军队，才能充分满足人们对汽车的需求。20世纪50年代，汽车制造商三巨头——通用汽车（GM）、福特（Ford）和克莱斯勒——仅在密歇根（Michigan）就雇用了超过40万人。

而现在只需要约16万名汽车雇员。当然，境外生产和全球化对美国汽车行业的就业产生了重大影响。但是，技术发展和生产一辆汽车所需的时间缩短也是至关重要的因素。由于工作总量减少，加上该地区基本没有其他的繁荣产业，因此底特律的人口自20世纪50年代以来下降了一半以上，税基遭到严重削弱，并使这里很多装饰艺术（Art Deco）和后现代风格的建筑关闭和闲置。

更广泛地说，美国制造业的衰退使铁锈地带（Rust Belt）注、南方的部分地区以及新英格兰（New England）地区都受到了猛烈冲击。1979年，美国有1 960万个制造业岗位。截至2017年，制造业岗位数量大约为1 250万个，而美国人口数量增加了将近1亿。因此，“二战”后，在美国所有地区当中，中西部制造业圣地的经济发展情况最糟糕，其整体就业率从20世纪50年代的约45%下降到2000年的27%。

即使有这样严重的痛苦和混乱，经济学家仍然将技术变革造成的失业看作是良性进程的必要部分。一些工人饱受煎熬，有些地方衰败了，但整体经济仍在蓬勃发展。机器淘汰的工作往往工资低、危险性高、价值低。而机器创造的工作往往工资高、危险性低、价值高。经济淘汰了低劣的工作，同时创造了新的更好的工作机会。工人也会做出调整，即使这并不容易。迁移是他们进行调整和适应的一种方式。例如，数百万工人离开底特律和铁锈地带，投身西南部蓬勃发展的服务型经济或者墨西哥湾（Gulf of Mexico）的石油经济。他们还通过转换行业来进行调整。在去底特律的路上，我突然像汤姆·弗里德曼（Tom Friedman）一样，问送我去巴尔的摩（Baltimore）机场的来福车（Lyft，打车应用软件）司机如何看待来福公司转向无人驾驶汽车的计划，如何看待他可能很快失业。他承认“这很让人担心，但是我正在考虑接受一些教育培训，成为为他们服务的人。你没法把无人驾驶汽车开进店里让那些习惯了旧车型的人来修理，他们需要一位了解软件的技术人员”。

从表面上看，无论内部有多少的痛苦和混乱，经济都会继续增长、繁荣。尽管20世纪的技术进步令人惊叹，但参加工作的美国人的比重却上升了。劳动力市场容纳了许多从制造业转移出来的工人，并让数千万女性和数百万移民加入工作行列。制造业提供的就业岗位从美国就业总量的1/4以上减少到只有10%，却并没有出现大规模失业现象。当农业所雇用的劳动力从40%降低到仅仅2%的时候也没有出现这种现象。

“机器即将消除对人类工作的需求”这一想法已经存在了很长一段时间，而且一再被事实否定，已经可以获得“勒德谬误”（Luddite fallacy）或“劳动合成谬误”（lump-of-labor fal-lacy）的绰号。在19世纪初，诺丁汉（Nottingham）纺织工人砸毁了织布机，要求获得更好的工作和更高的工

资。在大萧条（Great Depression）时期，凯恩斯（John Maynard Keynes）推测，到2030年，科技进步会让人们不必再在办公室、农田或者工厂长时间地辛苦工作。1964年，包括三名诺贝尔奖得主在内的一群公共知识分子活动家警告白宫“计算机与自动化的自我调节机器相结合”将导致“一个贫穷、缺乏技术、没有工作机会的国家”。三次预测，三次失误。正如经济学家亚历克斯·塔巴洛克（Alex Tabarrok）所说：“如果勒德谬误是真的，我们早就都失业了，因为生产力在两百年内一直在提高。”

尽管如此，我一次又一次听到有人说：“这次是真的。”奥巴马总统在告别演说中表示：“导致下一波经济混乱的不是其他国家，而将会是消除大量优质中产阶级工作岗位的自动化进程。”杂志封面、书籍和有线新闻等都警告称，机器人不仅会取代卡车司机，还会淘汰华尔街交易员、医院诊断人员和仓库工人等。

有一些说法认为，真正的问题在于技术发展没有像以前那样创造就业，反而以更快的速度减少了大量工作机会。这种长期存在的关于技术性失业的担忧现在变得更加强烈：科技进步可能会提高生活水平并降低商品和服务的价格。但是，如果你没有工作，你的邻居也没有工作，而你所在的城镇在四年内第三次削减学校预算，那么拥有自动驾驶汽车又有什么好处呢？要是机器发展到了非常先进的水平，已经不再需要人类，那又该怎么办呢？

对于这种观点，底特律就是一个典型的案例。汽车产业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技术变革，从机械装置到超级计算机，这次变革可能彻底改变交通运输的方方面面。高达数十亿美元的资金被用来向消费者和企业推销无人驾驶汽车。然而，这项革命性技术创造的就业机会也许只有几万个。机器不仅在驾驶汽车，还在设计和制造汽车。这种现象在美国十分普遍。实体零售巨头沃尔玛（Walmart）在美国拥有150万名员工，而2017年第三季度时，网络零售巨头亚马逊（Amazon）的雇员仅为沃尔玛的1/3。正如著名未来主义者杰伦·拉尼尔（Jaron Lanier）所说，柯达（Kodak）在巅峰时期雇用了约14万人，而照片墙（Instagram）注在被脸书（Facebook）收购时只有13名员工。

更可怕的是，越来越多的工作正在科技进步带来的淘汰潮中消失。研究发现，美国有将近一半的就业机会因自动化而消失，世界其他国家和地区也将面临同样的担忧。土耳其、韩国、中国和越南等国家经历了高速经济增长，这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工业化的发展。工厂需要数百万人来操纵机器、缝制服装以及生产电子产品。但是现在，机器人生产成本急剧下降、技术更新速度不断提高，这很可能会中止甚至彻底切断这种传统的创造就业的渠道。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丹尼·罗德里克（Dani Rodrik）警告说，“过早去

工业化”（premature deindustrialization）可能会让低收入国家提前进入服务型经济，却没有有能力购买服务的中产阶级。如果这样，韩国和其他国家实现快速经济增长所借助的途径就会消失。易贝（eBay）的亿万富翁资助了非营利基金会奥米迪亚网络（Omidyar Network），该基金会的麦克·库布赞斯基（Mike Kubzansky）对我说，“如果各国不能再遵循东亚增长模式摆脱贫困”，那么这种转变可能“具有毁灭性”。大规模失业可能会先冲击高收入国家，但它对发展中国家造成的伤害或许才是最大的。

然而，21世纪的技术性失业问题或许更可怕，它可能不仅是过去发生的变化的升级，还是一种截然不同的颠覆，这种颠覆让智能计算系统自我提升，不再需要人类的劳动。

* * *

脸书有一个人工智能专家团队，他们研发软件来识别和标签照片中的面孔、处理客户服务投诉、分析用户数据、识别辱骂或威胁性的评论等。这个名为脸书人工智能研究的团队（Facebook AI Research，简称FAIR）的任务之一就是编写程序，创造自动聊天机器人来负责协商工作，比如预订餐厅等。预约一家意大利餐厅涉及的变量相对较少，而且这些变量大多是固定的。机器能帮助预订星期二晚上8点四个人的餐厅，但不能完成其他需要精湛谈判艺术的协商任务，比如停止铀浓缩换取金融制裁的缓和，或者达成支付计划不同的新合同，争取更好的退休待遇或者投票快速行权。在这些案例中，就像生活中大多数情况一样，谈判既是一门艺术，也是一种科学。它需要评估特定事物的价值，而且很多时候，事物的价值难以确定。还需要发现和化解冲突，解决信息不对称的问题。这样的谈判更需要心智理论（Theory of Mind），就是说谈判时要明白谈判桌另一边的人有与你不同的动机和资源，这一点计算机难以做到，而人类却十分擅长。

脸书聊天机器人最初执行一些简单的、公式化的谈判，比如索要两个物品，最终同意只要一个。然后，聊天机器人开始分析大量数据，并试图提高和强化找出解决方法的能力，换句话说就是自己教自己。它开始假装对低价值的物品感兴趣，然后在后来的谈判中舍弃这个物品。脸书研究人员指出：“这种行为不是研究人员编程设定的，而是机器人自己发现的，想以此实现它的目标。”人工智能还开始自己回应客户的报价，舍弃了工程师们编写的公式化的应答。

人工智能在短时间内取得了快速的发展，很快就要通过图灵测试（Turing test）注。脸书的研究人员指出，“大多数人没有意识到跟他们对话的其实是机器而不是真人，这表明机器人已经学会了用英语流利地对话”。最优秀的机器人与人类谈判员的表现不相上下。“它（机器）达成的交易好

坏各一半，这表明脸书人工智能研究团队的机器人不仅会说英语，还能智能地思考该说什么。”

也许这个实验最引人注目的结果是原本按照程序设计用英语来沟通的机器人，最终竟然开始用自己的语言彼此谈判：

鲍勃：我可以，我，我其他什么都……

爱丽丝：球没用对我来说，对我来说我对我来说我对我对我来说

鲍伯：你，我，其他所有……

这种对话在人类看来肯定非常愚蠢。但是我深深地被这种先进、卓越的科技，被这些机器人的智能性、创造性、适应性所震撼。机器人觉得用它们简略的表达方式交流更加快捷有效，于是他们就这么做了。他们拓展了自己的能力，不断学习，不停地教自己，不仅从事简单的谈判，还要做更复杂的、几乎与人类一样的谈判。一位工程师对《快公司》（*Fast Company*）说：“机器人舍弃了人类可以理解的语言，发明了自己的代码语言。就好比我说五遍‘这个’，你会明白我想要五件某个东西。机器人的这种表现跟人类创造简略表达没有什么不同。”（在机器人创造了自己的语言，不使用英语之后，脸书将它们关了。）

脸书谈判机器人展示了为什么那么多未来主义者、技术专家、经济学家都担忧技术发展会破坏就业。直到现在，都是人类在实现技术创新，制造更先进的机器，逐步提升电脑功能。但是，人工智能、神经网络和机器学习等使机器人能够自我提升。在过去几年中，这些科技进步带来的不仅仅是无人驾驶汽车技术的突飞猛进。谷歌翻译（Google Translation）在口译方面取得了显著的进步。苹果（Apple）公司的Siri注和亚马逊的Alexa注这样的虚拟助手也得到飞速发展。计算机系统已经比医生更擅长发现癌症，比交易商更擅长在不同的投资之间转移资金，还能比实习生更好地完成日常法律事务。

无论是撰写摘樱桃的合同，还是使用优步（Uber），或者用养老金投资，随着机器人技术的突飞猛进，几乎所有可以被分解的工作都可能会被机器人夺走。软件开发人员马丁·福特（Martin Ford）在《机器人时代》（Rise ofthe Robots）中写道：“通过研究你过去一切行为的详细记录，另一个人是否能够通过学习完成你的工作？又或者，就像学生通过多次训练来备考一样，通过重复你曾经完成的任务，其他人能否娴熟地完成你的工作？如果可以的话，那么很可能未来某一天，算法会学习并完成你的一部分甚至

全部的工作。”最近一项研究让专家预测人工智能何时在某些工作上超越人类。这些专家预计，机器人会在2024年在翻译上打败人类，到2026年在写作高中散文上超越人类，2027年取代人类驾驶卡车，2031年夺走零售业工作，2049年写作畅销书（心痛！），2053年做外科手术。这项调查的作者们写道：“研究人员认为，人工智能有50%的概率将在未来45年内超越所有人类的工作，在120年内使所有人类工作自动化。”

这个前景令人振奋，同时也令人担忧。我们的经济和生活将会经历革命性的变化。一切都将始于创造、创新和投资。商家提供最新的软件和硬件，企业购买这些产品，取代费用高昂、反复无常、难以培训的人力。简单重复的任务构成的工作将率先消失。但是，人工智能显然是智能的。随着时间的推移，商业企业将开始销售像人类一样，甚至能够比人类更好地进行沟通、谈判和决策，并执行复杂任务的科技产品。而且这些技术产品将不断改进，并且会日益廉价。想做广告宣传的企业会发现，人工智能测试和制作的标语、电视广告的效果更好。银行将开始用算法代替贷款专员。合同、保险、税务准备等任何与文书相关的工作都会消失。就像脸书机器人鲍勃说的那样：“我可以，我，我其他什么都……”

如果人工智能发展到足够先进，监管也允许的话，教育和健康这两个行业可能会经历巨变。人们通常认为，这两个规模庞大、不断扩展的就业领域不容易出现生产力的提高和技术性失业。资金紧张的州和地方政府可能会让学生在家上学，使用学校董事会批准的聪明的、交互式人工智能系统进行学习和考试。大型医院已经开始使用国际商业机器公司（IBM）的沃森（Watson）技术帮助医生进行诊断，很快他们将淘汰医生，转向远程医疗、图像诊断和自动护理。小型自动控制机器人会开始冲洗鼻窦或者切除痣。保险公司也许会鼓励患者使用人工智能系统，而不是咨询真人医生。病人可能会将人类医生看作容易出错的屠夫。用经济学家的术语来说，人工智能和自动化的发展可能会最终解决“鲍莫尔成本病”（Baumol's cost disease）。

当然，有些工作永远不可能外包给计算机或机器。幼儿园仍然需要护理人员照顾幼儿。灵气治疗（Reiki healing）、作为推选出的代表为社区服务、担任公司总经理、档案研究、写作诗歌、举重教学、艺术创作、谈话治疗等工作似乎不可能由机器来完成。但想象一下这样一个世界：商店雇员、货运司机和白领官僚都大幅减少；每一次衰退之后的复苏都伴随着失业，企业越来越精简；几乎所有学位都毫无用处，高文凭不能带来高工资；数百万工作机会永远消失。

当然，有些人会在这个世界上生存甚至繁荣。用机器代替工人的企业通常会更有竞争力，能获得更丰厚的利润。股票市场可能会繁荣起来，股东、企业家、专利持有者等的收入和财富会飙升。财富和收入会日益集中到越

来越少的人手中。已经非常严重的不平等现象会愈演愈烈。

但是除了资本以外，那些劳动力要怎么办呢？那些在这场赢者通吃的赌局中失败的人呢？那些发现学历再无价值、就业市场竞争日益残酷的人呢？他们对经济贡献的价值会减少，甚至可有可无，因此他们会挣得更少，工资水平停滞不前。失业期将持续更长时间，流动性一直处于低水平。可以肯定的是，生产率的提高和新技术的发展将从很多方面大大改善普通人的生活。娱乐活动会超乎想象，令人眼花缭乱：精彩的电子游戏，逼真的人工智能模拟器，免费或廉价的电影和电视节目。无人驾驶汽车可以减少道路交通事故并挽救生命，旅行费用也降低了。人工智能在医学领域的进步可能会带来医疗保健的快速改善，终结癌症和传染病。

但美国的再分配政策不适应这样的世界。失业补助往往是临时的，而且常常用来鼓励劳动力进入增长中的行业。失业补助只能持续发放半年，而不是半辈子。安全网络鼓励人们参加工作，针对低收入阶层的收入补助也一样。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只适用于有收入的人，也就是有工作的人。福利和食品券计划也有工作方面的要求。美国现有的一系列政策旨在帮助人们度过短暂的失业期，并促使人们就业，但无法帮助4/5的成年人应对永久性失业。

换句话说，如果面临严重的不平等和大规模的失业潮，这个体系将会分崩离析。但全民基本收入显然是帮助人们维持生活的有力政策。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上，世界银行（World Bank）高级经济学家乌戈·真蒂利尼（Ugo Gentilini）说道："（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的）这种论点认为，机器可以夺走工作，但不应该夺走收入：社会上大部分人的工作面临着不确定性，应该实施可以保护广大民众而不仅仅是穷人的福利政策……因此，（基本收入补助）成为数字时代中一种直接明了的选择。"

* * *

最近，旧金山湾区（the Bay Area）已成为全民基本收入的中心。埃隆·马斯克、比尔·盖茨和其他科技大佬已经对这个被誉为"21世纪的社会疫苗""21世纪的经济权利""人民的风险投资"的政策表示出了兴趣。

这种兴趣正逐渐变成行动。"基本收入创造马拉松"（basic income create-a-thons）让程序员聚在一起，探讨全民基本收入，破解贫困；加密货币爱好者在探寻基于比特币的基本收入计划；多位年轻的百万富翁科技创始人出资，在肯尼亚的最贫穷的人当中开展全民基本收入试点；美国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实施了一个研究项目，为多个州的家庭无条件发放现金；脸书的联合创始人之一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已经投入1 000万美

元用于全民基本收入等相关政策的探索，他将此称作经济安全项目。他告诉我说：“我们俩说话的时候，改变正在发生，以前是一小群人说‘就是这个’，现在有一大群人说‘嘿，这个可能不错’。”

硅谷在寻找方案，试图解决他们认为由自己导致的问题。破坏支撑整个经济的就业，然后又提出具有颠覆性的福利方案来解决这个问题，这种行为的确有些讽刺。这些会减少工作机会、改善生活的技术很大一部分源自门洛帕克（Menlo Park）的车库，瞭望金门海峡（Golden Gate）的风投公司和奥克兰（Oakland）的住宅。初创企业培训学校Tradecraft的创始人、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米沙·切拉姆（Misha Chellam）对我说：“在硅谷，我们似乎可以看到未来。”但当这种预见性让人看到令人不安的真相时，人会产生一种幻灭感。他说：“人们加入初创企业或在科技领域工作，自然有着创造改变生活的抱负，但是很多首席执行官（CEO）对他们的工作会造成的巨大压力和伤害感到难过。”

“我们正在经历一场深刻的经济、技术革命”，这样的担忧似乎也激发了人们对于全民基本收入的热情。最近，脸书亿万富翁的慈善机构“扎克伯格-陈计划”（Chan Zuckerberg Initiative）、斯坦福大学（Stanford University）以及白宫共同举办了一场关于贫困问题的峰会，Y Combinator公司总裁在峰会上说道：“我们经历过重大的技术革命，比如农业革命、工业革命，这些都极大地改变了我们的世界……我认为我们正处于或者至少即将进入另一场革命当中。”

事实证明，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往往在划时代的经济变革时期盛行。它的首次出现似乎是在资本主义诞生的时候。亨利八世（Henry VIII）统治时期，中世纪的封建制度被文艺复兴时期的重商主义取代。几个世纪以来，英国农民一直在地方领主或天主教会（Catholic Church）的公地（Common Land）上辛苦劳作，从事自给自足的农业生产[称作“敞田制”（openfield system）]。到了15世纪末期，越来越多的领主将土地圈占起来，禁止农奴放牧、种植农作物或建设小型农宅，而雇用农奴放牧绵羊、加工羊毛。过去供养着多个家庭的土地现在成了私人的牧场。自给自足的农民成了领工资的劳动力，后来往往沦为乞丐或者流浪汉。

历史巨著《都铎王朝的经济问题》（*Tudor Economic Problems*）引用了16世纪一个英国人说过的话，他抱怨道：“如果养绵羊能带来如此大的收益，谁还会维持对每个县来说必不可少的农牧业呢？当穷人可以通过养羊获得更大的利润时，谁还会在自己家里养十几只奶牛，挤牛奶、做奶酪，把这些产品推向市场？谁不愿意为了鼓鼓的钱袋子放弃农牧业？”

圈地行为的扩张意味着公共物品私有化，农民生活在水深火热之中，贵族阶层更加富裕，流浪汉越来越多。它意味着一个有几百年历史的古老经济

体系的剧变。它引出了这样一个问题：英国的领主和王族亏欠了民众什么？1516年，托马斯·莫尔（Saint Thomas More）觉得应当回答这个问题。在他充满哲学意味的著作《乌托邦》（*Utopia*）中，莫尔与一个虚构的名叫拉斐尔·希斯拉德（Raphael Hythloday，希腊语“胡说者”的意思）的旅行者展开了对话。希斯拉德描述了英国的犯罪和贫困问题，他认为根本原因在于绵羊的祸害。他说那些温顺的动物要来“吃掉”人类，农民的生活因圈地运动而苦不堪言。希斯拉德还说英国会把小偷吊死，他提出了一个更好的选择：

> 这种惩罚小偷的方式既不公正，也不符合公共利益，因为如果盗窃行为很严重，那么吊死也没用；如果是简单的盗窃行为，那也不至于剥夺一个人的生命；对于没有其他维持生计的方法的人而言，无论多么严重的惩罚都无法阻止他们盗窃……对盗窃的严重惩罚已经存在，但其实更好的做法是制定措施为所有人提供谋生的方法，让他们不必铤而走险去盗窃，甚至因此付出生命。

这种“谋生的方法”是指一个有保障的最低收入，这是最早的支持全民基本收入类似政策的观点之一。

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在工业革命时期再度浮现，往往出现在关于食利者、贫困、权利以及再分配的哲学性对话中。比如，1797年托马斯·潘恩（Thomas Paine）指出，“每个公民都应该为自然遗产的损失而得到补偿，实现这一点的方式是（在21岁的时候）引入土地产权制度”，并实施养老金制度，让人们从50岁直至去世都可以领取补助。全民基本收入地球网络（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关于全民基本收入这一概念的历史记录指出，在19世纪中期，被马克思称作“空想社会主义者”的法国激进人士查尔斯·傅立叶（Charles Fourier）认为，“文明”应当保障所有人的最低生存，包括为人们提供可口的一日三餐和豪华的酒店房间。后来，著名的政治经济学家约翰·密尔（John Stuart Mill）也表达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肯定。

激进的20世纪60年代——新机器时代的前夕，也是重要的转型时期，妇女和有色人种开始要求进入并充分参与白人男性占据主导地位的经济——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再次出现，经历了“短暂的活跃”。诺贝尔奖得主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提议推出“负所得税”（negative income tax），以此来提升所有家庭的收入，保障最低收入水平。马丁·路德·金（Martin Luther King）呼吁采取基本收入和其他激进、普遍的政策来促进种族事业的发展，维护经济正义。共和党的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和民主党的丹尼尔·帕特里克·莫尼翰（Daniel Patrick Moynihan）

都表达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但这些努力并未成功，一部分是因为试点研究错误地认为某些形式的支持可能会使离婚率上升。很快，这个激进的想法就被遗忘了。

而现在，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正处于鼎盛时期，这得益于科技泡沫资金的支持、对失业的担忧和对美好未来的期待。全民基本收入的倡导者和风险资本家阿尔伯特·温格（Albert Wenger）说道："我们现在讨论的是将基本需求和工作的必要性分离开来……几百年来，整个世界都建立在工作的必要性上。现在我们所说的不是对经济稍微做出调整，而是像从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一样的深刻转变。"

* * *

不过，尽管人工智能问世，尽管存在对人类就业前景的担忧，在我看来，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来防止科技失业的提议仍然过于夸张，至少尚不成熟。

如果技术迅速改进，并造成大量劳动力失业，这在国家统计数据中很容易就能显现出来，"全要素生产率"（total factor productivity），有时也被称作"索洛剩余"（Solow residual）的这个指标就能反映出这种变化。如果一个工厂购买了新的部件生产设备，这个工厂生产的部件量应当会增多。如果工厂雇用更多工人，延长他们的工作时间，工厂的产量应该也会增加。假设在不购买新设备或不延长工人工作时间的条件下，工厂工人想出办法，提高了部件产量，这时就出现了全要素生产率的提高。全要素生产率代表着创造力和人力资本。经济学家认为，全要素生产率是衡量经济活力的最好标准。

如果无人驾驶汽车代替了卡车司机，人工智能淘汰了翻译，机器人取代了医生，我们相信全要素生产率将会急剧上升，即使就业率会因此下降，经济增长也会放缓，整个国家会以更少的人力完成更多的工作。但自20世纪中期以来，全要素生产率增长放缓。这是一个深刻但很少讨论到的问题。如果劳动生产率的年均增长率保持1948—1973年的水平，那么平均家庭年收入将增加30 000美元。另外，如果不平等状况保持在1973年的水平，平均家庭年收入只会增加9 000美元。

面对着惨淡的就业市场、迅猛的科技进步，我们对机器末日深感恐惧，而美国国家统计数据却显示美国经济的创造力正被逐渐削弱，为什么会出现这种现实与预期的脱节呢？

有观点认为，统计数据没有反映出创新对经济的影响，而且错误地衡量了快速的技术变革。假设在过去18个月的时间里，某个技术发明突飞猛进，比原来改善了五倍，但是政府认为只改善了两倍。如果这样的误差非常普

遍，那么国家的统计数据就存在严重错误。另一个相关的论点是，如今计算机领域的进步削弱了金钱意义上的经济规模，使这些技术进步的价值更难以衡量。以音乐产业为例，音乐录制品的销量在20世纪90年代后期达到了顶峰，那时候你还可能会收到爱慕你的人送的混合磁带。从那之后，这些产品的销量就直线下降。并不是大家都不听音乐了，实际情况恰恰相反，只是技术进步削弱了音乐产业长期的资金基础。

一种更深刻的分析认为，现在的技术进步并不像人们以为的那样具有颠覆性。从经济重要性来讲，水果采摘机器人、癌症筛查应用程序、无人机、数码相机和无人驾驶汽车的变革性无法与打谷机、商业飞机、抗生素、冰箱和避孕药相比。拥有亿万资产的科技投资者、特朗普（Donald Trump）总统的顾问彼得·泰尔（Peter Thiel）最近对美国新闻网站沃克斯（Vox）说道："你可以到纽约各处看看，纽约地铁有100多年的历史了。你可以在飞机上看看周围，你会发现与40年前没有太多不同，也许比以往慢了一些，因为机场安检技术含量低，运作状况并不太好……到处都是屏幕，也许是为了分散我们的注意力吧。"（他的另一番言论更为著名，他说："我们本想要可以飞的汽车，得到的却是140个字符。"[注]）

也可能是由于经济增长乏力，导致创新速度缓慢。中左派智库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的经济学家梅森（J.W.Mason）指出，整个经济对商品和服务的需求不旺盛，工资水平低下，削弱了企业精简结构、提高生产效率、增强创造力的积极性。他认为，工资水平上涨、经济增速会迫使企业加大对能减少劳动力需求的技术的投入，从而促进生产力的提高。

还有可能是因为现在的科技进步还没有从生产率数据上反映出来。古登堡（Gutenberg）的印刷术毫无疑问是人类最伟大的技术创造之一，带来了信息传播和记录方式的变革。但是经济学家发现，在15—16世纪，这项技术在加快经济增速或者提高生产力方面并没有发挥显著的作用。另外一个例子是电气化，在19世纪90年代到20世纪初，美国企业和家庭开始接入电网，在夜晚为建筑照明，并在后来催生了不胜枚举的消费品和工业产品，包括门铃、航天飞机等。然而，正如经济学家查德·西维尔森（Chad Syverson）所说，在电气化技术出现后的大约25年中，生产力的增长一直相对缓慢。第一个信息技术时代也是如此，那时计算机开始在企业和家庭中普及。经济学家罗伯特·索洛（Robert Solow）——正是他提出了"索洛剩余"——在1987年指出，"无论从任何地方都能看出我们处于计算机时代，唯独生产力统计数据反映不出来"。在大多数情况下，科技发明产生之后会出现生产力的提高，企业会需要很长一段时间来适应，说明创新带来的利好和新机器时代的失业不久之后可能就会出现。如果是这样的话，大规模失业也会随之而来，全民基本收入可能是应对这一问题的必要措施。

但是目前，硅谷的论点却让人感到充满投机意味，而且十分遥远。无人驾驶汽车确实像奇迹一样，坐进去就好像进入了未来。人工智能系统令人惊叹，看着它们工作就像进入了科幻小说。但是，无人驾驶汽车还是有人在车上监控，人工智能系统对大多数人的工作和生活而言仍然比较遥远。为了应对人力需求骤减的问题，对全民基本收入这种解决方案进行讨论是十分明智的，但是如果认为必须现在、在这些条件下讨论全民基本收入这个解决方案，就显得愚蠢而短视。毕竟还有很多更具体的问题需要解决。

---

1. 卡珊德拉，古希腊、罗马神话中特洛伊的公主，不为人所信的吉凶预言者。——译者注
2. 铁锈地带，最初指的是美国东北部五大湖附近传统工业衰退的地区，现可泛指工业衰退的地区。——译者注
3. 照片墙是一款运行在移动端上的社交应用，用户能分享随时抓拍下的图片。——译者注
4. 图灵测试指测试者与被测试者（一个人和一台机器）隔开的情况下，通过一些装置（如键盘）向被测试者随意提问。进行多次测试后，如果有超过30%的测试者不能确定被测试者是人还是机器，那么这台机器就通过了测试，并被认为具有人类智能。——译者注
5. Siri，苹果公司在其产品上应用的一项智能语音控制功能。——译者注
6. Alexa，亚马逊公司的智能语音助手。——译者注
7. 社交软件和手机短信将每条状态或者信息限制在140个英文字符以内。——译者注

第二章
低劣的工作

在距离休斯敦（Houston）市中心不远的地方，一个六口之家在一间狭窄的公寓里醒来，在共处几分钟之后，一家人就开始了各自一天的生活。孩子们去上学。母亲约瑟法去汉堡王（Burger King）轮班。父亲路易斯在家养伤，这次受伤耽误了他宝贵的工作时间。孩子们放学以后，约瑟法去一家墨西哥餐馆做第二份工作。大女儿去坐落在繁华商业街上的餐饮店长藤鸡柳（Raising Cane's）工作。而她妹妹决定利用少有的休息日来温习功课。姐姐晚上9点下班，母亲约瑟法一小时后才下班。一天当中除了睡觉，这个家里几乎所有人都在工作，且一直都是这样。

几年前，我结识了奥尔蒂斯（Ortiz）一家，他们似乎代表了快餐业工作和低工资经济的一些趋势。第一个趋势，在较为年长的劳动力当中，快餐业从业人数令人吃惊。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翻烤汉堡这种工作是青少年选择的暑期工。而现在，由于30多年来工资都没有适度上涨，越来越多的中年人开始从事这样的工作，痛苦地挣扎着，避免被从房子里赶出来，努力让一家人有饭吃。截至2013年，每三名快餐工人当中只有一人是青少年，40%的快餐业工作人员年龄超过25岁，其中1/4需要抚养孩子，将近1/3至少接受过大学教育。奥尔蒂斯一家人只要达到了工作年龄的都在工作，这个家庭所有人曾经一共做着八份工作。

第二个趋势不是技术提高使工作机会减少，而是技术提高让工作使人更痛苦、更不体面。从许多方面来看，快餐店厨房几乎已经成为太空时代的奇迹，这里有很多精密的设备，能以飞快的速度和低廉的成本制做出一模一样、味道可口的汉堡、鸡肉和薯条。奥尔蒂斯一家人告诉我，这些技术和设备让快餐业的工作更加枯燥，工作内容不断地重复。制作汉堡就是按按钮，注意机器的提示音、定时器和数字监控。更糟糕的是，有精准算法的调度系统让雇主能够根据需求安排员工的工作时间，这样就会出现较大的不确定性，对于有孩子的家庭和十分贫困、无法应对收入波动的家庭而言，这是个非常大的问题。通常情况下，工人直到马上要开始工作了，才知道他们的工作安排。有时，他们甚至要从快餐店开门一直干到晚上打烊。当我见到约瑟法的时候，她已经连续工作了将近三个星期。

第三个趋势，奥尔蒂斯一家人反映了众多快餐业从业人员以及现代经济中数百万人共同面临的贫困问题。索尼克（Sonic）和杰克盒子（Jack in the Box）等快餐店的绝大部分雇员时薪不到12美元，即使一个家庭中有两个

人全职工作，这样的工资也不足以维持家庭开支。此外，几乎所有快餐店员工都没有雇主出资的健康和养老福利，职业上升的机会也非常少。奥尔蒂斯一家起早贪黑，分别干着时薪10美元、7.75美元和7.25美元的工作，勉强度日。这家人住在一套每月550美元的公寓里，全家人不停工作来支付房租和水电费，给车子加油，购买食物。路易斯受伤使他们一家濒临无家可归的边缘。

我在“争取15美元”（Fight for ＄15）的运动上遇到奥尔蒂斯一家。工人们组织这场运动，希望提高全国380万快餐业员工的工资，提高快餐业员工在工会中的代表地位。2012年感恩节后不久这场运动就开始了，当时，塔可钟（Taco Bell）、汉堡王、温迪（Wendy's）以及其他快餐店的员工罢工，在纽约麦迪逊大道（Madison Avenue）上的麦当劳前聚集，高呼：“我们要公平的报酬！”很快，这个运动在全美国兴起，然后发展到全世界，蔓延到六大洲大约300个城市。作为回应，许多雇主自愿提高了工资，十几个州最终也上调了最低工资标准。

但是，低工资的问题仍然存在。多数贫困家庭都要应对失业问题，截至2016年，950万名每年至少工作27周的工人，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生活窘迫或极端接近贫困线，看不到上升为中产阶级的途径。随之而来的还有经济、身体以及情感上的问题。路易斯和约瑟法谈到了他们面临的压力、不确定的时间表给他们造成的困扰，以及作为父母，由于没能给孩子更优越的生活而感受到的痛苦。从长藤鸡柳快餐店下班后，奥尔蒂斯家的大女儿坐上了来接她的路易斯的车，她告诉我她经常不吃晚饭，“快餐店厨房里鸡肉的味道让我觉得饱了”。

有工作的穷人、不稳定型无产者、掉队了的人，这就是现在的美国。在大衰退开始十年之后，美国经济恢复到了几乎完全就业的状态，失业危机不复存在，但好的就业岗位仍然十分紧缺，这个更持久、更严重的问题早在20世纪就出现了。我们用不着等到机器人来夺走所有的工作，工作带来的收入早就不如以往，越来越多的家庭艰难度日，依靠政府救济才能摆脱贫困，美国梦似乎也已经遥不可及。

再来看不平等问题。著名经济学家伊曼纽尔·塞斯（Emmanuel Saez）和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汇编的数据表明，1979年时，中下层工薪族的收入占总收入的20%，而到了2014年，这个比例降到了13%。同一时期，顶层1%人群的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从11%上涨至20%。蛋糕越来越大，最富裕的家庭占有的部分也越来越大。通过跟踪家庭收入中位数也可以看出问题的严重性。在过去的二三十年，尽管经济迅速增长，家庭收入的中位数却停滞不前。另一个反映问题的现象是中产阶级正在萎缩，中产阶级收入占总收入的比例下降。与此同时，穷人的数量不断增加，他们的收入基本上没有增长。有些变化正在使天平向资本家和大企业倾斜，远离

劳动者和广大民众。

多年来，我长期报道那些在收入分布中处于下层3/4的家庭所面临的问题，还花了几年时间探讨决策者如何帮助这些家庭。比如说，民主党人希望普及医疗保障，提高最低工资标准，提供免费大学教育。共和党想减轻企业税收负担，鼓励投资，减少繁文缛节，帮助公司成长。但美国服务业雇员工会（Service Employee International Union，简称SEIU）的安迪·斯特恩和其他人，尤其是极左人士，主张必须采取更激进的解决方案。民主党人也开始讨论更高的工资补贴，甚至政府主导的就业计划。在这些计划中，全民基本收入的方案更大胆、更富有新意。为所有美国人提供固定收入能为经济提供急需的有效缓冲，而且是一种让劳动者重回经济中心的方式。这不仅是未来当世界充斥着机器人时迫切需要采取的措施，即使在目前也同样必不可少。

我认为，许多像奥尔蒂斯这样的家庭应当立即获得更多、更好的东西，而全民基本收入是确保这一点得以实现的一种方式。

* * *

在过去大约40年当中，多个相互交织的趋势共同作用，导致劳动者收入下降，以及富人、投资者与企业收入上涨。

这其中就包括全球化的趋势。全球化带走了匹兹堡（Pittsburgh）、底特律、加里（Gary）、托莱多（Toledo）和南本德（South Bend）等地数百万个就业岗位。大多数经济学家认为贸易是双赢的。通过贸易，美国这样富有的、工资高的国家可以获得相对廉价的进口商品，还能获得更多劳动力和资本用于价值更高的投资。像越南这样贫穷的、工资低的国家可以获得就业岗位、资本，能促进生产力的提高。但从近年的情况来看，贸易却并未达到双赢。“铁锈地带”失业现象非常普遍，当地劳动力市场的适应和调整“极度缓慢”。经济学家戴维·奥托尔等认为：“从国家层面来看，如预期的那样，如果一个行业面临着更大的来自进口的竞争，这些行业的就业率就会下降，但其他行业的就业增长尚不足以抵消这种下降。”一些好的工作岗位完全消失了，不会再出现。

“铁锈地带”带来的经济、心理和政治影响直到现在才得到充分认识，这场冲击导致了许多现象，包括政治分化和结婚率下降等。越来越多学历较低的老年白人已经提前“绝望而死”。普林斯顿大学（Princeton）经济学家安妮·凯斯（Anne Case）和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发现，尽管经济在增长，医疗保健也不断提升，但死亡率实际上却在上升。他们的研究结果显示：“在20世纪70年代的全盛时期之后，高中教育水平的白人工薪阶层逐渐衰败，伴随着这种衰败还出现了许多其他的问题。”

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促使加入工会的私营部门员工减少，这成了另一个导致工资水平停滞和低劣工作增多的原因。（在底特律和匹兹堡的工厂，很多员工都加入了工会。）在20世纪50年代，每三个工人中就有一个加入了工会，工会可以帮助他们争取更高的工资、更好的福利、更多的家庭假期和病假、更好的工作条件等。而现在，每20个人中才有一个人是工会成员。如果2013年加入工会的私营部门员工比例像1979年一样高，工人每年的平均收入将增加2 704美元。

这不仅是因为工会直接影响着工会成员的工资，还因为工会对劳动力整体有着间接的影响。如果企业A提供工会工作岗位，时薪15美元并提供福利，那么企业B无论提供的是不是工会工作岗位，为了吸引劳动力，也要给出与企业A差不多的待遇。参加工会的工人减少，使私营部门、处于非工会岗位的员工每年损失了超过1 000亿美元的工资，这也是导致这些员工之间工资不平等的一个重要原因，其作用占到了1/3。美国智库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发现，工会成员减少可能是导致男性中等收入者工资停滞和工资不平等的“最大因素”。当然，女性也不能免受这一趋势的影响，她们每年因此损失了大约240亿美元的工资，在工资不平等加剧这个问题上，工会工作岗位的消失所起的推动作用占到了1/5。

还有一种趋势主要影响着女性，那就是最低工资的价值在下降。通常而言，工资最低的劳动力是女性。截至2017年底，联邦最低工资为每小时7.25美元，考虑到通货膨胀因素，这个标准比1967年时低8%左右。如果再考虑到飞涨的医疗保健、儿童护理费用和住房成本，这个标准实在不足以让工薪家庭摆脱贫困，奥尔蒂斯一家的情况就是很好的例证。对于收入处于第50百分位和第10百分位——相当于现在每周工资750～1800美元——的女性劳动力而言，在导致工资差距扩大的因素中，最低工资标准价值的流失占到了2/3，对所有劳动力来说，这个比重大约为50%。

过去的几年，许多州和城市纷纷采取措施提高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争取15美元”的运动引发了更广泛的、两党联立为工人加薪的行动。抗议、集会、长篇故事、晚间新闻报道和国会山的听证会引起了人们对这个由来已久的问题的关注。经济复苏没能解决这个问题，于是各州、各城市开始采取行动。参与这项运动的活跃人士、田纳西州（Tennessee）的医护工作者塞皮亚·科尔曼（Sepia Coleman）告诉我：“工作时间不是问题，工资才是。”她要照顾生病的母亲，生活十分艰难。“我做不到一周工作120个小时！如果工资不够，谈时间也没有意义。”2017年，由于最低工资标准的提高，400万劳动者的工资出现了上涨。西雅图、洛杉矶、旧金山以及华盛顿都将最低工资标准提高到了15美元/小时。即便如此，大约300万人仍然领着联邦最低工资，在许多大城市，最低工资标准极低，生活成本却很

高。

工资水平偏低还有一个不明显、没有被充分理解的原因。处于垄断地位或者有买方垄断优势的大企业的主导性日益增强，面对的市场竞争者越来越少。在20世纪上半叶，政府将垄断视作对民主的严重威胁，迫使母贝尔公司（Ma Bell）和标准石油公司（Standard Oil）分拆，这样的例子还有很多。正如罗斯福（Franklin D'Roosevelt）在1938年向国会发表的一次讲话中所说："如果人民容忍私权增长，让它比民主国家本身还要强大，那么民主的自由就陷入了危险。这从本质上看就是法西斯主义。"但是当所有的工作都转移到了中国时，政府对垄断威胁的看法开始改变。曾经被里根总统提名为最高法院大法官的罗伯特·伯克（Robert Bork）在他1978年的著作《反托拉斯悖论》（*The Antitrust Paradox*）中指出，企业并购对消费者有利，能够降低商品价格、提高公司效率。他认为政府不应该为了竞争而保障竞争，而应该关注如何才能造福消费者。

华盛顿认同了这种观点，企业渐渐地能更容易地买下供应链和竞争对手。由于这些法律的变化，以及资金充裕、唯利是图的华尔街的兴起，医院、农业、电信、运输、保险、航空、银行、能源等几乎所有重要行业都经历了明显的整合。甚至连比萨行业都逐渐被少数大品牌主导，必胜客（Pizza Hut）、达美乐（Domino）、小凯撒（Little Caesars）和棒！约翰（Papa John）占据了美国超过1/3的市场份额。

经济学家认为这是收入不平等和工资停滞的原因之一，虽然可能影响并不明显。需要员工的公司越少，愿意用更高的工资吸引劳动力的雇主就越少，再加上许多行业——甚至包括工资偏低、工作内容枯燥的快餐业——都有竞业限制合同（Noncompetition Agreement），工作机会变得更少。此外，整合后的行业往往由历史更悠久的公司主导，它们吞并了更年轻、更具活力的竞争对手。由于老企业扩张相对缓慢，人员比新企业更加稳定，因此整合之后劳动者的"流动性"会下降。劳动者从一个公司跳槽到另一个公司，提出更高的工资待遇方面的要求，这种"流动性"是工资增长的一个重要来源，但大企业的发展壮大对这种促进工资增长的来源产生了不利影响。

集中性增强也加剧了"利润不平等"的现象。在过去的40年中，一小部分企业变得非常富裕，它们的利润增长速度远远超过那些收益较低的企业。这意味着，只有少数企业的员工在挣大钱，而大多数企业的大多数人工资并不高。上市公司的高层已经成为"巨星经济"（superstar economy）的一部分，他们的收入轨迹几乎与其他人截然不同。导致收入差距的主要原因是不同公司之间，而不是公司内部的工资差距。虽然时间在推移，但在同一个公司里，管理者与看门人的工资比例并没有多大变化。

然而，企业似乎也不会再雇用看门人了。利润差距扩大的同时，雇主和员工之间的关系也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普通劳动者的工资和福利都遭到压缩。几十年前，企业开始外包那些与“核心竞争力”无关的工作，例如薪酬管理、餐饮服务、美化环境、旅行预订、法律工作和人力资源等。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不再雇用大量工人，而是转向特许经营模式，减少企业责任，增加利润，并取悦华尔街。这意味着许多对企业而言非核心的、辅助性的员工失去了他们稳定的、回报可观的工作。所有人都有养老金、病假和带薪休假的日子一去不复返了。取而代之的是时薪，是没有工作保障的生活。员工由“在”一家大公司工作变成了“为”一家大公司工作。

这一切导致了“应变就业”（contingent work）的崛起，很多劳动者被迫随时待命，以合约方式来工作，或者成为自由职业者、临时工（一些经济学家也将兼职工作纳入了这个类别）。对于这种就业安排的众多评估存在明显差异，这较大一部分原因是政府在调查2005—2017年的情况时，没有考察。然而，一些研究显示，在过去三四十年里，特别是近十年来，应变就业的队伍已经从几乎为零迅速发展，形成了一定规模。一项评估显示，2005—2015年，处于“替代性工作安排”（alternative work arrangements）中的劳动力比重从10%攀升至16%。美联储（Federal Reserve）的一项调查显示，每三个成年人中就有一个“从事非正式的有偿工作活动，以此作为对传统和正式工作安排的补充或替代”。在这些人当中，大约有1/3在网上销售全新或二手的商品，其他人从事家政、美化环境等工作，担任助手或从事季节性劳动，比如在圣诞节时到当地的商场里打零工。

有一件事可以肯定：应变就业者会受到不公平的待遇。与有传统劳动合同的劳动者相比，应变就业者每个月失业的可能性要高出好几倍，他们每小时的收入少11%，年收入少50%。他们陷入贫困的可能性更大，而且更可能要依靠政府援助，导致纳税人承担了企业没有支付的账单。“那些企业有资格得到减税优惠吗？”一位劳工维权人士问我，“它们的员工住着低收入的住房，生活要靠食品券和援助，这些企业有资格得到那些补贴和其他的好处吗？”

* * *

一个阳光明媚的春天午后，匹兹堡的一家汉堡店内，我和几个优步司机坐着，喝着啤酒，吃着薯条，讨论着零工经济（Gig Economy）。他们靠着开优步车维持生活，有时候很难做到收支平衡。他们要应对很多问题，比如说汽车出了故障，付不起账单，还有医疗保健问题、保险问题、储蓄问题、获得食物问题。

像许多其他“铁锈地带”城市一样，制造业工作岗位的流失也让匹兹堡饱受

摧残。从某些方面来说，优步给了匹兹堡一种救赎的方式，创造了数千个灵活的工作机会。优步在当地的先进技术集团（Advanced Technologies Group）还为科学家和技术人员提供了少量薪酬十分可观的工作岗位。但称为救赎似乎又不妥，因为优步司机薪水较低，优步也正在夺走出租车和公共汽车司机的工作，而且先进技术集团那些高薪职位的部分职责就是要彻底消除对人类司机的需求。

优步司机对我说，第一个问题（工资）是最紧迫的。艾林·克莱默（Erin Kramer）是地方社区组织“同一个宾夕法尼亚”（One Pennsylvania）的执行董事，他跟我们一起吃汉堡、喝啤酒，他说：“他们（优步司机）的担忧就是自己的切身利益……他们抱怨自己没被当作雇员。他们不受重视，开优步车没有办法取得成功。”

司机们清晰、详细地做出了解释。“有越来越多的人使用来福（Lyft）和优步，尤其是优步。后来优步为了吸引更多的乘客，就为乘客提供折扣或者减少乘客的服务费。”优步和来福司机海瑟·史密斯（Heather Smith，我承诺不透露她的真实姓名，以免她遭到雇主报复）告诉我：“当我看到付款细单时，发现钱基本都到了优步手里，只给我一半的服务费。我心想，‘太糟糕了，再见，优步’。”

她告诉我，通过为来福车指导新司机，确实挣到了比较可观的收入。她说：“如果只是打电话指导或者怎样的话，他们不会给我钱，但是如果对新司机进行通常30分钟，最多45分钟的面对面指导，我就能得到35美元。”

我说：“这钱不少啊。”

“如果你一直有这种指导可以做，可以挣不少钱。”

“够在匹兹堡生活吗？”

“不够。”

像优步这样的公司之所以可以支付如此低的工资，是因为这些劳动者通常不是正式雇员。按需型、零工型经济的企业通常不会正式雇用司机、采购人员或送货员，而是把他们归为合同工，购买他们的服务。这样就意味着这些企业不受最低工资规定的约束。他们不需要把这些劳动者的工资转移一部分到失业保险基金或社会保障中去，也不会被要求为这些劳动者提供医疗保健，尽管这些劳动者实际的工作时间与全职员工一样。许多优步司机和来福司机觉得公司误导了他们，给了他们某种程度的参与感，但没有带来传统意义上的就业。“当你注册加入时，他们称你为合作伙伴”，赛斯·

麦格雷斯（Seth McGrath），一名40岁的优步司机说了这么一句话，桌边的每个人都点了点头。“但这并不是真的。他们跟你保持距离，对吧？你没法打电话给公司的任何人，也不能和公司的人面对面交谈。”

从很多方面来看，零工经济的突然崛起反映了过去半个世纪中职场的演变趋势。私募股权伙伴和风险资本家向初创企业投资数十亿美元，试图颠覆实体企业，取消工作场所的保护，尽力压低工资，聘用尽可能少的员工，不提供任何福利或工作保障。优步是这样的企业中最大和最明显的一个，类似的企业还包括自由职业和服务平台五美元服务区（Fiverr）注、优步的竞争对手来福车、食品杂货快送公司即时购物车（Instacart），以及提供勤杂工服务、现在属于宜家（Ikea）的任务兔（Task Rabbit）。没有人知道服务这些企业的多样、复杂和快速变化的劳动力群体的确切规模，但有人估计这个群体多达4 500万人。

这些初创企业的基本商业模式都是一样的。公司提供了一个基于网页或手机端的移动平台，这个平台很轻便，还可以不断扩展来服务新的消费者。这种平台将提供某种产品或服务的人与寻找这样的产品或服务的人连接起来。这些产品和服务也许是顺风车、一个三明治，或者帮忙换个不容易够到的灯泡。公司组织搜索，使产品和服务与需求相匹配，然后进行商品交换或提供服务。平台负责结算费用，并从中提成。

最终获得的费用其实很少。优步吹捧自己的统计数据，称在纽约市，优步UberX项目的专职司机年收入的中位数达到90 766美元。优步在公司的一条博客状态中写道：“作为UberX合作伙伴的司机就像小企业家，他们在全国各地展示出当一名司机是可持续的、有利可图的。”优步还说：“相比之下，美国的出租车司机通常都在贫困线以下。”后来这条状态被删除了。但司机们严重质疑这些数据，特别是在优步于2016年下调司机费用之后。纽约的优步司机网络（Uber Drivers Network）在一封给优步的公开信中写道：“你们创造了一种司机可以被抛弃、被牺牲的文化，你们让公司和整个行业充满了可以被抛弃、被牺牲的司机，使任何一个司机都赚不到可观的收入。”一些司机说他们的工资远远低于最低工资标准，每小时不到3美元。

麦格雷斯说：“挣得少的时候，每晚150美元。”他告诉我，他会先把小女儿哄到床上睡觉，然后出去开优步车，接送乘客。他说，在扣除税收、汽油和汽车费用之后，他所挣到的钱只能留下一半。

这并不是说包括优步司机在内的零工经济工作者没有获得任何益处。他们很多人都承认为打车服务平台工作有较大的灵活性，他们经常用优步来维持总体收入，其他方面收入较低时，他们就开优步车来贴补。如果其他收

入比较高，开优步车的时间就少一些。我问麦格雷斯，在匹兹堡是否还有其他可以贴补收入的方式，他为什么决定为优步工作，而不是做个自由职业者，或者开车到当地商店捡客？“我有一辆车，”他告诉我说，“我能够承担附加的保险，也可以保持车子内部相对干净，尽管这比较难，因为我有个七岁的孩子。对我来说，主要是开优步车时间灵活，而且门槛很低。”

在公共场合，零工经济型的企业宣扬灵活性和独立性，塑造自己支持千禧年企业家、不压迫无产阶级的企业形象。然而私下里，独立性却并未得到鼓励。优步规定了司机需要有什么样的车，设置了薪酬等级，指导司机如何管理客户，在司机星级排名太低时将他们开除，甚至还规定了如果乘客在车里呕吐，司机该如何处理。这对很多司机而言与正式工作没有两样，但显然即使是正式工作，这也算不上好工作，但可以肯定的是，这绝不是自由的零工。

越来越多的政治家和劳工专家认为上述两个标签都不合适，政府可能需要创建一个叫作“依赖承包商”（dependent contractor）的新标准，它代表着依赖于某企业，却并非该企业雇员的个人。例如，政府可以向使用超过1 099名零工的企业征收附加费。这些资金可以用来支付失业保险、工人的赔偿，以及其他小额福利。同时，政府还可以要求按需型企业报销职工基本开销，为每个工作小时支付当地最低工资。这就要求企业更好地记录员工的工作时间，对消费者而言，这意味着产品和服务的价格可能会提高。但这样做能在不损害商业模式的情况下，改善零工经济最严重的问题之一——从业者的待遇过低。

另一个更全面的解决方案是政府部门建立一个按比例分配的基本福利系统，不论职工工资高低，一律从中扣除一部分给基本福利系统。基本福利可以包括病假、产假、退休储蓄、失业保险和职工赔偿。企业家尼克·哈诺尔（Nick Hanauer）和劳工组织者戴维·罗尔夫（David Rolf）在《民主》（*Democracy*）上发表了一个比较详细的方案，认为“共同的安全体系”（shared security system）将保障零工劳动者通往中产阶级的途径，同时又不破坏这些新兴企业，不妨碍灵活、兼职工作的崛起。

改进劳动标准也会有所帮助。卡丽·格里森（Carrie Gleason）是大众民主中心（Center for Popular Democracy）“公平工作周倡议”（Fair Workweek Initiative）的负责人，该组织为当地劳动者团体提供保护伞。她领导了一项活动，试图迫使企业停止使用按需待命的职工和“精准时间”（just-in-time）系统，并希望说服地方政府禁止这些新的用工方式。她告诉我：“这不仅是因为我们需要更可持续的工作计划，还因为我们应该对工作有更多的管控。”

这样的变化虽然能有所帮助，但20世纪和21世纪出现的劳动者权利的灾难

性损失是不会得到有效缓解的，无法从根源上解决年轻的左派人士所谓的“晚期资本主义”的问题。在晚期资本主义中，企业占据主导，社交媒体无处不在，工作苦不堪言，还充斥着后现代的具有讽刺意味的宿命论。这些改变无法解决“铁锈地带”的就业市场问题，不能保障劳动者获得安全的工作和能够消除贫困的工资，无法提供日渐老龄化的“婴儿潮”一代所需要的体力和情感上可以接受的工作，也帮助不了在紧急情况下拿不出400美元的全美46%的家庭，更无法帮助奥尔蒂斯一家成为中产阶级。

另一方面，想象一下，如果奥尔蒂斯一家的每位成员每月都能收到1 000美元，不附带任何条件，或者只附加很少的条件，那又会怎样呢？当然，达到工作年龄的家庭成员不会停止工作，因为他们还想送两个女儿上大学，帮助他们的亲戚，让家人过上稳定的生活。但是父母将能够拒绝恶劣的工作条件；孩子们也许能更好地安排时间，这样一家人就能多相处一会儿，而不是只在白天共处几分钟；年幼的孩子可以享受更多在家里与姐妹和父母相伴的时间，能有更多的时间学习和玩耍；在贫困线附近挣扎造成的心理和身体压力也可能会因此得到缓解。

* * *

在匹兹堡，我跟司机们坐在一起聊天，并且拜访了奥尔蒂斯一家，我明白了他们和其他像他们一样的劳动者，不仅面临着收入过低的问题，还有更多的利害关系。金钱代表着权利。快餐工人和司机感到自己不被尊重，觉得自己被利用、被忽视。

50年前，这些工人可能是工会成员，工会代表他们的集体意愿，努力确保他们获得良好的收入和福利待遇。但大部分优步司机都没有加入工会，奥尔蒂斯一家因为与劳工组织者的关系密切而一直饱受骚扰和威胁。艾林·克莱默（Erin Kramer）的组织只能做能力范围内的事，无法组织罢工或者就合同展开谈判，“争取15美元”的斗争也不能保证汉堡王能尊重店里的工作人员。“这些工作都可能会消失，”克莱默对我说，“这些工作一开始就不是好工作，而且企业给员工的待遇低于员工的实际价值。”

我也认识到，全民基本收入不会直接把钱和收入给这些人。它将成为21世纪的“工会”，把权利还给工人，并从根本上重新定义他们，把他们作为企业的投资，而不仅仅是成本。有了基本收入，工人就可以拒绝接受低工资的工作；有了基本收入，工人可以要求更好的福利待遇；有了基本收入，公司之间就需要相互竞争来争夺劳动力。“这就像为劳动者提供了永久的罢工基金，”服务业雇员工会的安迪·斯特恩（Andy Stern）说道，“它使权利发生了变化。想象一下，如果你是一个年轻人，你打电话询问是否能以每小时8美元的价格在H＆M服装公司或耐克公司获得工作机会，结果会是怎样。现在想象一下，如果你不需要这样做又会怎样。”

另外，全民基本收入将会是一种福利，鼓励企业提供中产阶级的工资水平，而不是像现行体系一样为领着贫困水平工资的人提供补助。几年前，一位名叫南希·萨尔加多（Nancy Salgado）的麦当劳老员工拨打了公司的“麦资源”（McResource）帮助热线。她曾以最低工资或接近最低工资的报酬在麦当劳工作了十年，她有两个年幼的孩子。她希望公司能帮助她加薪或获得企业资源。但接线员向她提供了如何申请食品券和取暖补贴的建议，并跟她聊了医疗补助计划的细节。换言之，公司没有利用其丰厚的企业利润帮助员工，而是让员工去领取救济。

这样做会带来巨大的社会成本，让纳税人替公司兜底。一项针对一线快餐业从业人员的研究发现，超过一半的人参加了公共援助项目，这是整体人口平均状况的两倍。国家为了这些劳动者的医疗补助计划和儿童健康保险耗费了近40亿美元，还在食品券上花费10亿多美元，并通过劳动所得税抵免（Earned Income Tax Credit，简称EITC）为这些人提供20亿美元的工资支持。另一项更广泛的关于“低工资的高昂公共成本”的研究发现，政府每年大约耗费1 300亿美元帮助工薪家庭。

我们可以有不同选择。全民基本收入可以确保工人在经济中发挥核心、重要的作用。“我们是对的。我们在道义上是对的，经济上也是对的，”克莱默说，“部长们知道我们是对的，老师们知道我们是对的，医生们知道我们是对的，但这是权利的问题。如果‘进步’正在发展成对我们而言没有价值的东西，我们是否有破坏‘进步’的权利？”

就算硅谷关于创新消除工作机会的预测过于悲观，而对于技术的变革性潜力过于乐观，零工经济的从业者们也仍然担心这些“进步”对他们没有益处，甚至担心自己无法参与到这些“进步”当中。在匹兹堡，我坐在一辆优步车的后座穿梭于城市中，看到了一辆优步公司的无人驾驶汽车。全民基本收入也许可以帮助工资低的劳动者，但那些没有工作的人呢？如果你失去了年薪60 000美元的卡车司机的工作，或者年薪24 000美元的快餐业员工的岗位，又或者失去了晚上开车、一年挣10 000美元的优步司机的工作，还指望你为收到政府的支票而感到快乐，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如果新经济判定你没有工作能力，科技奇迹毁了你的生活，你要靠政府政策扶持才能勉强度日，你会有什么样的感受？

美国对工作的看法究竟与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兼容？

---

1. 五美元服务区是一个全球交易市场，提供价格五美元的在线交易服务。——译者注

第三章
目的感

在“大衰退”之后，我花了数年的时间采访并撰写了关于所谓的“99周人”（99ers）命运的文章。这些人在经济低迷时期因自身过错之外的原因而失业，并耗尽了失业保险金，这意味着他们在努力寻找工作的时候没有了安全网的保障。奥巴马政府时期，高失业率地区的失业保险金发放期限延长至99周。

“99周人”只是一个庞大的美国群体中的一部分，这个群体在2010年的末期以及随后几年经历了长期的失业。大衰退期间和之后的失业现象十分严重，在特朗普政府早期充分就业的回暖回顾那次大规模的失业让人十分震惊。在2010年的一次调查中，1/3的受访者处于失业状态或者有一位失业的亲密朋友或家庭成员。大约1/3的建筑工人、1/4的制造业员工失业。就业人数减少了近800万，整体经济经过七年的恢复才重新创造出相同数量的岗位。失业潮不仅规模大，破坏性也很强。失业人员的平均失业时长猛增到41周，这是迄今为止二战后的最高纪录。失业六个月以上的人口比例攀升至45%，创下了另一个历史纪录。截至2011年底，已失业99周或更长时间的人，也就是所谓的“99周人”所占比例达到15%，也是战后的历史新高。

一个人失业的时间越长，找工作就越困难。旧金山联邦储备银行（San Francisco Fed）的研究发现，新近失业的人有大约1/4的概率能在接下来六个月里找到新工作。一旦他们失业达到六个月，这个概率就降到了1/10。这些数据部分反映了一个事实：对于招聘的管理人员而言，长期失业的人可能是吸引力较弱的候选人。失业的时间越长，劳动者的技能就越退步，他们会觉得脱节，并且感到灰心。而且，一些长期失业者也许最初就不具备高需求、有价值的技能。经济学家认为，歧视也是一个因素。企业不喜欢雇用长期失业的人员。对于数百万美国人而言，失业本身成了找工作的障碍，导致了毁灭性的后果。

在经济学家眼中，长期失业导致“滞后”（hysteresis），这个词来源于希腊语，是“落后”（lagging behind）的意思。长期失业使劳动者的收入永久性地低于其他人。如果失业普遍存在，整个劳动力市场会缺乏活力、生产力低下，就业率会更低。失业不仅对劳动者个人有害，而且不利于整个国家的经济。这种不利影响不仅发生在经济衰退期间，而且会持续多年。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Berkeley）的经济学家丹尼

·亚干（Danny Yagan）发现，相对于避免了失业冲击的地区而言，大衰退时期失业最严重的地区仍没有恢复。一个地区在衰退中的失业率上升的幅度越大，这个地区处于工作年龄的劳动者在随后大约十年里找到工作的可能性就越小。经济学家认为产生这种现象是由于"总体人力资本衰退和持续的低劳动力需求"。

枯燥的经济统计数据无法反映数百万美国人感受到的失业对于个人的毁灭性打击。我在2013年的秋天遇到了詹纳·巴林顿·沃德（Jenner Barrington Ward），当时她正在波士顿郊区几个朋友家里辗转借宿。她告诉我："我被麦当劳拒绝了，他们说我口齿太伶俐......我应聘刷马桶也被拒绝，因为我不会说西班牙语。我去洗衣店也被拒绝，因为我'太漂亮'了。还曾经有人很直白地告诉我，'我们不雇用失业者'。有两次雇主真的对我感兴趣，但信用检查（credit check）这关又让我失去了机会。"她将她长达五年的失业经历描述为一场"穿越地狱的旅途"，是从自我支持、自我实现、有尊严的中产阶级生活中堕落，变得无家可归、陷入极端贫困。

如果机器人夺走所有工作，全民基本收入或许能提供一种救赎，每当我这样思考的时候，我经常会想起巴林顿·沃德的经历。她和其他的"99周人"向我展示了美国人多么热爱工作，以及他们从工作中得到了多少目的感，感受到了多少自我价值。虽然停止发放失业保险确实会带来经济上的压力，但实际上最令他们讨厌的是失业本身。他们不想要施舍，他们想要工作。

* * *

借用散文家威廉·德雷西维兹（William Deresiewicz）的话来说，每一种文明都有美德。对于希腊人来说是勇气，对于罗马人来说是责任，对于美国人来说是勤劳。美国人工作不仅是因为经济方面的必要性，他们还将工作当作社会责任和美好生活的基础，这是"美国梦"的一部分，任何人都可以从一无所有走向富足、安全的生活。正如德雷西维兹所说，勤劳是一种"民族信仰"。

值得注意的是，这一点在历史上显得格格不入，至少在西方是这样。希腊人和罗马人崇尚享乐和沉思的生活，贵族靠他们土地上的果实和他人的劳动生活，认为辛苦劳作有损自身地位。16世纪来到美洲大陆的西班牙征服者期望找到一片富足的土地，不必再为生存挣扎。但是美国是清教和贵格派基于新教的劳动道德建立起来的国家，美国人认为闲散是一种罪过，并且相信个人可以通过劳动展示他们对上帝的爱，并净化自己。例如，清教徒牧师、塞勒姆女巫审判的支持者科顿·马瑟（Cotton Mather）就反对休息、放松和享受。他写道："这个城镇懒散的情况非常严重......懒惰从来不会带来任何好处！懒惰'对任何人而言都是耻辱'。"

从一开始，对工作的态度就将美国与欧洲社会区分开来。美国曾经是一个殖民地，英国贵族阶层从美洲大陆人民和奴隶的劳动中获益，巩固了劳动备受赞赏的地位。托马斯·潘恩在《常识》（*Common Sense*）中抱怨道，“在英格兰，国王所做的无非就是开战和授予官职，简单地说就是让国家陷入贫困，并将它们联系在一起……一个人每年可以因此享受八百英镑，还备受尊崇，这可真是一笔好买卖！”美国人也觉得有必要通过建立家园和征服西部来获得土地，并让这些土地日渐文明、开化，两方面都需要付出艰辛的劳动，这也进一步加强了勤劳、个人主义和成功的融合。

美国人不论贫富，不论住在城市还是乡村，不论是精英还是奴隶都从事劳动，而且努力地劳动。托克维尔（Alexis de Tocqueville）在《美国的民主》（*Democracy in America*）中这样描述美国人的勤劳：

> 在美国，没有人因为工作而受到贬低，因为他周围每个人都工作。也没有人因为接受报酬而觉得受到了侮辱，因为美国总统工作也领报酬，总统因负责指挥而获得报酬，其他人因为服从命令而获得报酬。在美国，所有工作或多或少都需要付出艰辛，或多或少都有利可图，但工作永远不会有高低，每一种诚实的工作都是光荣的。

大致在托克维尔的上述论述出现的同一时期，一位生活在新英格兰的维也纳移民也写道：

> 在把工作当作乐趣，把职业当作娱乐这方面，世界上没有任何人可以比得上美国人。积极的工作不仅是他们幸福的主要根源，也是他们国家伟大的基础，而且如果没有工作，他们会极度痛苦，他们不爱“悠闲”，对懒散充满恐惧。工作是一个美国人的灵魂：他追求工作，不仅是为了给自己和家人提供必要的生活条件，还因为他把工作当作一切人类幸福的源泉……就好像整个美国都只是一个巨大的工厂，工厂入口处刻着闪闪发亮的字“非工作人员不得入内”。

鉴于这种对劳动的热爱，从美国成立之时起，通过自身拼搏获得成功的故事就屡见不鲜。本杰明·富兰克林（Benjamin Franklin）在他的自传中夸耀：“我从小穷困潦倒、无人知晓，但最终我获得了一定的财富和声望。”这本自传是极为畅销的霍雷肖·阿尔杰（Horatio Alger）式的故事。富兰克林列举了13个美德，他警告美国人“珍惜时间，做有益的事，避免不必要的行为”（顺便提一句，13个美德中，谦卑在最后）。

还有安德鲁·杰克逊（Andrew Jackson），他赞扬了“普通人”，并谈到了他

成长过程中的穷困潦倒。“种植园主、农民、机械工和劳工都知道，成功取决于勤劳和节俭，”他在最后一次总统讲话中说道，“这些社会阶层构成了伟大的美国人民，他们是这个国家的骨骼和筋肉。”在理查德·尼克松（Richard Nixon）、吉米·卡特（Jimmy Carter）、比尔·克林顿（Bill Clinton）和巴拉克·奥巴马之前，林肯（Abraham Lincoln）也颂扬自己卑微的出身：“我并不羞于承认，25年前我是一个雇佣劳力，劈木头、当船工……跟普通穷人的儿子没什么两样！”

工作这个美德成为“美国梦”的基础要素，1931年詹姆斯·特拉斯洛·亚当斯（James Truslow Adams）提出了“美国梦”这个表述，指的是“一个人人生活得更好、更富足、更充实的地方，每个人都能根据能力或成就获得机会”，他写道：“这不仅是关于汽车和高薪的梦想，而且是一种社会秩序的梦想，在这种社会秩序下，每个人都能够发挥自身能力获得最大的发展，并能凭借自身而不是出生或职位等偶然条件获得他人的认可。”

美国人对辛勤工作的信念和美国对自力更生的崇拜一直存在并始终延续，从我们对富兰克林、弗雷德里克·道格拉斯（Frederick Douglass）、奥普拉·温弗瑞（Oprah Winfrey）等人的尊崇，以及对杰伊·盖茨比（Jay Gatsby）、斯特林格·贝尔（Stringer Bell）、艾尔·思威瑞更（Al Swearengen）和托尼·索普拉诺（Tony Soprano）等反英雄人物的迷恋中都可以看出来。（我还想提一下，特朗普一直坚持认为他总体上是靠自己取得了成功，把100万美元的借款转化为100亿美元的财富，事实上核查人员对这个说法提出了异议。）我们信奉辛勤工作，相信努力工作会让人出人头地，是取得成功的途径。我们相信，我们都应当为自己的成功负责。

即使是大衰退也无法撼动这种信念。2011年是战后经济发展最糟糕的年份之一，皮尤研究中心（Pew Research Center）2011年进行了一项经济流动性项目（Economic Mobility Project）调查，调查发现美国人将“勤奋”和“野心”作为决定一个人是否成功的两个最重要的因素。该研究总结说：“在成功的原因方面，人们认为个人的态度和品行比家庭背景、种族、性别或经济状况更重要。”

确实，美国人比世界上大多数人都更加坚定地认为，个人应当为自己的经济财富负责。世界价值观调查（World Values Survey）显示，绝大多数美国人认为，穷人如果足够努力也可能会变富裕，而欧洲人中有很大比例的人不同意这一点。在皮尤研究中心2014年的一项调查中，大多数美国人表示不认同“生活中的成功很大程度上取决于我们控制之外的因素”的观点，而大多数欧洲人都同意这个观点。“美国人认为贫穷是由于选择不当或努力不够，而欧洲人认为贫困是一个难以摆脱的陷阱，”哈佛大学的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和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经济学家乔治·马里奥斯·安杰勒托斯（George Marios Angeletos）认为，“美国人将财富和成功视为个人才能、努力和拼搏的结果，而欧洲人则认为这些更多归功于运气、腐败和关系。”

如果工作是一种美德，那美国人就富有美德。美国人比大多数高收入国家的人工作得更多，每年为1 783小时，超过日本、加拿大、英国和法国，比德国的劳动者多出30%。盖洛普公司（Gallup）发现，美国人对工作的投入度比世界上其他地区的人都高，远远超过东亚或南亚。盖洛普公司用总分12分的问卷对140多个国家的劳动者进行了调查，民意测验专家表示，对工作高度投入的员工“积极参与工作，对工作热心、专注……他们知道自己的工作范围，并寻找新的、更好的方法来完成工作任务”。工作让我们找到了意义，超过一半的劳动者表示，他们的“身份认同感”源自工作。

当然，失去工作会带来明显的经济后果，而且还会带来长期的影响。在经济衰退时期失去工作导致的破坏性极强。国际货币基金组织（International Monetary Fund）的一项研究指出，“这种收入的损失是由于某些职业或行业特定技能过时而价值下降；或者是因为寻找适当的工作需要大量时间，对于一个成熟的劳动者而言尤其如此；还可能是因为所谓的‘周期性降级’（cyclical downgrading）——指工人被迫接受在经济没有衰退的情况下不会考虑的工作。”

但失业也会带来更微妙和更深入的影响。工作提供社交互动。比如说，罗格斯大学（Rutgers）的一项研究显示，与有工作的人相比，长期失业的人更有可能每天只有两个小时或更少的社交。工作还有情感上的益处。失业者更有可能对自己的生活感到尴尬，并且更有可能与家人关系紧张或发生冲突。更重要的是，失业者更容易多病、沮丧，去世得更早。失业的后果还会影响下一代。失业者的孩子成绩更差，完成大学教育的概率比父母有工作的孩子要低。

最后，失去工作还是一种创伤，许多人不能从中完全恢复。一项研究得出结论：“在适应生活变化方面，大多数人做得出乎意料地好。即使是家庭成员死亡或患慢性疾病等悲剧事件发生之后，人们也能恢复以往的健康状况，虽然不能总是完全恢复。然而，在有一件事上，人们的反应并非如此，那就是失业。与其他消极体验相比，失业者的生活满意度并不能自我恢复。”

早在20世纪80年代初，著名社会心理学家玛丽·雅霍达（Marie Jahoda）就提出，尽管人们大多为谋生而工作，但他们也从工作的“潜在功能”中受益，这包括时间安排、社会交往、稳定工作赋予的地位和身份，以及集体目的感。她认为人们“有着深刻的需求，需要安排时间的使用，塑造自己

的观点，扩大社会视野，参与能感受到自身价值的集体追求当中，希望知道自己在社会中有受人认可的地位，还希望保持活跃性”。如果失去了工作，这些潜在功能也就没有了，这是一种让人痛苦的损失。难怪当那些年长的失业者在将自己形容为“退休”而非“失业”时会更加快乐。

* * *

有人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让人们选择停止工作，甚至会鼓励人们放弃工作。这是对全民基本收入主要的、深刻的反对意见。这看起来似乎是一个显而易见的经济学常识：给人们钱，不要求任何回报，必然会减少他们长时间工作的动力。对提供这种福利的经济体系的担忧是一个非常实际的问题：如果工作的人少了，会发生什么？如果每个人都能获得类似于社会安全补助的东西，许多人决定退休，会发生什么？这还是一个道德问题。美国人憎恨他们眼中的“搭便车”行为，比如食品券、福利，甚至是社会保障中的残疾计划。工作是与我们的税法和安全网络相互融合、交织的一种美德，深深烙印在美国的文化当中。工作受到富人和穷人的一致推崇。全民基本收入将人们排除在劳动力市场之外，无论是不满自己所缴纳的税收用于施舍的劳动者，还是不愿意接受施舍而是想获得工作的个人，对他们而言，全民基本收入都很可能成为非常不受欢迎的政策。然而，我们对全民基本收入类型进行研究的项目表明，即使是大规模的无条件现金转移，对劳动力市场的影响也可能比“基本经济学常识”预料的要小，选择减少工作的人可能是出于社会收益原因，比如要抚养孩子或者为了获得更好的教育。换句话说，全民基本收入不一定会让经济更加僵化，不必然会分裂创造者和获取者，也不一定能安抚众多的失业者。

在这一点上，伊朗提供了更好的例证。2010年，政府决定削减对石油、食物等商品的补贴，而是直接给民众发钱。面包和天然气价格突然上涨，但每家每户开始收到相当于收入中位数29%的现金，用来支付或者说抵消上涨的物价。现金转移支付共计占到了总体经济产出的6.5%。

伊朗政界人士担心该计划会“催生乞丐”，但两位经济学家在对税收记录和其他数据进行全面研究之后发现，该计划减少了贫困，减轻了不平等现象，并且没有促使伊朗人大批退出劳动力市场。事实上，一些人工作得更多了，这可能是因为他们利用收到的现金扩大了自己的小生意。经济学家发现，“除了与劳动力市场联系不紧密的青少年之外，我们没有发现现金转移支付减少了劳动力供给的证据，而服务业劳动者的工作时间还出现了上升。我们已经完成了的工作将这个问题的举证责任转移到了那些声称现金转移支付会让穷人变得懒惰的人身上，而且还表明了这个问题需要更好的数据和更多的研究。”

还有更多的研究表明，全民基本收入不会让世界充满游手好闲的人。宾夕

法尼亚大学（University of Pennsylvania）劳动经济学家伊万娜·马里恩库斯（Ioana Marinescu）为左倾智库罗斯福研究所（Roosevelt Institute）调查了北美开展的无条件现金转移支付实验的数据，她发现，“没有证据表明，在获得无条件现金的情况下工人会退出劳动力市场，即使现金数额较大也不会”。马里恩库斯的这项调查考察了东切诺基印第安人邦部（Eastern Band of Cherokee Indians），这是一个在大烟雾山（Great Smoky Mountains）有保留地的美洲原住民部落，他们还拥有由拉斯维加斯哈利士公司（Harrah's）管理的两个赌场。该部落将赌场收益分发给部落成员，每人每年发放4 000~6 000美元，这些资金似乎对兼职或全职工作没有多大影响。她还研究了阿拉斯加居民的数据，这些居民像伊朗人一样，能从该州出售的自然资源中获得红利。马里恩库斯再次发现，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对整个劳动力队伍的影响十分微弱，政府的分红让兼职工作的人数不降反增。她总结道：“我们原本担心如果免费发放资金，很多人会辞职。但现在看来这种担忧是错误的，是受到误导而产生的。”

她还考察了美国政府在20世纪六七十年代进行的负所得税试验，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和尼克松的政府寻求更多、更好的方法来解决深度贫困、劳动力参与度低和家庭解体等问题（负所得税或者说NIT提高而不是减少了家庭的收入）。在《脱线家族》（Brady Bunch）那个年代，政府在七个州进行了负所得税试点，这是美国最初的随机控制试验之一[有趣的是，唐纳德·拉姆斯菲尔德（Donald Rumsfeld）和迪克·切尼（Dick Cheney）也参与其中]。在大多数情况下，工作热情确实有所减少。例如，在西雅图（Seattle）和丹佛（Denver）进行的一项大型实验中，就业率下降得比较明显，达到了4个百分点。如果这种情况发生在今天的美国，将意味着就业人员减少了500多万。但是，正如马里恩库斯所指出的那样，这些研究基于就业人员自己报告的收入，而不是税收数据。有了负所得税后，人们就会有强烈的动机来隐藏自己的收入，以便获得更多的收益。但这一点对于全民基本收入而言不会有什么影响，因为无论收入或就业状况如何，基本收入都会照样发放。马里恩库斯总结道：“谎报收入的行为暗示着全民基本收入对工作时间的削减效果被夸大了。”

当然，当政府每个月发放的资金达到一定数额的时候，的确可能会让人们不愿意继续工作。沙特王子之所以闻名于世，不是因为他们长时间在小学工作或者实施物理治疗。明尼苏达州（Minnesota）的沙科皮德梅德瓦坎顿部族（Shakopee Mdewakanton Sioux）比东切诺基印第安人部族的成员少得多，他们拥有几个利润丰厚的赌场。报道称，截至2012年，该部族每月分发的赌场利润达到8.4万美元。一位部落官员告诉《纽约时报》（New York Times）说，“我们的失业率高达99.2%”。任何有偿劳动“完全是出于自愿”，而不是由于必要性。尽管如此，全民基本收入如果数额适当，似乎并不会促使人们大量退出劳动力市场。

此外，在各种全民基本收入和负所得税的实验中，工作时间的下降大部分都是因为以下原因：女性花更多时间照顾孩子；年轻人上学，而不是打零工换取微薄的收入；失业的人花费更长的时间寻找工作；能获得基本收入的人也可能会花更多的时间来照顾生病的父母、做志愿者、制作艺术品，或者花时间陪孩子。这可能导致国内生产总值以及就业人口比例下降，但这真的是一件非常糟糕的事吗？经济统计数据只能衡量它们所衡量的东西，而无法捕捉人类生活丰富的内涵。

有一个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因为捕捉了这种丰富性而脱颖而出。在20世纪70年代中期，加拿大政府向一个叫多芬（Dauphin）的草原小镇[“曼尼托巴（Manitoba）的花园首府”]的所有居民提供了有保障的收入。这是一个由农民组成的关系紧密的社区，许多人有乌克兰文化背景。实验确保所有家庭的收入都不低于一个特定水平，从而在社区内消除了贫困。在镇上经营美容院的艾米·理查森（Amy Richardson）谈到这个实验的时候说道：“这样做是为了让居民的收入达到应有的水平。这些钱使人们有能力往咖啡里加奶油。而且因为每个人都会收到这笔钱，所以没有什么好羞耻的。”像美国的类似项目一样，这项实验对劳动力市场也有相似的影响，工作人数略有下降，特别是在母亲和十几岁的男孩这两个群体当中。经济学家伊夫林·福格特（Evelyn Forget）发现，全民基本收入对城镇的健康和活力也有显著影响，它减少了人们对住院和心理健康诊断的需求。她告诉我，社区的价值观似乎也发生了改变。

尽管全民基本收入听起来似乎会摧毁劳动力，将美国变成满是退休人员的国家，但现有证据似乎并不支持这样一个激进的结论。在某些情况下，全民基本收入实际上还能鼓励人们参加工作，或者至少可以取代妨碍人们工作的福利系统。例如，芬兰拥有非常慷慨的失业保险制度。但是，芬兰人却不愿意从事兼职工作，因为因此获得的额外收入可能会导致他们失去政府的补贴。芬兰社会事务和卫生部部长（minister for socialaffairs and health）波特·马蒂拉（Pirkko Mattila）告诉《纽约时报》，“工作应当始终比待在家里领补助更有价值”。因此，芬兰目前给失业者每月发放560欧元（约合680美元），观察这将如何影响失业者与劳动力市场之间的互动。

一个更宏大、更广泛、更可怕的问题是，全民基本收入如何改变我们与工作的关系——如果人们有退路，不必为了生存而从事有偿劳动，那么工作究竟是什么？工作会变成什么样子？2016年春天，瑞士举行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全民公投之前，一群活动人士在日内瓦市中心的普兰帕莱斯长廊（Plainpalais Promenade）上张贴了一张创吉尼斯纪录的巨幅海报，海报上问了一个重大的问题：“如果你的收入有保障，你会做什么？”

斯科特·山顿斯（Scott Santens）有一个很好的答案。他可能是世界上最重

要的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他是经济安全项目的参与者，社交网站红迪网（Reddit）全民基础收入社区的主持人，他持之以恒地在网上鼓吹全民基本收入。正如他所说的那样，他还是“21世纪关注人类文明自我提升潜力的作家”。我应该补充一下，他本人也是全民基本收入的受益人。山顿斯使用在线众包的艺术家平台帕拉东（Paraton）来获得每月大约1 500美元的基本收入，这足以让他摆脱贫困，但还不能让他在新奥尔良（New Orleans）舒适地生活，不过他很快就指出，这足以让他掌控自己的工作和生活。他说：“当我没有基本收入时，我会接受50美元报酬的写作任务，即使我需要为此花整整一周的时间来研究和写作。因为50美元比一分都没有要好。现在我有了一份基本收入，我明白我的工作有价值，我的时间有价值，我也有价值。”

在山顿斯看来，全民基本收入不是应对技术性失业的良方，不是有力的消除贫困的措施，不是一种社会红利，也不是提高低收入工作者收入的方式。它包含了这一切，但还远不止这样：它是一种典型的转变，能让人们拒绝他们根本不想做的工作。从本质上来说，全民基本收入会减少马斯洛（Abraham Harold Maslow）“需求层次理论”的底层需求，在这个理论中，底层需求包括空气、食物、水和住所，而顶层的需求是自我实现的需求。他说，全民基本收入会给人们提供经济保障，让他们去过想过的生活。让机器人完成那些脏活，让人们去做他们想做的事。

“我们面临的不是无事可做的未来，而是一个没有就业的未来，”他认为，“我们都弄反了，认为工作能挣钱，如果没有钱，人们就不可能工作。只要我们还有货币体系，钱始终就是第一位的。所以我们需要确保每个人每个月都有足够的钱，让他们能够去做自己真心想做的工作。我们玩大富翁（Monopoly）游戏的时候也不会让玩家空着手。那为什么我们的经济体系却要人们身无分文地开始生活？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帮助实现向一个全新的系统的转变。”

在这种模式下，全民基本收入不是修补破败的经济的措施，而是走出资本主义制度下的薪酬体系的一座桥梁。社会将确保每个人的基本需求得到满足，不再让医疗保险、住房和食物受市场变迁的影响。满足这些需求后，个人将得到解放，去做他们想做的事情，可以拿着低薪做艰难的工作，也可以创业、照顾孩子，或者创作艺术品。最近，英国记者保罗·梅森（Paul Mason），数字经济专家尼克·斯尼斯克（Nick Srnicek）和未来主义者亚历克斯·威廉姆斯（Alex Williams）在推动各经济体建立这样的桥梁，用自动化尽可能地消除人类的劳作，并用全民基本收入，以及诸如全民医疗保健、免费上网和国家提供住房等政策来支持人们的生活。斯尼斯克和威廉姆斯在他们激进又引人入胜的著作《创造未来：后现代主义和没有工作的未来》（*Inventing the Future:Postcapitalism and a World Without Work*）

中写道：“我们应当做的是重拾现代性，反对影响着深刻的政策讨论以及情绪状态的新自由主义……这个反霸权行动只能通过想象一个更美好的世界来实现，并且要主动出击，不能局限于防御性的斗争。我们已经勾画出了一个可能的方案——“后工作政治”（post-work politics），它使我们能够创造自己的生活和社区。”此处应该暂停一下来强调这是一种多么激进的想法。经济增长、家庭收入，甚至不平等都将成为相对健康、长寿和繁荣而言次要的指标。随着衡量人类繁荣的更多质量性指标不断提升，国内生产总值甚至可能出现下降。

当然，这种乌托邦式的构想并不一定可以或者能够立即解决像詹纳·巴林顿·沃德这样的人的深层次的情感、精神和经济困境，他们只是想要一份有工资的工作。它也无法应对这样一个事实：数百万低收入美国人都想要工作，并且希望他们的孩子也有工作，数十年的经济、心理和医学研究表明，人们对自己的工作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它也没有考虑到能让人不工作的再分配制度可能会非常不受欢迎，并且改变社会对价值和劳动的认识可能需要几十年。例如，在玛格丽特·撒切尔（Margaret Thatcher）政府之前，英国“有一个失业补偿制度，允许你选择靠补助金生活，当时甚至还有反映这项措施的歌曲，这首歌唱道：‘我要去利物浦，领着国家补助，什么都不做。’”诺贝尔奖得主、自由主义经济评论员保罗·克鲁格曼（Paul Krugman）指出：“这最终成为英国一个非常不受欢迎的制度，尽管英国政治的种族分化程度远不如美国。说服一大批美国选民接受一个可以让人不工作的体系将需要很长的时间。”

有一天，我们与工作的关系可能会变化，这种变化也许需要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才能实现。与此同时，全球仍然有数百万人——有的在美国，更多的是在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在为马斯洛需求层次理论中最底层的需求而挣扎。围绕基本收入展开的不断增多、日益广泛的对话不仅出现在劳动和进步运动当中，不仅出现在硅谷，也不仅出现在富裕国家和富足的群体。众多发展经济学家和贫困问题专家也在讨论这个问题，他们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是一种有力、高效的方式，能缓解最严重的贫困。

我决定亲自了解一下情况是否真的如此，全民基本收入如何实现这一目标。

第四章
破解贫困

在维多利亚湖（Lake Victoria）不远处，靠近肯尼亚西部的奥巴马总统祖籍的地方有个村庄。如果要去这个村庄，需要从高速公路下来，这条高速路上铺着用泥土制作的限速路障。沿着一条没有指示牌、布满车辙的红土路，跟随着电线行驶。最后，这条路通向镇中心的小学，这是这里唯一一个通电的地方。生长着荆棘的小山丘里分散着一些住房，房子之间通过小路相连。

即使是按照肯尼亚农村的标准，这个村子也十分贫穷"（我同意不透露村子的名字，一部分是为了避免强盗盯上这个村子）。村子实在太穷，以至于在公共场合吃饭是很粗鲁的行为，因为会被当作炫耀自己有食物。整个村子只有一个水龙头能用，村里的妇女要走到湖边或深水坑，用油桶取水。由于缺乏修建厕所的建筑材料，一些家庭仍在户外排泄。摩托车和汽车很少，如果有人出现了紧急病情就会十分危险。这里几乎没有灌溉和耕种的工具，甚至没有足够强壮的能用来拉犁的牛，大部分耕作都是人工完成的。

每个人都在不停地劳动，尽管只有少数人有正式工作。人们通过将木柴烧制成木炭、饲养牲畜和做零工维持生活。几乎所有人都活在世界银行的每日2美元标准的极端贫困线以下，其中许多人每日费用为这一数额的25%~50%，甚至更低。

一个清爽的秋日，我拜访了村长肯尼迪·阿斯旺·阿巴吉（Kennedy Aswan Abagi），他的家中装饰着海报，海报的内容是庆祝本·拉登的死亡，还有一些是奥巴马的生活，奥巴马在这些地方被称为“贾科格洛”（JaKogelo）或“来自科格洛（Kogelo）的男人”。阿巴吉为我讲述了那天早晨，村子的命运似乎出现了转变。早前夏天的时候，一家名为“直接捐助”的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前来拜访他。他们告诉阿巴吉，他们所在的组织给人们发钱，不附加任何条件。阿巴吉说：“我问，为什么选择我们村？”但似乎从来没有得到过明确的答案。来访的工作人员只是说想要在一段时间里给他们一定金额的资金。

村民们感到难以置信。村里之前也来过援助团队，但他们带来的几乎都是物资，而不是钱，并且许多援助还附加了特殊的道德义务，比如怀孕的青少年无法纳入奖学金项目。几乎没有人知道谁会得到什么，一时间谣言四

起。詹妮弗·奥沃·奥歌拉（Jenifa Owuor Ogola）是一位曾祖母，她是村里一个一夫多妻的大家庭的女主人，她说，“我们听说他们是来抢小孩的”。其他人则认为“直接捐助”与光明会（Illuminati）有关联，他们会用巨大的蛇把这个村庄摧毁。甚至有人认为“直接捐助”会使用血魔法（blood magic）。（也有温和一些的谣言，他们听说这些钱可能是“贾科格洛”出的。）

但是，在一个异常凉爽的早晨，当一个“直接捐助”团队来参加一个特殊的巴拉扎（baraza），也就是市政厅会议时，村里人对送礼物的陌生人的怀疑消失了。村里几乎所有的成年人都挤进了学校楼房附近、电线杆旁边的蓝白色帐篷里。他们紧张、焦躁、期待、克制，看着一群陌生人坐到对面的塑料椅子上，这群陌生人中有白人。

这次会议以教会复兴的风格展开，有一唱一和的歌曲，众人还进行了祈祷，介绍了长者。然后，“直接捐助”组织的工作人员莉迪亚·塔拉（Lydia Tala）起身，用村民的母语卢奥语（Dholuo）发言。她讲话缓慢而坚决，在嘈杂声平息、听众点头之后才继续发言。这些到访者来自“直接捐助”组织。“直接捐助”是一个非政府组织（NGO），它与肯尼亚或其他地方的任何政党都没有关系。“直接捐助”位于美国，用手机开展活动，每个人都必须拥有自己的手机，并且不得将手机转让或交给其他人使用。参与者不能卷入犯罪活动或恐怖主义。这番发言持续了近两个小时，人们的目光越来越紧张，孩子们也焦躁不安。“我们能继续吗，还是有人睡着了？”塔拉说，“你们在打瞌睡吗？”

最后，她将麦克风递给了同事布莱恩·欧玛（Brian Ouma），那天早上他扮演了奥普拉·温弗瑞一样的角色，他问：“村民们，你们快乐吗？”

“快乐！”村民们齐声喊道。

村民们开始哼唱的时候，他问：“有人能带我们唱歌吗？”

“村民们，你们真是好歌手！你们爱教堂，对吧？很好。我也唱歌，我也在这里为你们唱过歌，是不是？”他又问道：“你们快乐吗？”

“很快乐！”人群回应道。

“好了，好了，”他开玩笑地说，“我只有几点要补充。”随后，欧玛高兴地表示，村里每个成年人都会从世界各地的匿名捐赠者手中收到钱。他说，“注册参与者每人每月都会收到2 280先令——大约22美元”。“你们听到了吗？”人群发出了惊呼，爆发了热烈的掌声。“在这里注册的每个人都会收到钱，2 280先令！每个月都有。这笔钱，你们在未来的12年都可以

得到。”

“多少年？”

“12年！”

就这样，整个村庄就要摆脱贫困了。村子成了旨在让全球收入阶梯最底层的数千人——甚至数百万人——摆脱贫困的大胆实验的第一个受益者。它也成为一个初创企业似的非营利组织颠覆人道主义援助行业的尝试，还是“任何地方的任何人，每个月即使什么都不做也应该得到钱”这种乌托邦式的观点的例证。在肯尼亚项目中，位于纽约，从硅谷获得了大量资金的“直接捐助”组织启动了世界上第一个真正的全民基本收入的实验，为整个社区无条件发放现金，并且保证会持续发放很长一段时间。

“直接捐助”对全民基本收入的兴趣与工作无关，与机器人或工会也没有关系，也不关乎劳资之间的争斗，仅仅是为了探索怎么样能获得最大的福祉。饥饿的人需要食物，那就给他们食物，对吗？不对，要给他们钱。需要收入的人需要工作，所以给他们开展就业培训，对吗？不对，要给他们钱。贫困地区的儿童需要接受教育，因此向他们提供学前教育和奖学金？这样做也无可厚非，但更好的方法是给他们父母现金。这个实验的论点是直接给人们现金更有效，而不是给他们提供物资或者服务，并且附带家长式的要求。

我听说过的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另一个论点是，任何数额的慈善捐赠或者转移支付计划以及安全网络措施，如果简单而且不附加任何条件的话，都会获得更好的效果。因此，我前往肯尼亚，探究发展中国家取代人道主义援助和消除贫困计划的现金革命，并思考这些实验中的经验是否能适用于美国。

* * *

给穷人发放现金会引发明显的问题，从肯尼亚村庄到旧金山的维多利亚式联排别墅，从瑞士各州到阿拉斯加的油田、印第安人保留地的城镇、印度乡下的农场，任何地方都会面临一些问题。

首先，全民基本收入会不会让人变得懒惰，给他们钱会让他们停止工作吗？就像共和党人所声称的那样，安全网不会很快陷入尴尬的局面吗？正如我们所看到的那样，这一论点在高收入国家遭到了彻底的反驳。事实证明，在发展中国家和世界上极度贫困的人当中也是如此。一些著名的经济学家最近研究了洪都拉斯、印度尼西亚、摩洛哥、墨西哥、尼加拉瓜和菲律宾现金转移支付计划的随机控制试验。他们发现，接受现金对男性和女

性的工作小时数或工作倾向都没有影响。实际上，在某些情况下，现金转移支付计划似乎提高了男性的工作量。另一项广泛的研究发现，现金转移支付收款人的工作量的确减少了。但工作量减少的群体主要是年长者以及需要照顾依附者的人，换句话说，这种结果是喜闻乐见的。

好吧，也许人们会继续工作。但是他们就不会浪费这笔钱吗？如果他们把钱全部挥霍在酒精、毒品和香烟上，削弱了预期的反贫困效果呢？这听起来像是美国这样毒品泛滥的国家会担心的问题。实际上，这种担忧在别的国家同样存在。在尼加拉瓜，一位政府高级官员担心，如果能从现金转移支付项目中得到钱，“丈夫就会在家里等着妻子领钱回来，然后拿着这些钱去喝酒”。

但有相当多的证据表明事实并非如此。世界银行（World Bank）的两位研究人员最近研究了世界各地的19个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没有证据表明收到现金的人在烟、酒等不良嗜好的消费上出现了增长。一项研究表明，秘鲁的一个现金转移支付计划让“餐馆里的糖果、巧克力、软饮和餐食”的消费出现了一定幅度的上涨，但谁会认为世界上的穷人不应当获得如此朴素的享受？顺便说一句，这项研究并没有发现现金转移支付会对酒精消费产生影响。

尽管如此，除了购买酒精和香烟之外，浪费钱的方法还有很多。什么能阻止人们挥霍钱财？这个问题在肯尼亚村庄也存在，许多非营利捐助者、经济学家、考察现金援助计划潜力的政府对此也十分担忧。在那次“巴拉扎”之后，村民们很快收到了严厉的警告：必须把钱用于生产性投资，比如山羊、牛、摩托车和渔网，而不是浪费在一些愚蠢的东西上。校董事会的理查德·奥洛洛（Richard Olulo）警告来开会的村民：“人让钱诞生，钱让人疯狂。”

这个问题上也有强有力的、令人安心的例证。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最近全面回顾了现金转移支付方面的研究文献，汇总了全球数百万收款人的数据，结果非常明显，入学率提高，拥有的奶牛、农业生产设备等生产性资产增多，营养不良现象减少，储蓄增加，童工减少，化肥和种子的使用增多。这项研究总结说：“这些证据反映出现金转移支付是强有力的政策工具，并凸显了这项政策能为受益者带来的潜在福祉。”也许最重要的发现——实际上也是一个同义重复的结论——就是现金转移支付在降低贫困率方面非常有效。

此外，“直接捐助”认为现金转移支付对收款人来说比食品、蚊帐或体育设备等实物捐助更有价值。如果你饿了，你不能吃蚊帐。如果村民们出现了腹泻症状，足球对他们来说没有什么价值。“直接捐助”的联合创始人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e）告诉我：“如果你去过那里，你很难想象除了发

放现金以外的任何措施。如果你问他们想要现金还是其他东西，那会让人非常不自在。他们看着你，就好像那是个带圈套的问题。”

他们当然想要现金。

* * *

费伊、保罗·尼豪斯（Paul Niehaus）、罗希特·万丘（Rohit Wanchoo）和杰里米·夏皮罗（Jeremy Shapiro）是“直接捐助”的联合创始人，他们在麻省理工学院和哈佛大学攻读研究生时，有了成立一个非营利组织给世界上最贫穷的人捐赠现金的想法。那是在2010年年末，马克·扎克伯格（Mark Zuckerberg）和他的室友刚刚成立了脸书。（当我问他们是否有过剑桥初创企业浪漫邂逅的经历时，费伊说，“我们当然没一直待在宿舍里”。）

然而在那个时候，在一个除了主要城市几乎没有银行基础设施的贫穷国家发放现金援助是不可能的。没有人把邮件送到肯尼亚偏远的村庄。发放现金将需要大量人力，更不用说还可能增大贪污和盗窃的可能性。但是技术提供了解决方案。21世纪初，价格低廉、大批量生产、带有现收现付记录的手机迅速占领了撒哈拉以南的市场。不久之后，积极进取的肯尼亚人、尼日利亚人和加纳人开始利用这种记录作为货币，用来帮衬家庭成员、向当地商人付款、接收来自国外的款项。电信巨头沃达丰（Vodafone）和英国国际开发署（British Department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决定要让手机转账更加容易，推出名为“移动钱包”（M-Pesa）的移动支付服务。肯尼亚电信公司狩猎通信（Safaricom）[注]无处不在的绿色门店变成了小银行，人们可以在那里把钱存进手机然后转给别人。

费伊和他的朋友们通过数十封邮件以及多次学生公寓聚餐进行了交流，在哈佛广场（Harvard Square）的办公室展开了讨论，然后他们决定建立一个网站，从美国捐助者那里筹集资金，通过移动钱包将这些钱发放给肯尼亚极度贫穷的人们。收款人有权按照自己的需求支配这笔资金，这与只能接受援助团体提供的特定物品截然不同。费伊前往肯尼亚考察这个想法，他去了因为选举后的暴力活动而流离失所的人们居住的难民营，搭乘快散架的巴士走访了一个又一个村庄，给当地人发放手机智能卡和现金。最终，费伊四人认为他们的方案是可行的，并一起制定了这个项目。几年之后，他们偶然跟一个与谷歌慈善（Google.org）相关的人会面，谷歌慈善是科技巨头谷歌公司的慈善机构，为他们提供了240万美元的捐款。然后，成千上万的肯尼亚人还有乌干达人和卢旺达人开始收到来自硅谷的资金。

“直接捐助”组织推崇低开销和数字化，用Excel宏脚本和谷歌地球（Google Earth）图像开展工作。“直接捐助”组织的捐款人、照片墙创始人之一迈克

·克里格（Mike Krieger）告诉我，“我记得我了解到的关于‘直接捐助’的第一件事就是他们用卫星图像观察房屋的变化”，比如新建房屋或者房屋的改善等，“这听起来绝对是一个科技公司会使用的工作方法”。

费伊说：“我们将‘直接捐助’视为连接捐赠者和个人的平台。”就像优步一样，但我们是为了捐助资金。就像爱彼迎（Airbnb）一样，只不过我们是为了人道主义援助。

* * *

在肯尼亚，我切身了解了“直接捐助”项目的程序。首先，这个非营利组织会找到一个贫困率高的村庄，选定这样的村庄的标准包括有茅草屋顶的家庭的数量等。像塔拉和欧玛这样会说当地语言的实地考察工作人员会拜访当地负责人，说明他们想要做什么，然后会与该镇所有居民举行一次“巴拉扎”（会议）。选定村子之后，“直接捐助”会邀请当地居民帮助他们进行普查，确定符合条件的家庭进行登记，并收集基本信息，如生日和职业等。然后帮助每一个参与者为接收现金转移做好准备。

在蒸腾的热气中，两位“直接捐助”的工作人员琳达·奥瓦（Linda Orwa）和博特维·奥彦多（Bethwel Onyando）坐在一位名叫查尔斯·奥马利·艾杰（Charles Omari Ager）的年纪较大的“男仆”旁边。艾杰穿着拉斯维加斯的科特斯（El Cortez）赌场的一件T恤，戴着一块淡粉色的数字手表。他充满怀疑地检查着全新的诺基亚手机。他解释说，自己通过给两个寡妇照料牲畜挣钱，以前他一直是用别人的移动钱包账户将挣的钱汇给他在另一个地方的妻子。他不知道怎样使用电话。

奥瓦向他展示了如何滚动手机的小屏幕，以及如何查看短信。奥瓦向我侧过身子，告诉我说：“我们这样做是避免他把手机交给别人，让别人来帮他转钱。如果他那样做，就很容易出问题。”

她用卢奥语和他交谈。她说：“这笔钱将持续发放很长时间，所以你要努力学会自己汇款和提款。每天练习，直到熟练。在发钱之前，每天都要练习。”他答应了会这样做。

开始发钱之后，“直接捐助”会通过短信、电话和雇用的当地“帮手”来开展这项慈善活动，并派工作人员亲自到村庄走访，以确保收款人收到了钱，但是“直接捐助”不会规定这些钱的用途。“直接捐助”还设置了热线电话，参与者们可以拨打电话询问技术问题或举报贪污、盗窃资金的现象。通常，人们打电话只是为了让慈善机构知道他们已经收到了现金，或者他们会花掉这笔钱。“直接捐助”目前的首席财务官乔·休斯顿（Joe Huston）对我说，“资金到位后的第二天，很多人都会拨打热线电话，因为他们非常

兴奋”。

在位于肯尼亚西部城市基苏木（Kisumu）的“直接捐助”组织的办公室里，休斯顿带我观看了他们基于云计算的后端，这让他们能够观察数千个收款人，追踪从捐助者到村民手中、在全世界流动的资金。数百名肯尼亚人的名字在屏幕上滚动，他说：“你能确切看到钱从手机上转出。”后来他告诉我，到2017年底，“直接捐助”以237名员工帮助了85 148人。每1美元中超过90美分的资金都直接发放给了低收入的肯尼亚人、乌干达人和卢旺达人。

费伊说：“我们已经建立了一个模式，可以在保持低成本的同时扩大处理规模。明年，‘直接捐助’可能要发放1.5亿美元。资金是完成这个目标以及实现后年发放3亿美元目标唯一的问题。”

* * *

在开展全民基本收入试点之前，“直接捐助”在一个村庄向最贫困的人一次性提供了一大笔资金，而没有长期向每个人分发小额资金。随机对照试验是经济学和其他学科研究的黄金标准，“直接捐助”的这个随机对照试验表明，现金转移支付具有强大的影响力。家庭资产增加了58%，商业和农业收入增长了38%，隐含的年回报率为28%。孩子们一整天吃不上东西的概率降低了42%。家庭暴力现象减少。这些资金甚至减少了收款人体内压力荷尔蒙皮质醇的数量。

在肯尼亚一个酷热的早晨，我和两位“直接捐助”组织的高管一起去考察发放现金带来的相对定性的影响。我们从基本收入试点村开车往内陆方向行驶几个小时，前往一个郁郁葱葱的小镇。（路上出现了一个特别后现代感的时刻，在我们迷路的时候，一个身穿童子军衬衫的男人给我们指了路。）

客观地讲，收款人的状况并不都是积极的。我们拜访了一位名叫安杰丽娜·奥科特·纳加洛（Anjelina Akoth Ngalo）的老年妇女，她关节疼痛而且肿胀，还得了严重的疟疾。她坐在茅草屋里，告诉我们她只收到了一笔钱，而她实际应该收到三笔钱。她把电话给了附近村子里的一个女人，那个女人已经把钱转出去了。纳加洛说：“她偷了我的钱。”她去找了村里的长者，试图把她的钱要回来，但是没有结果。她现在一贫如洗，一周只靠大概500先令生活。从前一天到现在她都没有吃过东西，疟疾药物也已经用完了。她有九个孩子，八个已经死了。即便如此，她补充说：“‘直接捐助’组织能来这里是一件好事。”（同行的一位高管对我说，按规定，应该有实地工作人员对纳加洛跟进随访，并且应该派出一个团队搞清楚到底发生了什么。）

“直接捐助”一次性发放资金的计划带来的结果好坏参半，这给他们的实地工作人员和受援村庄的居民带来了巨大的压力。我们见到了尼克勒斯·欧沃尔·奥丁（Nicolus Owuor Otin），他是社区和“直接捐助”组织实地工作人员之间的联络人，向工作人员展示各个家庭住房的位置。由于这个原因，其他村民以为他能决定谁家得到什么，村民因此想要烧掉他的房子。

但对于许多人来说，“直接捐助”的实验以极低的风险改变了他们的生活。当“直接捐助”最初找到弗雷德里克·奥蒙迪·奥玛（Fredrick Omondi Auma）时，他的生活十分艰难：贫穷、酗酒，住在茅草屋顶的泥土房子里，妻子离他而去。但是有了“天赐”的基本收入之后，他改善自己的生活，并且像经济学家说的那样从劳动力一跃成了人力资本。他用另一名男子的摩托车搭载乘客来挣钱，并用“直接捐助”发放的钱购买自己的摩托车。他还做起了小生意，在镇上的一个中心销售肥皂、盐和食物。他买了两头奶牛，其中一头生了小牛。他还在沿海城市蒙巴萨（Mombasa）开了一家理发店。

奥玛的收入从每周600先令增加到了2 500先令。妻子也回来了。他甚至还不像以前一样喝那么多酒。他说：“我以前会带着1 000先令出去喝酒，在酒吧醒来就只剩100先令了。现在我带着1 000先令出去喝酒，喝完在家里醒来，还剩下900先令。”

他指着屋顶说：“我没想到我能住在铁皮房子里。”又指着最近刚买的一双全新的登山靴说：“我没想过我会穿这么好的鞋子。我没想过我会有自己的生意，还能靠它挣钱。我没想到我也会有牛。”

“直接捐助”估计，长期分多次发放资金与一次性发放大量资金可能会产生类似的影响。一些仍然处在震惊当中的收款人很难想象他们的生活将如何改变。在我走访村庄的过程中，许多新加入的收款人才刚刚开始理解这个概念，确信在未来的12年中，自己永远不会再次陷入过去经历的那种贫困。他们还没有开始做任何长期的思考。那时候他们时刻担忧的是每天需要的卡路里从哪里来，或者家里有没有食用油，或者自己的身体状况是不是能出去取水，他们的思想还被贫穷禁锢在当下。

经济研究表明，这种现象十分普遍，就好像贫困减小了人们的精神带宽，还影响了健康、财富等许多方面。一项关于贫困在精神方面的影响的开创性研究表明：“穷人的收入时有时无，他们还要挣扎着兼顾各项开支，需要做出很多艰难的取舍。即使所做的决定与钱财无关，但这方面的忧虑也可能在做决定的时候出现并让人分心。人类认知系统的能力有限，对紧迫的预算问题的过多关注使能指导选择和行动的认知资源减少。空中交通管制员专注于预防航线上发生碰撞，往往容易忽视空中的其他飞机。同样，穷人在忧虑开支的时候就失去了充分考虑其他问题的能力。”这项研究表

明，紧迫的财务方面的担忧对认知的影响与通宵熬夜或智商的降低非常相似。

我问学校董事会成员奥卢洛和他的妻子玛丽，他们打算怎么处理这笔钱。他们说女儿家里的房子是茅草屋顶，他们想帮她改善一下。我问他们，考虑到接下来都会收到“直接捐助”组织发放的资金，在未来五年里会出现哪些不同？玛丽说“屋顶会弄好的”，然后就没再补充别的。

但对于其他人来说，潜在的影响似乎非常明显——可以想象、品味、触摸和感受到的东西。在附近的一间小屋里，住着一位名叫帕梅拉·奥库·奥德罗（Pamela Aooko Odero）的祖母，当我拜访她的时候，她正患胃病。她的家中没有冰箱，没有药物，没有交通工具，甚至没有电灯泡。她努力工作养着一家八口，全家的生活费用每周只有500～1 000先令，也就是每人每天10～12美分。这使他们面临着疾病、饥饿、贫穷和营养不良的风险。

奥德罗向我描述了她平常的一天。早上喝粥和红茶，因为家太穷，买不起牛奶或糖。她说：“我帮孙子们准备好，他们上学了，我就开始打扫家里。”然后，尽管年纪大了，她还得到树林里砍柴拿去卖。她说：“砍完之后，我把柴火背到这里，捆好，再从树林里背回去。到了吃午饭的时候，如果有东西可以做，我就做，如果没有，我就吃早餐剩下的东西。”她说这种劳作一直持续到下午，晚上她带着一个油桶到当地学校去取水，再喂养家禽牲畜。

“我为一家人准备一点晚餐，”她解释说他们经常吃“尼尤尤”（nyoyo），这种食物是玉米和豆类的混合，或者吃蔬菜和一种类似玉米粥的叫作“尤噶利”（ugali）的食物。但他们也经常挨饿。“饭后，我躺在床上，用家里的晶体管收音机听听世界上发生了什么事，然后在经过了漫长而疲惫的一天之后，我最终睡着了。”她计划首先要用收到的钱让家人获得更多、品质更高的卡路里。她告诉我：“会发生很多变化！我们不用再乞求施舍了。”

其他人考虑得更加长远。雇用艾杰的玛格丽特和玛丽是同一个男人留下的两个寡妇，她们告诉我，她们计划将资金集中在一起，跟几个朋友合伙开办一家小型银行，银行只给女性贷款，因为她们觉得女性更可靠。另一位当地妇女说她想成为一名美发师。还有一些女性打算跟丈夫一起存钱，改善住房，给院子重新种上植物，或者购买能创收的资产，比如山羊。

一个名叫普利斯特·阿鲁·奥多（Plister Aloo Raudo）的寡妇用卢奥语对我说：“我首先要处理三件事情：修建厕所；修理房子被白蚁损坏的部分；还要加固牲畜圈，这样鬣狗就再也偷不到我的牲畜。”她说：“有一天来了

一只鬣狗，偷走了我的一只母羊，拽着母羊的腿拖走的。母羊那时候刚产完崽，看着小羊无助又虚弱，非常可怜。我就请邻居帮忙，让她家也刚刚产崽山羊喂养我家的小羊，这样小羊就可以吃点奶，至少有活下去的可能。”

2016年10月24日上午10点43分，首批资金通过移动钱包发放给了村里的居民。当时，卡洛琳·阿金伊·奥德汗波（Caroline Akinyi Odhiambo）正在她的泥屋里，坐在凳子上给蹒跚学步的女儿喂奶，几只瘦小的鸡在进进出出找虫子吃。她的丈夫杰克（Jack）从他正在工作的施工现场打电话给她，让她看看她的新手机。一条短信出现了，通知她说收到了2 280肯尼亚先令。她还从来没有收到过这么多钱，露出了不知所措的笑容。

给玛格丽特和玛丽干活的艾杰那天把手机关机了，用塑料袋包好放在他的口袋里。就在他将两个寡妇的山羊和牛从一片干枯、荆棘密布的草地朝另一片草地上赶的时候，他遇到了一个援助工作者，那人让他拿出手机，于是他打开手机等待，他收到了短信，也收到了钱。他喊道：“我真高兴！我真高兴！我真高兴！”他兴奋得上蹿下跳、手舞足蹈。当天他就去买了一只山羊。

埃里克·奥德汗波·马多霍（Erick Odhiambo Madoho）也很高兴。他走到离村子最近的公路，和19个人挤在超载的小客车上，路旁零星有几头奶牛在吃草，车子沿着公路开到了维多利亚湖。在那里，他找到了移动钱包的门店，把手机里的资金换成了先令。他用这笔钱买了一卷渔线，他还需要再买两卷，然后自己动手做成渔网，用来去湖里捕罗非鱼。

大约三个月后，渔网做好了。他告诉我说，他会去租一艘船，再雇一名工人跟他一起干活。他估计，如果捕到的鱼多的话，扣除成本，一天的收入可以达到2 000先令。我问他捕鱼收益这么好，以前怎么没有存钱制作渔网。他耸耸肩，微笑着说：“我没有办法。”

在村里，浪费以及不能给人现金的想法显得很荒谬。一方面，村民们对浪费钱财似乎不感兴趣，他们并没有停止工作，也没有把钱花在无聊的事情上。另一方面，他们对钱的巧妙使用和由钱而产生的兴奋远远超出我的预想。他们并不是慈善案例，而是需要启动资金的创业者，为富足而奋斗的个人，追求更美好生活的家庭。而他们所缺的主要是现金。

* * *

“直接捐助”并不是第一个来到这个全民基本收入试点村的慈善机构。走在荆棘中，穿梭在房屋之间，我发现了大量多余的捐赠的水罐。一位妇女告诉我：“一直有人送来这个。”村子里有很多汤姆（Toms）帆布鞋，我看到

有几个房子的屋顶横梁上还放着几双。一个帮助贫困家庭支付孩子学费的非政府组织来过，他们援助了一些本身生活状况就相对较好的村民。这些慈善机构的初衷确实很好，但他们的努力似乎没有成效，甚至浪费。没有人需要更多的水罐，没有人需要汤姆的鞋子。但是很多人需要学费方面的帮助，尤其是村里最贫穷的居民。但他们却不是获得帮助的人。

当然，现金并不是唯一有效的援助措施。经济学家已经研究并证实了小额储蓄项目的效果，这些项目可以让农民有钱买化肥，帮助他们驱虫，获得能改善饮水卫生的加氯装置，实施补救性教育计划，等等。孟加拉的大型慈善机构——孟加拉乡村发展委员会（BRAC）找出社区中最贫穷的人，并向他们捐赠牛之类的生产性资产，提供指导、培训和支持，给这些穷人现金，并提供金融产品和卫生服务。该项计划效果显著，改善了消费、储蓄和粮食安全。

现金是一种经过验证、行之有效的援助措施，而慈善机构提供的许多商品和服务却不是。有时候慈善援助甚至会适得其反，伤害那些慈善机构本想帮助的人。以十分流行的汤姆鞋为例，这个公司推出了慈善活动，每卖出一双鞋子，一个生活在贫困中的人也能得到一双，公司把这个叫作“买一送一”，听起来是一个不错的想法。但是，大量的汤姆鞋出现以后，扰乱了当地鞋子制造商和零售商的业务，就像美国捐赠的服装损害了许多非洲国家的本土零售业一样。许多情况和气候条件下也不适合穿汤姆鞋，但汤姆公司捐赠的只有鞋子。而且就像我在肯尼亚看到的那样，收到捐赠的汤姆鞋的人往往不缺鞋子，缺的是电力或清洁水源。

几乎所有的实物捐赠，包括食品、服装、教科书、水罐和卫生用品等都存在这种问题，即使是那些通常被认为生产性的物品，例如慈善机构捐赠的牛等牲畜，也存在这样的缺陷。还有许多慈善机构修建学校，提供水泵，发放种子等。这些举措的本意都非常好。但是，真正的效果是什么？费伊对我说：“我们始终要问‘如果直接给人们现金是不是会更好？’通常这个问题没有办法回答。”因为没有衡量过。例如，汤姆鞋可能有助于防止儿童感染钩虫，但考虑到鞋子的价值和分发鞋子的费用，捐助接种疫苗的费用可能成本效益更高，更能改变生活。

援助专家们认识到了现金捐助的实实在在的效果，于是努力推动捐助者向援助组织提供现金而不是物品。美国国际开发署（The United States Agency for International Development）为在自然灾害发生后想要慷慨解囊的美国人提出了建议：“如何最好地帮助在飓风季节生活受到影响的人们？答案非常简单：向直接帮助受灾人员的救援组织捐赠现金。”他们还号召援助组织捐助现金，而不是物品。例如，慈善机构已经开始发放现金或预付过的借记卡，而不是在台风和洪水等灾难发生后提供需要的物资。在休斯敦受到“哈维”飓风（Hurricane Harvey）袭击之后，红十字会为39

个县的近50万个家庭各捐助了400美元。“直接捐助”组织在美国捐助者的支持下，也为得克萨斯州的几个遭受洪水灾害的低收入城镇捐助了现金。

难民援助团体也开始捐助现金，而不是推测流离失所的难民究竟需要什么。国际救援委员会（International Rescue Committee）的业务从缅甸到叙利亚，可以说覆盖全球，该组织将发放现金视作最有效的援助形式之一。它认为“躲避冲突或灾难的人携带的私人物品和钱都很少。现金救济让他们能购买基本必需品，重新掌控自己的生活。全球60%的难民居住在城市当中而不是难民营。现金已被证实是一种有效的援助方式，能够以更快的速度和更低的成本帮助他们。选择的权利可以让难民家庭决定他们最需要什么，也让他们能够成为当地经济的积极贡献者。”例如，一项由非政府组织进行的研究发现，每一位叙利亚难民在黎巴嫩的消费都为当地经济带来了超过2美元的经济产出。此外，海外发展研究所（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世界银行和联合国也号召人道主义援助更多地采用现金的方式。

但是，绝大多数此类援助——估计达到94%——都不是现金形式。我询问一些援助专家为什么会这样。他们表示，捐助者的抵触是原因之一，他们一直认为穷人会滥用这笔钱。要说服美国的执政者、英国的继承人和日本的企业家把他们的钱分给极端贫困的人，并让这些穷人按照自己认为合适的方式使用，这一点并不容易做到。华盛顿智库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公共卫生和发展专家阿曼达·格拉斯曼（Amanda Glassman）说：“大家普遍担心福利依赖问题，总体而言就是‘授人以鱼’的问题。这种担忧非常严重，可以说是慈善援助中存在的一种基本的心理特征。”

捐助现金这个概念也更难“营销”。美国纳税人可能非常乐意帮助年轻女性接受教育或支持学童接种疫苗。谁不想帮助小女孩完成小学学业或者阻止麻疹或白喉的传播？但是如果捐助对象是贫穷、不稳定的国家和人民，要捐助者们像用直升机撒钱一样慷慨解囊，他们还是会犹豫。格拉斯曼说，“把药丸放进孩子嘴里”的想法更吸引人。

制度惰性是另一个因素。援助组织大多是根据过去固定的方式和职责组建，其员工也是组织所认同的人。“直接捐助”的创始人兼加州大学圣迭戈分校（University of California，San Diego）的经济学家保罗·尼豪斯（Paul Niehaus）说道，“有很多优秀的人在这个系统中工作”。许多组织希望进行现金转移支付，但没办法做到。相反，他们收到的捐助往往有指定的用途，而现金转移支付让接受援助的人获得选择的权利。

此外，现金可能会迫使援助工作者和非政府组织面对这样一个事实：他们本可以采取不同的方式，而且往往还可以少做一些工作，来获得更好的效

果。全球发展中心（Center for Global Development）的经济学家贾斯汀·桑德福尔（Justin Sandefur）说："现金转移支付的支持者可能会说，'你们现在的代金券项目应该换成现金'，很容易证明发放现金比肥料更有效。他们还可能会说，美国国际开发署的预算比利比里亚的教育预算还要大，应该把它关闭，把钱直接捐给利比里亚人。"

即使不被当作直观的、能引起情感共鸣的方式，现金援助也往往被视作行之有效的选择。但在儿童挨饿、成年人早逝、食物匮乏、疾病无所不在、学费过高导致孩子辍学等情况下，效率的问题就有了深刻的道德内涵。没有成效的援助不仅无效，而且是一种浪费。而这些被浪费的援助原本可能在消除贫困方面发挥巨大的作用。正如布鲁金斯学会（Brookings Institution）的劳伦斯·钱迪（Laurence Chandy）和布里纳·塞德尔（Brina Seidel）所估计的那样，贫困缺口——让所有生活在世界银行极端贫困线下的男人、女人和儿童摆脱贫困所需的资金数量——约为660亿美元。这相当于美国人每年花在彩票上的金额，是世界人道主义援助数额的一半。

离开肯尼亚，我在思考"直接捐助"的基本收入实验会对关于现金转移支付的争论产生什么样的影响。肯尼亚村民与失业的芬兰人或美国公交司机显然不同。如果要让全民基本收入成为主流，必然需要更多的证据，这是"直接捐助"组织的硅谷支持者们共同的感受。奥米迪亚网络（Omidyar Network）的麦克·库布赞斯基（Mike Kubzansky）说："讨论和意见有很多，但几乎都没有事实基础。在我们看来，我们需要两个事实基础：一个来自富裕的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Organization for Economic Cooperation and Development，简称OECD）国家，比如美国，另一个来自新兴市场国家。"

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者也表示，他们需要有效的例子来向世界展示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能性，这样一来，等到美国要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时候，这项措施已经经过了彻底的审视。经济安全项目的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告诉我，有效的案例能带来全民基本收入"示范效应"。"我们还需要更多故事让这个理念被人们接受。"我不禁想起了埃里克·奥德汗波·马多霍和查尔斯·奥马利·艾杰这样的人，这些肯尼亚人让收到的现金发挥了作用。

最后，这当中可能还涉及更深刻的问题，无条件转移带给人权利和便利，而我们对穷人的决策能力心存怀疑。"直接捐助"信任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让他们以自己认为最好的方式支配钱财，而这正是美国人不愿意去做的。

---

1. 狩猎通信（Safaricom），肯尼亚最大的移动服务提供商。——译者注

第五章
“拼凑体制”

短短几天之后，这个印度东部的农村就要迎来季风的降临，季风会进入这个村落，在它的上空盘旋，穿过它，浸润一切，打破酷热的笼罩。孩子们正在田地里劳作，为即将到来的雨季做好准备。路边散落着婚礼派对的帐篷和柴油发电机。动物纷纷挤在阴影下乘凉。

在穿越班尼（Bamni）村的主路旁边，马哈托（Mahato）一家六口正挤在他们那用泥土和混凝土建造的房屋门口。家里一间房子用于起居和睡觉，另一间用来做饭，还要用作水牛棚。这个大约有3 000人的村落位于印度贾坎德邦（Jharkhand），贾坎德邦是印度相对贫困的邦。尽管印度的工业集团在开采这里丰富的矿产资源，但从农业发展、收入和基础设施等方面来看，贾坎德邦仍然十分贫困。该邦大约3/4的劳动力仍然从事农业生产，但农业占其整体经济总产值的比例还不到1/10。

与肯尼亚相比，贾坎德邦有众多旨在帮助像马哈托这样的家庭摆脱贫困的政府计划，而且有一些计划也确实发挥了作用，就像一位自称R.马哈托（R.Mahato）的村民告诉我的那样。他家达到入学年龄的孩子可以在学校享受国家提供的免费午餐，该计划能够增加卡路里的摄入量，并且每年帮助大约1.2亿儿童继续受教育。通过印度广泛分布的公共分配系统（Public Distribution System，简称PDS），他们一家还可以低价获得大米、小麦、盐、糖等食物。

他们本应该得到六个人的配给量，每个家庭成员都有，而实际上他们只得到了两份。马哈托是一个农民，还是一位劳工，他抱怨道：“我们只得到了十千克大米。”他说这样有时候家里人就要挨饿，“我们已经尝试了十次，想纠正这个问题。”家里两位父母也都没有从大规模的圣雄甘地全国农村就业保障计划（Mahatma Gandhi National Rural Employment Guarantee Scheme）中获得任何收入，这项计划为帮助当地公共工程项目建设的贫困个人提供工资。而且，虽然马哈托的妻子跟我说话的时候正在喂奶，但她从来没听说过政府会给怀孕或哺乳的贫困妇女发放津贴。

从原理上讲，现金补助对于马哈托这样的贫困家庭和印度政府来说都更好，这一点似乎没有人怀疑。印度许多扶贫项目都缺乏针对性，数百万有需求的人并没有得到实际帮助。许多项目甚至在倒退，帮助的是中产阶级家庭而不是最贫穷的人。其他项目还面临着严重的浪费、欺诈、滥用和腐

败问题：运往公共分配系统平价商店的粮食在途中消失，工资从来到不了工人手中，地方官员向计划参与者收取不当费用，记录上写着完成的工作但实际上并未完成。还有一些项目需要相当高的管理成本，以牺牲贫困人口为代价让官员获利。印度政府没有精简、灵活的反贫困体系，只有一个“拼凑体制”（kludgeocracy），这是约翰霍普金斯大学（Johns Hopkins University）政治学家史蒂文·特莱斯（Steven Teles）创造的新词。

出于这个原因，数十年来，印度的经济学家、政治家和政府官员一直呼吁从补贴计划转向现金转移支付或其他更简单的福利计划。在过去的五年，德里（Delhi）已经将该国几乎所有的男人、女人和儿童都纳入一个云计算生物识别系统，该系统叫作“Aadhaar”（艾德哈尔），这是印地语，代表“基础”的意思。印度已经开始将扶贫计划与这个系统相连，借此消除滥用和欺诈，并更好地发现和帮助穷人。印度政府已经开始通过艾德哈尔系统向穷人发放现金，而不是向他们出售享受补贴的货物。

政府首席经济顾问阿文德·萨布拉马尼安（Arvind Subramanian）告诉我，对这些扶贫工作而言，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自然的终点、首要的理想。他还认为如果印度政府推出全民基本收入措施，标准为每年7 620卢比，约合100美元，印度的绝对贫困率可能会从22%下降到1%以下。这一点值得再次强调：这个占世界1/3极端贫困人口的国家，这个因贫民窟和自给农业臭名昭著、因效率低下和腐败猖獗而声名狼藉的国家，正在考虑用全民基本收入措施作为参照，指引消除贫困的行动。印度的“拼凑体制”可能会变成“技术专制”，贫困也会因此消失。对我来说，硅谷、华盛顿的进步人士和欧洲的绿党带来的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兴奋，都赶不上印度对全民基本收入概念的变革性的应用，因为在印度，试图通过高效、有力、赋予人们权利和没有人评头论足的现金转移支付来消除贫困的不是某个慈善机构，而是整个国家。

在印度甚至全世界，全球经济增长在消除贫困方面的显著作用已经得到了证实。根据世界银行的数据，截至2016年，大约1/10的人生活在极端贫困中，而1990年的这个数据为1/3，超过10亿人跨越了极端贫困线。国际社会实现了雄心勃勃的千年发展目标（Millennium Development Goal），在五年内将极端贫困减少了一半。世界银行预计，到2030年，极端贫困将被消除，这主要是由于全球化、工业化、贸易、和平的环境、外国投资、技术变革、国际合作和政府旨在推动增长的政策等原因。

但是即使世界银行所定义的极端贫困被消除了，也并不意味着贫困和随之而来的选择、自由、自决、健康和包容等方面的缺失就会终结。研究人员指出，极端贫困线很低，一个生活在这个标准以下的人，每天只能吃一些玉米面粥或者米饭，一点水果和蔬菜，几汤匙油和糖，很少的蛋白质，也许还有一把坚果。他们只有几分钱能用于交通、住房、教育、医疗保健和

生活中需要的一切。极端贫困者不大可能拥有有助于增加收入的资产，比如自行车等。对他们来说，将收入的一半或3/4用于食物并不罕见。跨越每天两美元的标准——不同的发展组织在不同的时间使用了不同的标准，而且政府也经常采用各自的标准——本身意义不大，生活在两美元贫困线附近与生活在每天两美元的贫困当中并没有明显的不同。

此外，就像印度自身经历所表明的那样，强有力的增长和极端贫困率的下降并不能保证人人享有更好的生活条件。发展经济学家让·德雷兹（Jean Drèze）和阿马蒂亚·森（Amartya Sen）在他们的著作《不确定的荣耀：印度及其矛盾》（*An Uncertain Glory:India and Its Contradictions*）中对印度和孟加拉国进行了比较，以此来证明这一点。他们写道，印度的人均收入在1990年的时候比孟加拉国高出60%，在2011年是孟加拉国的两倍。然而，就在同一时期，孟加拉国在许多发展指标方面取得了比印度更好的成绩，其中包括生育率、教育成就、儿童死亡率和预期寿命等。他们指出："尽管印度人均收入的增长远远超过其他南亚国家（除巴基斯坦之外），但印度在许多社会指标方面却落后于这些国家，这个迹象表明，印度的'发展道路'存在着缺陷。"

全民基本收入能否成为终结贫困和促进发展的有效措施，确保全球最贫困的人们也能从经济增长中获益？即使印度没有给出这个问题的答案，也为探索这个问题提供了一个绝佳的平台。在古吉拉特邦（Gujarat）遥远的西部，当地官员一直在努力让援助更加简单、有效，我跟随他们了解他们的工作进展，并考察印度的艾德哈尔系统和现金支付是否与全民基本收入有相同的效果。在贾坎德邦东部，当德雷兹还有他的研究人员进行实地工作时，我一路跟随着他们。在这个过程中，印度政府在这方面的雄心勃勃、这个新颖而又古老的想法的潜力都让我心存疑虑。

* * *

尽管援助组织和非政府组织在扩大或实施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方面进展缓慢，但世界低收入和中等收入国家的情况却并非如此。据估计，目前有130个低收入、中等收入国家通过令人眼花缭乱的有条件和无条件的转移支付计划、养老金和其他项目向公民提供某种形式的现金援助。

这几乎可以称得上是"从全球发展中世界开始的革命"。这场革命始于20世纪90年代，巴西和墨西哥推出了试点计划，为低收入家庭提供了附加条件的资金，效果良好，于是这两个国家迅速扩大了试点，最终成为大规模和大众化的项目，这种模式也迅速在拉美、亚洲和非洲国家传播开来。巴西的"家庭补助"（Bolsa Família）向数百万人提供转移支付，条件是要让子女上学、要去当地的医疗机构检查等。在墨西哥，"繁荣"（Prospera）计划惠及了1/4的家庭，这项政策也提出了与巴西类似的教育和公共卫生方

面的要求。

当然，不论是对慈善机构还是政府而言，现金都不是解决所有问题的灵丹妙药，它不能代替学校、法院、公路、电网、清洁水源和医疗设施等公共产品，它也不能取代接种疫苗、终止对妇女的暴力等发展优先事项方面的行动。此外，尽管有研究表明现金转移支付的有利影响会延续，但目前还不确定在停止发放之后，现金转移支付对于接收家庭而言是否有长期的积极影响。另外，这种扶贫的现金转移支付对于更广泛的发展目标——不仅仅是在消除贫困方面，还包括改善一个国家的人力资本、促进国家经济增长等——有多大助益还有待考量。但是很显然，给一个家庭现金比派志愿者改善他们的房子或者给他们提供衣服和书本更有效。不过，有些问题的答案就不那么明显，比如说，相较于把钱捐助给穷人，政府把钱花在发电的大坝上是不是更好，或者说政府何时把这些钱用在大坝上会更好，这样的问题并不容易给出明确的答案。

尽管如此，现金转移支付计划是中等收入国家政府非常有效的反贫困工具，并推动了目前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对话，这一点已经得到了证实。“繁荣”计划降低了墨西哥贫血幼儿的比例，提高了贫困儿童的教育成绩，并让数百万家庭跨越了贫困线。至于“家庭补助”，世界银行的经济学家认为这项政策帮助巴西将极端贫穷率降低了一半，并缓解了巴西极其严重的收入不平等问题。如果措施得当，现金能够发挥重要的作用。

目前，印度将国内生产总值的相当大的比例用于消除贫困的工作，但很少有以现金为基础的方案，而且结果不尽如人意。例如，公共分配体系每年耗费印度约1%的国内生产总值。但政府在德里进行的大规模经济调查发现，在这项计划的支出当中，只有28%的人最终帮助了最贫困的40%的人。每年政府为穷人购买的谷物当中，有一半都会失踪。而且尽管投入了数十亿美元，这项计划仍然未能确保贫穷的印度农村居民达到政府的卡路里目标。

从某些方面来看，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中的相关数据也显示出了类似的效率低下问题。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已经启动了十年，德雷兹是该计划的先驱之一，其目标是每年为愿意从事非技术性体力劳动的贫困人士提供至少100天的工作量。近年来，该项计划帮助了5 000万个家庭。但是，这项计划带来的大约40%的收益没有进入最需要帮助的家庭，还有20%的资金从这个福利系统中“泄漏”出来，遭到私吞。最近一项研究调查了参与该就业计划的1 499个家庭，发现其中只有一半的家庭真实存在并且有家庭成员完成了所描述的工作。而且大多数完成了工作的人收到的钱比他们实际应得的要少。麻省理工学院的发展经济学家阿巴吉特·班纳吉（Abhijit Banerjee）告诉我，“村里的萨盘齐（sarpanch）负责安排就业保障计划的工作”。他所说的萨盘齐是村长的意思，“工作时有时无，有时候你拿不到

报酬。不管怎样，你都要受到萨盘齐的控制。”

而且总体上来说，印度政府难以确定谁是穷人，谁不是穷人，政府援助穷人的能力因此受到削弱。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的经济学家普拉纳布·巴尔汉（Pranab Bardhan）说："在有些国家，人们如果可以通过纳税申报或其他机制知道谁是穷人，那么就可以讨论现金转移支付究竟是否该附加条件。但是在印度，单是确定贫困人口这一项工作就充满争议、腐败和随之而来的各种问题。"他说，有一项调查未能准确找到哪怕半数的贫困人口，却将1/3的非贫困人口列为贫困。"在一个人口多达13亿的国家，这种错误意味着很大的差距，这个过程中充满了腐败。”

令我惊讶的是，萨布拉马尼安很大程度上赞同这种看法，认为福利体系出发点很好，但从很多方面来看，整个体系效率低下、效果不佳。他认为全民基本收入或类似的措施可以解决所有问题：会覆盖更多的穷人；会排除印度30个邦和地区之间的能力和腐败的差异因素，让分配规范化；能减少欺诈；成本更低，运行起来更容易；能消除中间环节；这样的措施更加平稳。萨布拉马尼安说："以比哈尔邦（Bihar）为例，它可能是印度第二贫穷的邦。在那里，就业保证计划实际上不起作用。……宁全民基本收入的好处在于，当钱发放进入银行账户之后，收款人可以绕过各个层级的官僚机构干预，而这些干预正是资金流失和腐败频发的环节。”

另外，鉴于印度已经在反贫困计划方面投入了大量资金，并且考虑到印度穷人的贫困程度，为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提供资金或许并不是无法克服的障碍。政府可以停止或减少目前对食品、化肥、燃料、火车出行、航空出行、厨房燃气以及贷款的补贴，还可以停止农村就业保障计划，每年释放出数十亿美元。将拥有汽车、空调和大量银行存款的人排除在外也可能有助于降低成本。剩下的资金还可以通过增加税收和提高纳税遵从度来获取。巴尔汉说："我们的税收与GDP的比率几乎一直不变。美国有资本利得税（capital gains tax），而印度没有针对长期资本收益的税收。美国有对农业收益的税收，而我们没有。如果我们愿意，我们可以动员出相当于国内生产总值10%的资金！”

* * *

萨布拉马尼安认为，印度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或受全民基本收入启发的现金福利体系面临着"第一英里"和"最后一英里"的挑战，前者指的是确定哪些是穷人，后者指的是将穷人与政府连接起来。他认为"JAM三位一体”（JAM trinity）系统或许能帮助德里做到这两点。

A代表艾德哈尔系统。这个系统由曼莫汉·辛格（Manmohan Singh）政府启动，并得到纳伦德拉·莫迪（Narendra Modi）的全力拥护。这个系统为

每个印度人提供一个类似社会保障账号的东西，从而将加尔各答的每一个拾荒者和孟买的亿万富翁与德里的联邦官僚机构相连。负责该项目的科技亿万富翁南丹·尼勒卡尼（Nandan Nilekani）告诉《纽约时报》:“我们正在创造的东西与道路一样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这是一条将每个人与国家相连的道路。”印度政府计划将每个人都纳入这个体系，截至2017年年中，超过99%的成年人注册了艾德哈尔系统，超过10亿个账号。

为了获得艾德哈尔系统账号，个人要在政府办公室或其他公共机构扫描虹膜和指纹，向政府提供种姓、婚姻状况、年龄等信息，然后使用虹膜或指纹来领取福利。世界银行前首席经济学家保罗·罗默（Paul Romer）告诉彭博社（Bloomberg）:“印度的艾德哈尔系统是我见过的最复杂的体系。它是诸如金融交易等各种关系的基础。”

三位一体中的J代表“简汉”（Jan Dhan）项目，这是莫迪政府开展的旨在为穷人提供正规银行服务的活动。2014年启动简汉项目的时候，莫迪表示，为了消除贫困，“我们必须让穷人能够享受金融服务”。（项目的印地语口号是mera khata，bhagya vidhata，意思就像“我的账户，创造我的命运”。）该项目已经覆盖了数百万人，为他们创建了与艾德哈尔系统相连的低成本银行账户，鼓励个人将其用于储蓄、汇款、养老金、信贷等。尽管如此，数亿印度人依然无法享受银行服务，现金仍占消费和商业支付的近80%，其中包括支付房屋和汽车等高价商品。

最后，M代表移动（mobile）。据世界银行估计，印度每十万成年人只有20台自动取款机，而美国则有165台。数千万成年人居住的地方离银行十分遥远，还有数千万人从来没有与银行业有过任何正式的交集。萨布拉马尼安认为：“要想将金融服务扩展到最偏远、最贫困的地区，必须培育促进移动网络支付发展的银行。然后印度可以从无银行社会跃进无现金社会，就像从没有电话的社会跨到手机饱和的社会一样。”但是印度没有肯尼亚移动钱包式的手机支付系统。

艾德哈尔系统的扩张，以及主要的扶贫计划与艾德哈尔系统的绑定已经开始解决“第一英里”和“最后一英里”的问题。现在，要想在政府运营的商店领取补贴大米或小麦，必须先注册艾德哈尔系统，并且需要扫描指纹。要想从就业保障计划获得工资，也必须满足这两个条件，而且工资必须发放到与艾德哈尔系统关联的银行账户。此外，德里已经开始向有资格获得厨房燃气补贴的家庭发放卢比，而不是提供燃气费用补贴。萨布拉马尼安希望还会有更多补贴转换成直接的现金福利。“这是我们想要建立的基础设施，让我们有克服‘最后一英里’问题的信心，”他告诉我，“如果你扩大现金转移支付规模，这种措施就日益接近全民基本收入。”

* * *

全民基本收入解决问题的可能性让华盛顿备感兴奋：印度现行的体系效率如此低下，在这样的国家，直接给人们现金不是显然更好吗？艾德哈尔系统不是为这种支付铺平了道路吗？如果印度这样的国家能够这样做，为什么美国这样的国家不可以？但是，在与印度的官员、经济学家、村民和政治家度过一段时间之后，我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潜力以及实施中会面临的困难认识得更加具体。简单性和普遍性的原则是好的，但是全民基本收入不是推崇和践行这些原则的最好或者唯一的方式。

在印度西部富裕的古吉拉特邦，我走访了兰吉特纳加村（Ranjitnagar）。在那里的一个分发公共分配系统补贴货物的商店里，沉默寡言的50岁妇女巴丽雅·杜利本（Baria Dhuliben）穿着一件装点着红色花朵图案的白色纱丽，她将手指按在艾德哈尔系统的指纹识别器上验证她的身份，领取分配给她的大米、糖和盐。但是系统发生了故障，她又尝试了一次，店主在电脑屏幕前有些焦躁。在两次提示系统故障之后，店主认为是银行出了问题。店里有白人记者的时候出现这样的问题，他对此感到十分恼火。店主让巴丽雅等会儿再来，她一声没吭就走了。

印度社会科学家进行的初步调查发现这些问题十分常见。之前的公共分配系统涉及纸质卡片、纸质记录、人脉关系还有严重的文件窜改问题。这些公共分配系统的商店需要稳定的互联网和电力供应进行交易，这在印度农村地区，特别是最贫穷和最偏远的地区难以得到保障。就算在线交易确实能够实现，这项措施仍然存在不足，因为有调查显示，许多身份认定结果其实都是“假阴性”，真正最为贫穷的家庭并没有得到他们需要的“卡路里”。

此外，还存在其他更加深刻的问题。在靠近孟加拉国的贾坎德邦附近，我与德雷兹以及他的同事一起调查了当地的艾德哈尔系统、贫困和社会保障网络情况。在班尼，我在镇上小学的门廊上睡过觉，并在一位新娘父亲的盛情邀请下参加了一场包办婚姻的庆典。我与当地居民讨论了政府怎样帮助他们，在哪些方面没有给予足够的帮助。阿贝·库马尔·奈格（Abhay Kumar Nag）是一个从事生存农业的农民，他向我讲述了他在使用艾德哈尔相关联的系统时遇到的问题。他一边伸出双手向我展示，一边说道，“你必须一次又一次地按手指”。问题在于他双手的手指肿胀、粗糙，指纹识别器无法识别，这在从事重体力劳动的人当中是一个十分普遍的问题。他还抱怨说，以前他可以请一个朋友或一个家庭成员拿着他的卡去领取配给。但现在他必须亲自去，尽管当地的店主认识村里所有人。

确实，由于艾德哈尔系统的原因，人们必须亲自去公共分配系统商店，这也是人们经常抱怨的一点。数百万印度人有“循环迁徙”（circular migration）的行为，随着季节变换，农民会从一片农田转移到另一片农田。还会有众多务工人员进入乡镇和城市，然后又回归家乡的农田，这种

流动也呈现出规律性。艾德哈尔系统将个人与单一的平价商店联系在一起，不允许本人之外的其他人领取配给。如果本人不在，就无法得到配给。同时，“循环迁移”不是唯一可以扰乱粮食发放的生活方式的变化。站在班尼村的外围，52岁的拉姆·桑卡尔·哈尔达（Ram Shankar Haldar）告诉我：“妇女嫁到村庄以外的地方也会出现问题，配给汇到她们的卡上，但卡绑定在原来所在村庄的商店。”

负责连接艾德哈尔系统与公共分配系统的古吉拉特官员承认了这个问题，并表示政府希望能尽快解决这个问题。桑吉塔·辛格（Sangeeta Singh）在她位于地区首府甘地讷格尔（Gandhinagar）的办公室度过周六，她认为艾德哈尔系统“的确让需求和援助的匹配更容易”。她说：“我们必须提高便携性，这也将是下一个合理的举措。”但是在贾坎德邦似乎没有看到这样的变化。

此外，注册艾德哈尔系统并将其与公共分配系统绑定让许多家庭失去了原有的补助，如谷物、燃料等，马哈托一家就是这样。离马哈托一家不远，另一位妇女向我们展示了她家厨房里的空煤气罐。现在她每次都要等现金发放之后，以全价购买煤气，她对此十分厌烦。她说：“他们一直跟我说钱会发的，但是一直等不到。”

但有一些印度人确实赞赏这种改变。在古吉拉特小村庄杰斯布尔（Jaspur）的公共分配系统店铺里，老板普拉贾帕迪（Amrutbhai Prajapati）向我们展示了打印出来的过去一个月里的交易记录，他说：“这里完全没有现金，我不需要再给别人赊账。”他的店里有几个顾客在排队等着买东西，付电费、保险费，预订巴士车票，给手机充值，续交有线电视套餐费用，这些都通过与艾德哈尔绑定的银行账户完成。

62岁的农民巴布海·帕特尔（Babubhai Patel）坐在外面的一把塑料椅子上。他展示了他的存折，存折上显示了政府发放给他的煤气补贴。他说：“过去，我们需要45天才能领到一个煤气瓶，有时候根本领不到。”当地机构会发放煤气瓶，但是派送的人有时候会把它私下卖给出价最高的人。如果要投诉这种行为，帕特尔必须去附近的一个小镇，在问题解决之前，帕特尔一家必须用柴火或干牛粪做饭。他说用这些燃料做饭“非常呛，肺里、眼睛和房子里都是烟雾”。房间里会留下一层煤烟，每年都必须粉刷墙面。家人吃得也就少了。但是现在，他很快就收到了煤气瓶和钱。他不需要再为做个薄煎饼而大费周折。

此外，至少有一位公共分配系统平价商店的店主告诉我，在与艾德哈尔系统绑定之后，由于新系统需要精确的簿记证据，这样可以防止他们再克扣政府发放的物资。普拉吉布·帕特尔（Prajibhai Ghanshyambhai Patel）说：“没有，我从来没有侵占政府粮食去黑市上卖。”但他说自己确实曾将

谷物作为礼品送给顾客或者留给自己。新系统意味着他所在的村子的村民收到的粮食更多了，收到的粮食足斤足两。

还有人表示并没有多少变化，艾德哈尔系统这种分配机制并没有改变被分配的物资、接受分配的对象以及他们的生活。在偏远的加迪（Ghadi）村，一位名叫兰加本·帕玛尔（Ranjanben Parmar）的农妇穿着一件粉红色的纱丽，坐在前廊上，向我展示了她的银行账单。她的账户里有544卢比，约合8.5美元。她说政府帮她修建了一个厕所，并送给她一辆自行车。但她说不出她有权享受哪些福利待遇，而我列举的许多福利她从没听说过。她补充说，艾德哈尔系统没有明显的作用。

帕玛尔的邻居看到我们在交谈，邀请我去她家。她家里只有两个房间，她向我展示了家里的冰箱，还说起她只有一个儿子，她已经与两个儿媳妇人选见了面。她的丈夫早在15年前就去世了，但她从未收到过寡妇可以享受的福利。她无奈地举起双手，说道："我不知道发生了什么。"

在贾坎德邦，一位名叫苏巴哈什·戈莱（Subhash Gorai）的农民停下来跟我交谈。他说在艾德哈尔系统经历调整的前一年，平价商店发给他的盐是蓝色的，颜色太深了，连牲畜都不肯碰。艾德哈尔系统怎么解决这些问题？他说镇里的农村就业保障计划也存在问题。技术已经减少了公共工程项目对人力的需求，因为在机器的帮助下挖掘灌溉洞要快得多。虽然技术改善了部分农民的条件，但也带走了现成的收入来源。

与此同时，一些非现金项目收到了不错的效果。古吉拉特邦和贾坎德邦的午餐计划效果显著，为孩子们提供了营养丰富、卡路里适当的午餐。此外，人们表示他们喜欢公共分配系统和农村就业保障计划，并不希望将这些转换为现金项目。即使已有项目的效果并不完美，但如果转换之后也有缺陷，为什么要改变他们了解并且知道有效的方案呢？

* * *

印度的改革启动不久，处于初级阶段，所以改革的效果尚不明确。再加上缺乏福利接收和家庭贫困程度的充足信息，印度的问题显得更加复杂。位于班加罗尔的奥米达网络公司（Omidyar Network）投资合伙人马杜卡（C.V.Madhukar）说道："意见对立的两派就少量的信息反复地争论。某个记者发现了一个故事，比如拉贾斯坦邦的一位老妇人没有得到补助。政府也发掘了一些有说服力的案例，这个或那个女人收到了钱。我并不是说这些都是假的，但是我们缺乏实实在在的数据。"

不管艾德哈尔系统有怎样的潜力，也不管它的短期影响如何，在我看来，如果仅仅将反贫困项目与艾德哈尔系统连接起来，并没有多大意义。里蒂

卡·凯拉（Reetika Khera）是一位经济学家，他是德雷兹的合作者，他对艾德哈尔系统持批评态度，认为该系统会损害隐私。他告诉我："当艾德哈尔系统刚开始出现时，有人认为这个系统能增进福利，因为它包括了原有政府援助项目中的人员。但它在这方面没有任何作用，连原理上的作用都没有，拥有艾德哈尔账号也不一定能获得福利，除非你符合福利项目的要求，并且可以证明这一点。"

更重要的是，在我看来，在将现有福利措施转化为现金转移支付的过程中，不可避免地会将一些人排除在外，让一些人落在后面，并伤害许多最需要帮助的人，比如那些拇指磨损的农民，不了解自己能获得什么福利的女性，找不到也不知道该如何使用自动取款机的祖父母。如果政府想要尝试转变福利体系，就意味着还要拿走官僚、中等收入家庭，甚至一些低收入家庭的资金，这在政治上是难以做到的。班纳吉原则上对印度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非常热心，他对我说："比如说水和电的补贴，取消这种补贴就像是踩政治地雷，因为享受这些补贴的是很有政治头脑的中产阶级。"对世界上最贫穷的人而言，取消他们了解和信任的福利体系，转而实施也许会产生不同形式的贪污甚至可能会失败的不确定的举措，会扰乱他们的生活。"

德雷兹指出精简福利举措也可能是一种狡猾的削减福利的方式。此外，将福利举措都转换成现金转移支付会让政府拥有充足的少数群体、政治活动家和公民个人的信息，并且与他们建立资金联系。他在开车去班尼村的时候告诉我："我不认为艾德哈尔系统能有什么帮助，如果想增加现金项目，那就这样去做。"他认为第一步应该是让印度扩大现有的高质量的现金转移支付项目，比如那个鲜为人知的针对哺乳期母亲的福利，还要为这些项目提供充足的资金。

印度和肯尼亚的情况表明，普遍、简单和无条件的原则拥有强大的力量。全民基本收入不一定是践行这些原则的最好或唯一的方式。对于班尼村的居民而言，确保农村就业保障计划能够更好地在所有地方发挥作用；宣传养老金和哺乳期母亲福利待遇，让更多符合条件的人注册参与；将补贴转化为现金等；这些措施是更简单、更直接的有效解决方案。不论政府决定怎么做，为深度贫困的人们提供更多资源似乎都是一个重要而紧迫的优先事项。

对美国而言似乎也是如此。

第六章
危险的边缘

缅因州（Maine）漫长的冬天刚刚过去，在一个寒冷、潮湿的早晨，我遇到了桑迪·毕肖普（Sandy J.Bishop）。那时候她已经在波特兰市中心的牛津街收容所（Oxford Street Shelter）里住了247天。

她坐在厨房里，面前的金属桌子上放着打算晚些时候食用的一杯酸奶和一块水果。她说她之所以穷困潦倒、无家可归还得从2006年说起。她告诉我，那一年她离婚了，住在沃特维'尔（Waterville）这个沿海的小村庄，没有工作，也没有多少社会帮助。当地造纸厂的关闭导致了残酷的失业现象，钱花费在餐厅、公寓楼和加油站，整个地区的经济陷入萧条。“没有工作机会，”毕肖普告诉我，“市中心就像个鬼城。”她没有车，所以没办法去奥古斯塔（Augusta）或者别的城市上班。此外，她还有一个女儿要照顾，两人靠食品券和社会福利勉强度日。这种社会援助在2012年的时候就中止了，那年她的女儿上大学，需要搬出去住。

毕肖普觉得自己最好也上大学，学习文科，让自己有能力获得更高的工资。缅因州实施了备受欢迎的“逐梦”（ASPIRE）项目，为福利领取者提供教育和培训方面的帮助，在这个项目的支持下，毕肖普注册了社区大学。但她的健康状况又出现了问题，无法正常上课。她失去了住房，也没有钱购买和保养汽车，所以还要想办法解决交通问题，在辽阔的以农业为主的缅因州显得尤其困难。

她从父亲那里得到了一小笔遗产，在夜校上课的那段时间，她就靠这笔钱生活。她说：“我本应该坚持继续晚上上课的，那样会对我有帮助。但是交通是个很大的问题，出行实在太不方便。”

由于大衰退对经济的影响，加上茶党支持的缅因州州长削减了社会支出，毕肖普从社会安全网络的“洞”里掉了下去，坠入了深渊。她的故事一波三折、循环往复：她得到“营养补充援助项目”（Supplemental Nutrition Assistance Program，简称SNAP）的帮助，然后又失去了；找到住处，然后又失去了；获得医疗保险，然后又失去了；得到社会工作者的帮助，然后又失去了。与此同时，她一直面临着严重的健康问题，包括关节炎、纤维肌痛、哮喘、糖尿病以及注意力缺失症等。没有残疾认证，她无法参加缅因州的医疗补助计划——缅因州医保（MaineCare），很难获得处方药。病痛持续折磨着她。

毕肖普试图获得社会援助的过程是一段卡夫卡式的经历，尽管她电脑技能娴熟、意志顽强，还获得了社会工作者的支持，但她告诉我："我花了很多时间去奥古斯塔，往返了好多次，实在太复杂了！"她接着说："我有三四次无法领取食品券，理由是没完成文书工作，或者没有拨打正确的电话号码。但实际上我做了每一件该做的事。"

2016年春天，情况有了转机。毕肖普得到了一个工作机会，一名社会工作者试图帮她获得残疾和医疗保险。毕肖普告诉我："我只需要找到一个一起住的人，或者如果我再领一个月左右的收入，就能够获得住房。我本可以得到那份工作和医疗保险。只差了一点点。"

一切都崩溃了。毕肖普本来可以在5月从她姑姑那里一次性获得一笔小额的遗产。但直到8月12日，才获得那笔钱。6月的时候，她没有钱了，无法继续支付租金。7月24日，长住的酒店把她赶了出去。

鉴于最近被驱逐，而且没有预付款或者存款，没有房东愿意租房给毕肖普，她无家可归，最终进入波特兰收容所。这也意味着她失去了奥古斯塔的工作机会。她陷入了极度贫困，这种极度贫困往往形成恶性循环。"一旦你无家可归，你就失去了一切，"她告诉我，"你找不到工作，申请不到公寓，还会有很多类似的问题。"

每天早上，当她离开收容所时，她都带着所有的物品，因为没有地方可以存放，收容所白天不让人留在宿舍里。她把自己的行李堆放在助行架上，把几个手提包挂在肩上，脖子上缠着三条围巾，还得费力地拖着两根手杖。她一般在施舍处吃饭，然后去公共图书馆或者装修了桌子、洗手间只在白天开放的收容所。（由于海洛因和处方止痛药泛滥，工人把浴室门的底部切掉几寸，这样他们可以看到里面，确保没有人过量用药。但是尽管如此，每隔几天还是会出现这样的问题。）毕肖普的钱包被偷了，所以她没有了身份证明。她有一部手机，但没有钱充话费。自从无家可归以来，她补办了两次出生证明。

到了这个时候，毕肖普的收入几乎为零，没有工资，也没有福利、劳动所得税抵免、医疗补助等政府项目方面的收入。她的收入极低，按照世界银行的标准，她在地球上任何国家都可以算作贫困人口。但是毕肖普生活在美国，这里大约有4 000万人生活在贫困中，100多万个有孩子的家庭每天的生活费不足2美元。布鲁金斯学会研究人员对极端贫困进行的"粗略"评估显示，就生活在极端贫困中的居民的比例而言，美国与俄罗斯、约旦河西岸地区、阿尔巴尼亚，甚至泰国不相上下，甚至比这些国家更高。这项评估的作者还指出："许多国家都是美国对外援助的接收国。"

当然，从许多非常重要的方面来看，美国的贫困不像那些国家一样严重。

在美国，医院必须为遇到医疗紧急情况的人提供治疗；我们有社会工作者，有残疾福利、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福利、食品券和所得税抵免等项目，有众多慈善机构和非营利组织，有免费就读的公立学校。但是即便如此，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安格斯·迪顿（Angus Deaton）告诉我，由于贫穷带来的社会耻辱，以及医疗保障和住房等基本商品和服务成本高昂，美国的极端贫困可能比发展中国家的极端贫困让人感到更艰难。迪顿说："如果你必须选择，是住在印度的一个贫穷村庄，还是住在密西西比三角洲或者密尔沃基（Milwaukee）郊区的拖车停车场，我不确定哪里会有更好的生活。"

出现这种情况完全是由于美国安全网的设计，就好像故意把网孔编得很大，让毕肖普这样的人能从孔里掉下去。安全网是为了帮助生活在特定环境中的某些人，并帮助他们满足特定需求。比如，失业保险适用于因自己过错以外的原因而失去工作的人；妇女、婴儿和儿童项目（Women，Infants，and Children program，简称WIC）帮助艰难地喂养孩子的年轻母亲；第八住房补贴方案（Section 8）适用于无法支付租金的低收入人士；医疗补助适用于低收入人员和残疾人士；所得税抵免适用于工资处于贫困水平的父母。

在许多州，没有受抚养人的健全成年人不能获得任何形式的福利。如果因无家可归、盗窃、毒品或酒精等上瘾、当地经济灾难、有虐待倾向的伴侣或单纯的倒霉而陷入极端贫困，往往很难或根本无法获得援助。在肯尼亚和印度，这种贫困似乎是令人遗憾但不可避免的，因为这些国家发展不充分。但在美国，情况并非如此。鉴于政府的能力、公民的财富，考虑到其他已经消除了贫困的高收入国家的情况，美国的贫困问题实际上是政策选择的结果。问题不在于美国无法让人民脱离贫困，而是缺乏帮助人们摆脱贫困的意愿。全民基本收入是解决这个问题显而易见的选择，不是吗？

* * *

美国现代福利体系源于伊丽莎白时期的英国。在16世纪下半叶，英国面临着许多经济灾难，其中最主要的是歉收造成的饥荒、封建公共土地转变为私人农场造成的失业，以及战争导致的贫困。成千上万的人饱受贫困或饥饿的困扰。年轻人在城镇中心聚集，寻找工作。由于担心出现社会动荡，议会和国王决定将反贫困作为国家而不仅仅是教会的职能。一系列"济贫法"（Poor Laws）授权教区增加税收和提供援助，但只限于那些被认为值得援助的人。"值得援助的穷人"（老年人、儿童和体弱者）将以现金补助或食物的形式获得"户外救济"（outdoor relief）。"值得援助的失业者"（失业，但正在寻找工作）在孤儿院和习艺所内获得"室内救济"（indoor relief）。"不值得援助的穷人"会受到惩罚。乞丐被鞭打和监禁，在某些情况下甚至会被处决，流浪汉要被烧红的烙铁在耳朵上烧一个

洞。

清教徒区分“值得”与“不值得”的这种痴迷也传播到了美国这个英属殖民地，并与美国强烈的个人主义精神和对自力更生的崇尚结合在了一起。在19世纪，许多地方政府向贫困者提供燃料、食物和现金等，但往往只发放给寡妇、贫困的母亲和其他“值得帮助”的群体。但从大萧条开始，美国建立了一个巨大的联邦机构，征收新税，提供社会保险和援助。赫伯特·胡佛（Herbert Hoover）在选举中遭遇惨败，富兰克林·罗斯福推行了新政（the New Deal），促进基础设施投资，推出公共工程项目，改革银行业等等。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The Social Security Act）包含了“养老金”（old age payments）的规定，政府还创立了“援助依赖儿童”项目（Aid to Dependent Children program）。

30年后，在林登·约翰逊（Lyndon Johnson）的领导下，这个社会安全网络又一次扩张，这是他在民权运动时期针对贫困的“无条件战争”的一部分。他在1964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说道：“许多美国人生活在希望的边缘，有些人是因为贫穷，有些人是因为他们的肤色，还有很多人这两个原因都有。今天为挽救失业青年投入上千美元，日后他可以在一生中创收4万美元甚至更多的回报。”在两党的支持下，他的政府扩大了社会保障项目，并创建了食品券计划、医疗保险和医疗补助计划。

后来政府还采取措施提高穷人的收入，杰拉尔德·福特（Gerald Ford）通过了所得税抵免，罗纳德·里根（Ronald Reagan）将这个项目进一步扩大。比尔·克林顿改革了新政时期的福利项目，这个项目最初针对的是寡妇和她们的子女，但直到20世纪90年代，享受这项福利的主要都是未婚母亲。他在竞选时主张要“改变福利”（ending welfare as we know it），他曾经两次否决共和党的改革建议，因为他认为这些改革过于苛刻，但最终还是在1996年颁布了一项法律，该法律规定了福利的期限，并要求接受福利的人必须找工作。奥巴马试图通过医疗改革法案推出罕见的覆盖全民的福利，但这种福利仍然要考虑受益者的收入调查结果。

这些系统大大减少了贫困。截至2015年，社会保障项目帮助2660万人脱贫；可退还的税款抵减（Refundable tax credits）帮助920万人脱贫；营养补充援助项目，帮助460万人脱贫；针对贫困老人、盲人和残疾人的补充安全收入（Supplemental Security Income，简称SSI），帮助330万人脱贫；住房补贴，帮助250万人脱贫。这些措施影响深远而持久，改变了很多人的生活。营养补充援助项目和所得税抵免减少了低出生体重的发生率。针对家长的税收减免政策可以提高孩子小学和中学的考试成绩。

但是这些系统并不均衡，它们对一些群体更有利，包括老年人、残疾人、有工作的穷人和一些孩子，这些人“值得”帮助。20世纪70年代以来，对于

失业人员的投入减少了，许多最脆弱的家庭仍然处于失业状态。确实，现在美国在社会保障上的支出远远高于1975年，但对收入水平最低的单亲家庭的支出下降了1/3。计算出这些数字的霍普金斯大学经济学家罗伯特·莫菲特（Robert Moffitt）说：“你以为政府会向那些收入最低的人提供最多的支持，为那些收入较高的人提供相对较少的帮助，但情况并非如此。”没有哪个项目关注解决深度贫困的成年人的需求。没有一个方案直接、无条件地应对深度贫困问题。

安全网的漏洞并不是设计原因导致的，而是有意为之。

* * *

我在缅因州遇到的那些人——从日益贵族化的波特兰到东海岸农村，在蓝莓农场和龙虾捕网旁，在食品储藏室、收容所、集体住所和非政府组织办公室——都展示了贫困陷阱的危险性。

有时候，反贫困项目提供的资金数额似乎太小，无法真正提高受益者的生活水平。我在波特兰的一个倡导团体“无家可归者之声”（Homeless Voices for Justice）的成员会议上遇见了黛博拉·马维特（Deborah Marvit）。她是个瘦小的妇人，身穿鲜艳的紫色衣服，年纪85岁左右，那时候她眼部出现了感染。自从2016年7月以来，她一直无家可归，住在女性收容所。她告诉我：“我每个月可以从社会保障项目得到104美元的收入。”她解释说，她一生中大部分时间都是自由职业者。

有些项目太过复杂，真正贫困的人很难获得帮助。我与非营利反贫困组织“普莱布尔街”（Preble Street）的宣传总监简·班德斯·泰利（Jan Bindas-Tenney）一起拜访了一位名叫卡洛琳·西尔维斯（Carolyn Silvius）的老妇人。她之前的房东坚称她在室内吸烟，将她赶走，从此她无家可归（她告诉我，她并没有在室内吸烟）。在那之后，她和孩子们住了一段时间，但这对他们来说负担太重。孩子们认为如果她住在收容所，她可能会得到更好的社会援助。“我们三个人谈过了，”西尔维斯告诉我，“他们说，‘除非你真的无家可归，否则你不会得到任何服务’。他们还说缅因州不会让一位残疾的老太太长期待在收容所里。”

最后她耗费了好几个月，艰难地寻找住房，经历了令人抓狂的烦琐的官僚程序，这与毕肖普的遭遇如出一辙。西尔维斯说：“他们告诉我‘你每个月会收到17美元的食品券’。”她问为什么，被告知这是因为她没有申请取暖补助。但她住在收容所，根本不能申请取暖补助。西尔维斯说：“我没有付房租，所以我没有暖气账单。”她补充说，波特兰社会保障局已经从市中心搬到了机场，让很多贫困人员接触不到，其他几个和我交流过的人也反映了这个问题。

还有人虽然有资格领取福利，却难以按标准完成所需要的文书工作。我在农村小镇奥兰德（Orland）遇到了劳丽·凯恩（Laurie Kane）以及和她共同生活了17年的伴侣埃德蒙·奥斯本（Edmund Osborne）。凯恩患有严重的焦虑症，还有其他一些健康问题。两人一无所有，附近也没有诊所。因为她没钱去看医生，所以没有医生可以证明她是残疾人，因此她没能获得缅因州医保。“我没得到缅因州医保，因为我被当作健全人，能够工作的人，”她告诉我，“很多人都说，‘你可以得到免费的医疗服务’。他们说，你可以去浮动收费的诊所，每次20美元。但是如果我拿不出20美元呢？”

凯恩说由于她的健康状况和无法证明的残疾，她难以达到缅因州营养补充援助项目的工作或志愿者要求。她告诉我，光是把文书填写好、寄出去就已经很费力了。她说：“我很担心失去这项补助。”

这些勉强度日的人，一次又一次地强调，贫困本身阻碍了他们摆脱贫困，缺乏支持使得无法自力更生，贫困让人丧失了尊严。没有人愿意雇用无家可归的人。他们认为医疗保健应当放在最重要的位置。他们为自己的后辈担忧。生活在收容所让他们觉得不适、疲倦和沮丧。

在“普莱布尔街”组织，我遇到了托马斯·帕切克（Thomas Ptacek），他是一名老兵，曾在一家比萨店担任经理，失业之后无家可归。他卖掉了光盘和其他物品，但没能迅速找到一份工作，最终失去了住处。他此前没有贫困的经历，陷入贫困之后，他住进了收留无家可归的人的收容所。在那里待了一年后，他感觉与家人、朋友、劳动力市场和社会越来越脱节。

“对我来说，营养补充援助项目是为了让人们的生活保持正常状态，”他说，“这种状态能促进其他的成功和进步。”他领取了补助，有钱买一品脱冰激凌。他说：“我已经有一年多不能选择”吃的东西了。你在商店使用营养补充援助项目的食品券，人们会对你该买什么指指点点，但他们不知道这对于使用食品券的人来说意味着什么。”

* * *

保罗·勒佩奇（Paul LePage）于2010年当选缅因州州长，这在很大程度上是一个意外。当时民主党和独立派斗争激烈，共和党渔翁得利。尽管缅因州的紫色选民（摇摆不定的选民）没有明确要求，但这位受到茶党支持的政治家却开始着手改革——削减国家安全网络。他使用行政权力为营养补充援助项目增加了工作要求、资产测评和时间限制，要求接受援助的人每周工作20小时或每月承担24小时的志愿者工作。他减少了缅因州医保对身体健全但收入极低的成年人的援助，还削减了贫困家庭临时救助（Temporary Assistance for Needy Families，简称TANF），用于现金援助的缅因州联邦经费也越来越少。

勒佩奇言论浮夸大胆，偶尔还会表现出种族主义情绪，这听起来与特朗普很像，他称自己“在特朗普流行之前就已经是特朗普一样的人了”（其实他讨厌特朗普）。但他的政策赢得了意图缩小福利国家规模、忧心福利依赖的保守派人士的支持。遗产基金会（Heritage Foundation）的学者在2016年写道：“缅因州食品券计划附加了工作要求，这是合理的公共政策，政府应该帮助那些需要帮助的人，但福利不应该是单向的施舍。作为得到援助的条件，从政府那里获得现金、食物或住房援助的身体健全、非老年人的成年人应该工作或者为工作做准备。”

在我写这本书的时候，一些红色州（支持共和党）正在效仿勒佩奇在缅因州开辟的道路，试图将工作要求附加到营养补充援助项目当中，扩大药物测试，增加低收入家庭的文书工作负担，缩短获得援助的资格期限等。（一些政治家已经开始用《新约》作为改变营养补充援助项目的理由，引用《帖撒罗尼迦前后书》（Thessalonians）中的话：“如果一个人不工作，他就不能吃东西。”）众议院议长保罗·瑞安（Paul Ryan）也表达了为联邦医疗补助和住房计划附加工作要求的意愿。特朗普领导的白宫正在筹备一项福利改革计划，试图实现同样的目标。

表面上看，这些措施的动机是鼓励依靠福利项目的人参加工作，减少所谓的福利依赖。“这里涉及一个重要的问题：成功的定义是什么，缅因州对福利项目做出这样的改革和改造是因为我们拒绝用不断增加的福利项目工作量来定义成功，缅因州的福利项目一直在将人们困在贫困当中。”时任缅因州卫生与人力资源服务部（Department of Health and Human Services）主任的玛丽·梅修（Mary Mayhew）告诉我：“我们经常谈论美国梦，却设计了将人们困在贫穷的噩梦之中的福利项目。我们在评估一个人的时候，不应当根据他贫穷的状态和他当前的情况，而要考虑他的潜力。我们应当注重调整福利项目，使其成为通过就业来摆脱贫困的途径。”

但反贫困倡导者说，这种改变不太可能会减少贫困或者提高就业率。预算和政策优先事项中心（Center on Budget and Policy Priorities）是一个位于华盛顿的智库机构，就职于该智库的莱丹娜·派维迪（LaDonna Pavetti）表示，为福利附加工作要求对那些本来就可以找到工作的人来说没有太大作用，而对于不适合工作的人来说，这个要求没有任何帮助。“很多贫困人员想要工作，但由于一些原因找不到工作，而这些问题是附加工作要求无法解决的。比如贫困人员缺乏雇主想要的技能或工作经验，缺乏托儿援助，缺乏社会关系帮助他们发现职位空缺并被聘用，或者他们有犯罪记录或其他个人问题导致雇主不愿意雇用他们。”她还写道：“此外，当父母无法满足工作要求时，他们的孩子可能会处于压力大、不稳定的环境当中，这会对孩子的健康、向上发展的前景以及成功造

成负面影响。”

为了证明这一点，可以看看1996年的福利体系。在福利体系改革刚刚结束的时候，这项举措看起来似乎取得了成功。但是，促使母亲们进入劳动力市场的主要原因是经济繁荣和所得税抵免等税收激励政策。当经济下滑时，由于资金匮乏，加上各州政府对领取福利做出了更多限制或者干脆停止发放福利，福利体系的覆盖范围明显缩小了。例如，在2015年，怀俄明州（Wyoming）的福利项目仅覆盖5%的贫困儿童，佐治亚州（Georgia）的福利项目几乎不存在，尽管该州面临着普遍的严重贫困问题。

美国最脆弱的家庭最终变得更加脆弱，这当中包括没有时间和资源去申请福利的家长，因为福利带来的耻辱而放弃申请的个人以及被福利体系行政人员拒绝的人。贫困问题研究人员凯瑟琳·埃丁（Kathryn Edin）和卢克·谢弗（H.Luke Shaefer）研究了美国极端贫困人口的生活和应对方式。在两人的著作《每日2.00美元》（*$2.00 a Day*）中讲述了一位女性的经历，福利体系的工作人员告诉她，贫困家庭临时救助资金不够了，工作人员说，“亲爱的，我很抱歉，需要帮助的人实在太多，我们资金不够了”。

在缅因州，结果也十分相似。政府增加了领取福利的限制，开展了对福利体系的改革，而与此同时，领取福利的人数下降，其中并不一定有因果关系。但最不稳定、最贫困的家庭的确受到了严重的冲击。缅因州的援助项目经历了缩减，而同时缅因州的就业率下降了一半。研究表明，从福利项目中被剔除的人生活变得十分艰难。缅因大学（University of Maine）对受到营养补充援助项目时间限制影响的家庭进行了调查，结果发现了严重的饥饿和无家可归问题，受影响的家庭年收入中位数仅为3 120美元。勒佩奇做出的这种调整似乎加剧了贫困：缅因州儿童的深度贫困率已经达到全国平均水平的8倍，2011—2015年，缅因州的这一比率的增长幅度高于美国其他各州。

随着勒佩奇的政策调整全面生效，非营利组织的工作人员表示他们已经难以满足援助需求。救济厨房人满为患，免费分发食物的食品储藏室也面临困难。“我们无法跟上需求，”班德斯·泰利告诉我，“还差得远。”在北边遥远的切里菲尔德（Cherryfield），被称作“世界蓝莓之都”的农业小镇，我去当地一个食品储藏室看了看，了解到他们已经开始在当地的小学设置储藏柜，因为很多孩子都是饿着肚子去学校的。

* * *

共和党关于安全网的许多言论都关注“依赖性”和“通往就业的途径”。诚然，在某些情况下，安全网大大降低了争取工作或获得更多收入的动机，因为这样意味着失去福利收入。的确，对需要培训或需要帮助来获得第一

份工作或者让生活步入正轨的人来说，提供一条能通往就业的道路似乎是对资金的合理利用方式。而且，确实由于共和党和民主党在当政时期都扩大了联邦福利体系，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已经变得依赖福利，难以割舍。

然而，在面对无家可归和极端贫困现象的时候，关于“依赖”和“就业途径”的讨论显得非常奇怪。按照联邦政府的收入门槛来衡量，生活在深度贫困中意味着一个只有一口人的家庭每年只能赚取6 000美元，或者有一个孩子的家庭每年只有8 000美元的收入。我遇到的那些人都认为这种处境令人煎熬。西尔维斯痛恨在收容所等待公共卫生间，有一次她排队等候的时候尿了裤子。毕肖普讨厌没有私人空间放置私人物品，她的东西经常被盗。她告诉我：“在收容所，你睡在垫子上，这很困难，很多人需要更舒适一些的环境才能睡着。收容所太小，太拥挤，没有足够的空间，同时也十分老旧，感觉摇摇欲坠。你真正需要的首先是有个地方可以安身，然后还可以获得帮助。”

对于凯恩来说，其主要需求是住所和医疗保健。凯恩说：“社会工作者对我说：‘我们会为你提供某种保险。’但我需要证明自己残疾。”还有一些人的需求是获得帮助来摆脱酒精或阿片类药物，需要交通费，或者需要针对精神健康问题的强化咨询和药物治疗。在这种情况下，一份工作或附加工作要求不可能成为摆脱贫困的首要或主要途径，像食品券或住房券这样的措施也可能远远不够。失去了比萨店管理职务的老兵帕切克向我描述了他怎样才能重新走上正轨，他说：“我经常说（从这里）到那里有30个第一步，但我没办法走出全部30个第一步。”

但是让穷人走完这每一步，或许意味着认为他们值得这样对待，理由就是贫困本身，除此之外不需要别的原因，而这一点在现在和从前都不是美国社会契约的一部分。美国人认为，住房抵押贷款利息减免和接受第八住房补贴方案的补助之间存在道德上的区别。我们因为穷人的贫困而对他们指指点点，将他们边缘化，羞辱他们，甚至要求他们提供尿液样本，强迫他们为了获得医疗保健承担志愿工作。我们就这样忍受着荒唐的贫困，美国的这种贫困在所有发达国家中都显得极不寻常。

这种贫困的代价巨大，不仅是对经历其中的人来说，还是对我们所有人来说都是如此。2007年，乔治敦大学（Georgetown University）劳工经济学家哈利·霍尔（Harry Holzer）估计，每年仅儿童贫困问题就会导致美国损失大约4%的GDP，这是因为儿童贫困会降低生产力和工作产出，提高犯罪发生率，增加儿童成年后的公共卫生支出。这些共计大约7 000亿美元，略微高于美国在军事上的支出，只比社会保障方面的支出低一点点，他表示，这还都是保守估计。“除了那些与生产力、犯罪和健康相关的贫困导致的不良后果之外，他们忽视了贫穷可能给国家带来的其他问题，例如环境后果和穷人的悲惨境遇。”

换句话说，让每个人脱离贫困、获得稳定生活带来的尊严不只是一种慈善行为，还将是对具有创新性、创造力和为更广泛的福祉而工作的人们的简单投资。

* * *

自由主义者查尔斯·穆雷（Charles Murray）告诉我，福利国家存在两个方面的问题：一方面，美国有数百万人陷入贫困；而另一方面，美国为解决贫困问题花费了大量资金。他表达的是自由主义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观点，弗里德里希·哈耶克（Friedrich Hayek）和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对此也表示赞同。哈耶克倡导“每个人都要有一定的最低收入”，作为一个“即使无法养活自己，也不会继续堕落下去的底线”。弗里德曼提倡负所得税，尼克松采纳了这项提议。“让我们为每个有孩子的美国家庭设置一个收入底线，”尼克松在1971年的国情咨文演讲中说道，“同时消除对人们尊严的侮辱，这种侮辱贬低人格、刺痛人心，对很多接受福利的孩子造成了严重的伤害。”

20多年来，穆雷一直呼吁消除现有的福利国家制度，将医疗保险、医疗补助、社会保障、福利、第八住房补贴方案等全部废除，取消企业补贴和农业补贴，用每月1 000美元取而代之。他认为：“我们即将迎来不同于以往任何时期的劳动力市场，这样做是我们唯一的希望。”让人们对自己的发展负责，而不受政府干预，这是“振兴美国公民社会的最有希望的方式”，将促使人们更多地依靠彼此，减少对政府帮助的依赖。穆雷写道：“政府机构是处理人类需求的最糟糕的机制，它们对所有人制定同样的规则，这些人面临的问题从纸面上看起来似乎一样，但他们会对不同形式的帮助做出不同的反应。”

但是穆雷的方法也存在一些问题。他说得对，美国有相当多的反贫困项目，而且这些项目使用起来确实容易让人困惑，有时也难以管理。但是通常它们的管理成本很低。主要的反贫困项目——营养补充援助项目、医疗补助、住房券、补充安全收入、所得税抵免和学校午餐计划等——都将至少90%的资金直接用于福利支出，大部分反贫困项目直接用于福利的资金比例远超90%。社会保障体系每1美元的资金就有超过99美分用于福利支出。精简开支只能节省很少的钱。

此外，如果消除美国现有的反贫困项目，将其转化为全民基本收入，而不对安全网做出其他改变，有可能会加重贫困问题。这一点计算起来十分容易，经济学家艾德·多兰（Ed Dolan）估计，如果保留提供或补贴健康保险的福利项目，废除其他经过收入调查的福利举措，那么每人每年将增加1 582美元的收入，这本身并不会让任何人脱离贫困。穆雷建议每年给每个美国人13 000美元，并要求其中的3 000美元用于健康保险。他还建议，

对于年收入超过60 000美元的人，每年发放的资金应降低至6 500美元。尽管如此，在这个制度下，数百万低收入家庭的生活可能会更加艰难，贫穷和不平等也可能会恶化。

一些关于全民基本收入更稳健的建议可能对于减少贫困和不平等现象也没有太大意义。例如，按照安迪·斯特恩建议，每个月给所有成年人1 000美元，还要给老年人额外的福利。他明确表示要终止“目前126个福利项目中的多个项目”，并通过削减社会保障支出、提高一些他没有指出名目的税收来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提供资金。也许这不如穆雷的计划激进，但仍然可能无法降低贫困率。法律学者丹尼尔·赫梅尔（Daniel Hemel）写道：“按照斯特恩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单亲父母想要摆脱贫困，必须在时薪7.25美元的最低标准下每周工作至少32小时。如果这个单亲家长是唯一能照顾孩子的人，尤其是如果斯特恩用联邦儿童托管保育经费作为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资金来源，那么对于单亲家长来说生活将十分艰难。”

关键在于全民基本收入并不是万能的，政策设计非常重要。尽管全民基本收入声誉卓著，但它并不是真正的两党联立的政策解决方案。目前有一种有害的、没有意义的想法认为，全民基本收入会吸引两党，是能实现共同目标的两党合作的手段。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想法也许对两党都有吸引力，但其目的和实现手段永远不会令双方都满意。全民基本收入可以用来缩小安全网，但也可以大规模扩展安全网。它可以用来降低税率，但也能给富人带来沉重的税收负担。但它不可能同时做到这些。

我在缅因州以及在肯尼亚和印度看到的情况证实了一件事：正如经济学家长期以来所认为的那样，贫穷不仅是一种物质的匮乏，还是一种社会排斥。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或其他普遍的、无条件的现金计划可能有助于我们解决其他形式的排斥问题，比如阻碍有色人种儿童发掘潜力的种族霸权、削减女性收入的性别不平等，或其他上千种不平等、不公正和差别对待问题。

1944年的寒冬，从缅甸、法国到埃及，各地都有在战斗中牺牲的美国士兵。与此同时，大萧条的破坏性仍然烙在美国人的脑海中，罗斯福在一次国会演讲中提出了第二权利法案。他说，自建国以来，美国一直致力于保护“若干不可剥夺的权利”，比如言论自由和陪审团审判。但是事实已经证明，这些政治权利不足以保证每个人“追求幸福的平等权利”。美国人需要更多的安全感和更多的相互依赖，要让每个人都有机会建功立业并追求自己的梦想。他说，评判美国最终要根据这个国家保障安全、机遇和相互依赖的能力。为此，罗斯福呼吁国会制定多个项目，确保所有公民都能享受收入和就业、住房、医疗护理、社会保障、教育等权利，保护公民不受不公平竞争和垄断的影响。

在技术专制主导的、新自由主义的克林顿、布什和奥巴马时代，这种激进的观点大部分都消失了。但是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已经开始让这种观点回归。

第七章

同样的恶劣待遇

非裔美国人艾瑞莎·杰克逊（Aretha Jackson）是一位身有残疾的退伍老兵和一个住在华盛顿的单亲妈妈。2015年秋天的一个早晨，她穿上鲜红的上衣，戴上一条珍珠项链，和她的母亲、儿子还有女儿一起前往国会山参议院，参加一个情况介绍会。面对由白人、男性、头发灰白的立法者主导的财务委员会（Finance Committee），她陈述了在社会安全网络方面的经历，详细介绍了她童年时期以及20年的兵役期间使用安全网络的经历，讲述了她在或许是美国最具惩罚性的援助项目中遭受的经历。

她在安全网络方面的经历并不都是消极的。在1991年克林顿时期改革之前，她首次寻求了安全网络的帮助。那时候“获得食品券和现金援助并不困难”。她说：“华盛顿特区的住房援助项目帮助我支付了第一间公寓的保证金，并购买了家具。这个项目的重点是满足我的基本需求，这让我能够专心照顾孩子，并重新回到劳动力队伍当中。”在她最近的一次与福利体系的接触当中，她得到了华盛顿一项名为“美国工作”（America Works）项目的帮助，在退伍军人管理局（Veterans Administration）找到了一份全职工作。她最近告诉我说：“他们对那些必须重返工作队伍的人有非常实际的指导方针，你工作了，就会收到补贴；如果你没有做该做的事，就会被扣工资。与真正的工作相比，这很现实。”她补充说，在那里她觉得得到了其他雇员的尊重和鼓舞。

但在其他时候，比如当她无家可归、独自抚养孩子、忍受着伊拉克战争服役期间导致的创伤后应激障碍的时候，她发现福利项目使用起来很困难，工作人员对他人评头论足、漠不关心。她对我说：“这是缺乏专业精神的表现。我是一名残疾退伍军人，对我来说，情况非常不同。我曾经工作过，只是因为发生了不幸，才需要福利的帮助。我知道什么是专业精神，但在与福利系统打交道的时候却没有看到。我跟你说话的时候，你对我的态度就像我在要求你从你的银行账户中拿出钱给我一样。这是无法言表的。这是对依靠福利的人的贬低，让人觉得受到了轻视。”

除此之外，她使用过的许多安全网络项目没有真正帮助她获得新的劳动技能、找到住房、照顾孩子，或者帮助她的家庭维持基本生活。即使在她获得学士学位之后，一家人仍然生活窘迫。她发现自己有资格参与的各种项目——食品券、福利以及军队和退伍军人管理局的援助等——十分混乱、相互矛盾，彼此之间不协调，而且福利体系有非常严格和武断的规则。

“这些福利够了吗？”她自问自答地说，“不不不，绝对不够。”更糟糕的是，福利体系繁杂的程序似乎是刻意为之，以此欺骗和惩罚使用福利的人。她很担心自己出现错误，最后被认为犯了欺诈罪。“他们会强调所有可能发生的不良后果，而且他们不会告诉你如何最好地使用福利系统。如果你像我一样身有残疾，会面对很多不同来源的福利。他们会说，‘好的，如果你领这个，你就不能得到那个’。但还不止这样，有时候不只让人困惑，还令人害怕。”有一次，她甚至收到一封信，告诉她她欠政府好几千美元。她以书面形式提出抗议，却从来没有收到任何回复。

她告诉我，在她居住的华盛顿的公寓楼里，可以看到闪闪发光的白色国会大厦。开发商买下了她所居住的公寓楼，计划改造。作为所在租户协会的负责人，她努力确保开发商为长期在这里生活的居民提供帮助。她说：“这个公寓楼以前的主人很多年来都没有提高租金。但是新业主来了以后，以前700美元的公寓现在涨到975美元。”租户与新业主签订了协议，新业主将把549个公寓全部翻新，重做了管网和窗户，并修理了屋顶。她告诉我说，“他们上周刚刚完成了俱乐部会所的拆除工作，正在建设一个全新的、最先进的设施，将包括一个托儿所和一个教育中心”。但租户仍然是租户，是租房者，而不是业主，因此无法摆脱华盛顿快速中产阶级化过程中的掠夺，而政府合同、补贴贷款计划和鼓励房地产开发商的举措本身就是想要实现中产阶级化。

像杰克逊这样的家庭仍然生活在贫困当中或是贫困的边缘的情况，是政府的政策选择导致的，是政府政策的失败。在国会山听证会上，许多官员也承认了这一点。科罗拉多州参议员迈克尔·班纳特（Michael Bennet）说：“让有两个孩子的单亲母亲，干着时薪7.25美元的工作，却仍然生活在贫困线以下，我认为这是一种耻辱。”他补充道，大量美国儿童生活在贫困中，数百万孩子生活在没有现金收入的家庭，“这是这栋大楼里每个人都无法接受的。当我们的国家面临着这样的挑战时，国会山里具有侵蚀性的政治斗争是完全不能接受的”。

然而，正是“大楼里的每个人”要对这些政策后果负主要责任，这些不良后果中的很多都与美国的种族主义传统密切相关。政府政策让黑人家庭比白人家庭更易于陷入贫困。这些政策将黑人家庭推向吝啬、对人指指点点的福利项目，而不是给他们提供慷慨、无形的财富创造项目。它们在租户和业主之间划出了明确的界限。它们将艾瑞莎·杰克逊视为负担而不是客户、参与者、公民和投资机会。杰克逊谈到了从性别和种族的角度来体验安全网络的经历，她告诉我说：“这是一种不正常的惯例。这是不正常的，不应该被接受，但实际上却被接受了。无论我走到哪里，无论我做什么，少数族裔女性、单亲母亲、残疾退伍军人、接受福利等标签不断堆积……”她的声音逐渐变小，“不论我去哪个办公室，我都受到同样的恶劣

对待。”

但是，全民、无条件、无附加要求的政府政策也许可以改变这些疯狂的不平等现象，只要华盛顿的“每一个人”都开始考虑这种政策。

* * *

欧洲和美国有很多共同之处：大规模、多样化的经济；代议制政府体系；大致相同的法律体系；劳动力老龄化，本国家庭生育率下降；收入中位数在50 000美元左右；财富和收入不平等日益严重。但是欧洲与美国在一个关键的方面存在不同。欧洲有安全网，可以让几乎所有本国出生的公民避免陷入贫困，而且能够消除收入不平等的影响。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欧盟各国政府征收税收，每年为此投入相当于其经济产出一半的资金，而美国这方面的投入大约是其经济产出的1/3。

2001年，三位顶尖的经济学家——阿尔贝托·阿莱西纳（Alberto Alesina）、哈佛大学的爱德华·格雷泽（Edward Glaeser）和达特茅斯学院（Dartmouth College）的布鲁斯·萨塞尔多特（Bruce Sacerdote）——探索了为什么大西洋两岸的两个经济体在其他方面有很多相似之处，但在社会安全网络上有这么大的差异。他们考察了一些经济学方面的原因：税收和转移支付之前的收入分配、单个劳动者的收入的波动以及预期的收入增长等。最终他们不认为这些因素起到了很大的作用。他们的结论是，“在美国，在获得福利支持方面，种族是唯一重要的因素。美国紧张的种族关系显然是美国福利国家缺位的主要原因”。因此，可以说这是导致美国“小政府”的原因。

社会学家、心理学家和政治学家对经济学家的这个发现应该并不意外。这些研究人员可以用上千种方法中的任何一种来实验，结果都会表明，相关性增强互利性，亲密性催生利他主义。人类不相信与自己不一样的面孔。我们不会投票去支持那些帮助我们眼中的“他者”的项目。当我们的社区出现新面孔时，我们对他人的信任和关爱会减少。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是《一个人的保龄球》（*Bowling Alone*）的作者，还是哈佛大学教授，他进行了一项著名的研究，结果显示“在多种族的社区，所有种族的居民都倾向于‘待在自己的地方’，信任度（即使是对自己的种族）较低，利他主义和社区合作更少，朋友也更少”。另一项研究认为，“异质性会阻碍不同群体之间的各种形式的合作”，尤其是在群体之间曾经存在众所周知的紧张关系的时候，情况更是如此，而美国历史上非洲人曾受到奴役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

在美国，想到种族问题往往会让人们更加保守，更加反对再分配。纽约大学（New York University）的社会心理学家莫林·克雷格（Maureen

Craig）和耶鲁大学的詹妮弗·里切森（Jennifer Richeson）进行了一项研究，他们找到两组白人政治独立人士，问第一组人是否知道“西班牙裔美国人的数量已经与全国黑人的数量大致相当”。问第二组人是否知道“加利福尼亚州已成为少数族裔占人口多数的州”。然后研究人员询问这两组人的政治倾向，第一组人被问到一个不威胁他们种族地位的问题，“左”倾的概率是右倾的两倍。第二组人被问到一个威胁他们种族地位的问题，他们右倾的概率大约是“左”倾的两倍。

因此，似乎并不奇怪的是，建立强大的福利体系的国家往往是同质性的小国家，而不是大的、多元化的国家。例如，利用需要先对受益者进行收入调查的福利政策，芬兰建立了最接近全民基本收入的福利体系，这个国家仅有600万人，其中90%的人日常都讲芬兰语。挪威仅有500万人口，这当中除了误差以外，绝大多数都是挪威人。这些小的白人国家往往拥有强大的中央集权的政府，这些政府具有很强的代表性和广泛的共识。而美国却拥有两极分化的两党体系、一个人口少的农村州与人口多的都市州平起平坐的上院，还拥有强大的国家权力传统，一再抑制了全民福利项目的发展。

政治决定政治体系，政治体系建立再分配机制，同质性影响国家在社会项目上的支出。阿莱西纳、格雷泽和萨塞尔多特发现，种族更多样化的国家往往只把国内生产总值的一小部分用于社会支出，而种族较为单一的国家则在这方面投入更多。比利时、卢森堡、瑞典、荷兰和法国在种族和语言方面都有高度同质性，这些国家在社会支出方面的投入接近或超过国内生产总值的20%。而美国在这方面的投入仅为这一数额的一半。

历史学家也不会对阿莱西纳、格雷泽和萨塞尔多特的结论感到惊讶。美国大量的安全网络和财富创造项目旨在排除、惩罚美国奴隶的后代。在大萧条之后，华盛顿建立了全面的联邦保险体系，帮助老年人、儿童和残疾人摆脱贫困，援助失业者。但是1935年的《社会保障法案》（Social Security Act）将农民和用人排除在社会保障体系之外，弗吉尼亚州的参议员哈里·伯德（Harry F.Byrd）认为，将这些人纳入社会保障体系之内“会成为联邦干涉南方黑人问题的一个起点”。历史是复杂而有争议的，但政策后果非常明显。这项法案通过后，南方2/3的黑人劳动者从养老金、失业保险和工人赔偿计划中被排除。

此外，南方各州坚持主张社会保障之外的一些福利应当由州政府而不是联邦政府管理，从而给他们一个排除黑人家庭的机会。以“依赖家属援助项目”（Aid to Dependent Families program）为例，艾瑞莎·杰克逊出席情况介绍会时，就这个项目分享过自己的体验。吉姆·克罗（Jim Crow）时代的立法让黑人女性获得与白人女性截然不同的待遇，各州和地方制定了一套复杂的政策来排除、诋毁和惩罚黑人母亲。福利住房要求使非裔美国

人无法为了找到更好的工作在南方诸州迁移，也不能向北方各州迁移来争取获得资助。许多州制定了“家中不得有男人”（man in the house rule）的规定，工作人员可能会突然到访，看看家里是否有男人。如果发现男性存在，比如衣帽架上有男士帽子，这家的黑人母亲就不能获得依赖家属援助项目的福利。

同样，虽然大多数欧洲国家在19世纪或20世纪就建立了全民医疗体系，但种族主义却让美国没能推出同样的制度。美国没有迈向国家提供资金和服务的医疗保健体系，而是将现有的严重依赖私人供应商的隔离性的体系进一步扩大。《大西洋月刊》（*the Atlantic*）的范·纽克尔克（Vann R.Newkirk II）解释说：“从本质上讲，美国之所以会形成特有的私人医疗保健制度，至少一部分原因是美国想要维持种族等级制度。结果导致几乎所有主要疾病都存在着严重的种族差异，不同种族之间的寿命和死亡率长期存在差距，并且出现了完全分立的医疗和公共卫生基础设施。”

即使在《平价医疗法案》（Affordable Care Act）通过之后，这种歧视依然存在。《平价医疗法案》是奥巴马时期对医疗补助计划的扩展，将无残疾、无子女的成年人也纳入了计划。2012年美国最高法院的一项裁决授权各州退出这个由联邦出资对医疗补助进行扩张的计划。截至2017年，构成联邦的11个州中仅有路易斯安那州和阿肯色州这两个州参与了扩张计划。在美国的20个自由州中，除了缅因州、威斯康星州和堪萨斯州以外，其他各州都扩大了医疗补助。研究人员发现，一个州是否扩大医疗补助似乎完全取决于白人而不是少数族裔的意见。此外，当一个州的黑人数量增加时，这个州“扩大医疗补助计划的可能性显著下降”。

在现金福利项目的设计当中，美国的种族主义可能最为明显。现金福利项目是针对深度贫困人士的最吝啬、条件最苛刻、最爱评判他人的援助项目。到了20世纪70年代，初衷在于帮助白人寡妇的计划正在让越来越多的黑人单身母亲受益。很多人——尤其是共和党人——认为这些黑人女性在耍花招。芝加哥有一位女性用“80个姓名、30个地址、15个电话号码”来为她根本不存在的“四个已故退役军人丈夫”骗取食物券、社会保障、退伍军人补助以及其他福利。罗纳德·里根也曾经提到过一个神秘的“福利女王”，称“她一年的免税现金收入达到15万美元”。这位传说中的“福利女王”其实是一个极具吸引力的罪犯，并不代表任何不正当的社会趋势。

这种对福利领取者的耻辱化对待为克林顿时代的改革铺平了道路，他的改革限制了现金福利项目的总体支出，让它一直保持在1996年的水平，帮助越来越少的孩子摆脱极端贫困，而且不公正地变相惩罚黑人儿童和黑人母亲，但实际上这个福利项目至今覆盖的大多数都是白人。是克林顿将工作确定为领取福利的条件，加重了黑人女性在劳动力队伍中的种族歧视。有色女性资源中心（Women of Color Resource Center）创始人琳达·伯纳姆

（Linda Burnham）认为，强迫女性参加有偿劳动的工作要求和时间规定并没有在一个性别、种族中立的环境中实施。换句话说，相较于求职过程中会更受青睐的人而言，工作要求对应聘时会受到歧视的人的打击更大，对黑人的歧视是美国人生活中一个根深蒂固的基本特征。

克林顿的改革还给予了各州更大的自由，让他们能够决定对需要帮助的家庭提供什么样的援助。不可避免地，黑人数量多的州在福利方面更加吝啬，做出了更多限制。在白人占绝大多数的佛蒙特州，福利体系覆盖了78%的贫困家庭。而这一比例在路易斯安州那仅为4%。密西西比州的居民37%为黑人，在这里，一个三口之家的最高月补助为170美元。阿拉斯加州黑人居民仅占4%，一个三口之家的最高月补助为923美元。城市研究所（Urban Institute）也发表了一篇关于这个话题的论文，其作者希瑟·哈恩（Heather Hahn）对《大西洋月刊》表示："当我们研究一些个别政策时，可以看到非裔美国人比例越高，最高福利收入就越低，最初的审批也越严厉。当我们把这些放在一起综合起来看，就会看到一致的规律。"

更广泛地说，黑人接触的更多是基于受益者收入状况调查的福利项目，这些项目带来了严重的社会耻辱标签。而美国白人接触的更多是无形的、自动的、没有耻辱标签的税收减免。例如，在2012年的任何一个月里，白人家庭比黑人家庭更有可能从抵押贷款利息抵扣等中立、无形的政策中受益，在享受过这种政策的人当中，60%的受访者表示他们"从未使用任何政府社会福利项目"。同年，大约40%的非裔美国人接受了经过经济收入状况调查的福利援助，这一比例在美国白人当中为13%。著名的社会学家和全民基本收入的长期倡导者弗兰西斯·福克斯·皮文（Frances Fox Piven）写道："美国社会项目的创立和演变在很大程度上受利益集团和选举压力的影响，反映了已经制度化的政治不平等。"

当然，在创造排除和惩罚黑人家庭安全网的同时，美国还推出了一个创造财富的工具，支持白人家庭，让他们更富裕。决定谁成功和富足、谁贫困和被排斥在外的不仅是市场力量和个人努力，还有政府政策和深层次的文化和社会因素。

美国的历史像这个国家一样悠久而复杂，但即使是以浓缩的形式来看，整体的情况也没有什么不同。在经济大萧条和种族隔离的背景下，国会通过了《全国住房法案》（National Housing Act），旨在稳定住房价格并使抵押贷款更加便宜。从一开始，联邦住房管理局（Federal Housing Administration）就拒绝为黑人社区的抵押贷款提供保险，这意味着即使是富有的黑人也无法获得贷款购买住房。开发地产的建筑商要获得联邦贷款需要满足一个明确的条件："不向黑人销售住房。"此外，非裔退伍军人基本上无法享受《退伍军人权利法案》（GI Bill）提供的住房贷款。到20世纪80年代中期，白人家庭净资产的中位数接近4万美元，是黑人家庭的

10倍。历史学家伊拉·卡茨内尔森（Ira Katznelson）认为，这种差距主要是因为黑人家庭大多数没有自有住房。

“最伟大的一代”（The Greatest Generation）的白人家庭积累了财富，转移给“婴儿潮一代”（baby boomers，出生于“二战”之后1946—1964年）、“失落的一代”（gen Xers，出生于20世纪60年代末到70年代中期）和“千禧一代”（Millennials，出生于1984—2000年）。他们得到了政府投资的街区，并充分利用了慷慨的税收补贴。“最伟大的一代”的黑人家庭仍然住在租来的房子里，或者在不抢手的社区购买了房产。他们居住在城市中被高速公路割裂、被投资忽视的地区。这些政策如今仍然影响着房产的价值和美国财富的分配。大多数严重贫困社区的居民是少数族裔，生活在贫困集中地区的居民每五个当中就有一个是非裔或西班牙裔。在普通的富有黑人劳动者生活的社区，贫困率高于普通贫穷白人劳动者聚集的社区。这对黑人儿童在社会阶层中的流动有着深远的影响。经济学家估计，黑白族裔收入差距有大约20%是由童年时期生活社区的资源和财富分配造成的。

黑人家庭和劳动者还因《退伍军人权利法案》实施过程中的种族主义问题备受煎熬。在战争结束之后，想要在南部各州上大学的黑人男子只能从100家机构中做出选择，这些机构大多数规模小而且资金不足。这些黑人教育机构拒绝了大约55%的申请人，而与此同时，全国的高等教育正蓬勃发展。由于《退伍军人权利法案》，白种退伍军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四个月，南方诸州以外的非裔退伍军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增加了五个月，而南部各州的非裔退伍军人的平均受教育年限却没有任何增长。

体制性的隔离还破坏了数百万黑人儿童和劳动者的教育前景和人力资本。到1950年，大约1/5的白种成年人上过大学，而非裔成年人中这一比例仅为1/20。研究人员估计，一个“真正‘分立但平等’”的教育体系可以将黑白族裔之间的工资不平等减少一半。但实际情况是这种不平等持续存在。“布朗诉教育局案”（*Brown v.the Board of Education*）是终止公立学校种族隔离的里程碑。美国进步中心（Center for American Progress）的一份报告表明，“布朗诉教育局案”60年后，与以黑人学生为主的学校相比，以白人学生为主的学校对每个学生的支出要多出733美元。报告的作者尼可·汉娜·琼斯（Nikole Hannah-Jones）表示，从某些方面来看，近年来教育隔离状况更加严重。

政府政策以及种族主义的力量让黑人家庭落后于白人家庭。在任何年龄段和教育水平方面，黑人劳动者的失业率大约都是白人劳动者的两倍，这种差距自20世纪40年代以来就长期存在。就业方面的差距助长了不同种族之间的收入差距，这一点体现在很多方面。2015年黑人男性的时薪为15美元，而白人男性的时薪为21美元。黑人家庭平均收入的中位数约为36 000

美元，而白人家庭平均收入中位数为61 000美元。更糟糕的是，自1979年以来，随着收入不平等现象加剧，黑白族裔之间的工资差距进一步扩大。

在这些差距中，危害最大的就是种族贫富差距，这种差距显然也是美国经济政策导致的结果。经济政策研究所（Economic Policy Institute）的数据表明，白人家庭净资产中值比黑人家庭净资产中值高出12倍。1/4的黑人家庭没有净资产或净资产为负，而只有1/10的白人家庭面临这样的问题。即使考虑年龄、收入和职业等因素，情况也仍然如此。非裔和拉美裔占美国人口的近1/3，但仅拥有5%的美国财富。在流动资产方面，新学院大学（New School University）的达里克·汉密尔顿（Darrick Hamilton）写道，“非裔和拉美裔几乎一无所有”。除了养老储蓄以外，典型的黑人家庭只有25美元的存款。而且，这种趋势日益严重，而不是改善。政策研究所（Institute for Policy Studies）和企业发展公司（Corporation for Enterprise Development）发现，过去30年来，白人家庭的平均净资产增长超过80%，是黑人家庭净资产增长率的3倍。如果这种模式在未来30年持续下去，白人家庭每年将获得18 000美元的财富，而黑人家庭仅获得750美元。种族贫富差距将永远不会消除。

“黑人的命也是命”运动的出现，终止大规模监禁的呼声越来越高。奥巴马任期的终结、特朗普执政的开始、纳粹和种族主义者愤怒的街头游行……这些趋势都随着对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而汇聚到一起。

《大西洋月刊》专栏作家塔那西斯·科茨（Ta-Nehisi Coates）在他的文章《赔偿的理由》（*The Casefor Reparations*）中提出了修复不公正问题的道德意义。他写道：“我所谈论的不仅是对过去的不公正的赔偿，也不仅是一种施舍、补偿、封口费或者不情愿的贿赂，我所说的是全国性的、也许能带来精神重生的清算。我们在国庆节举办热烈的吃热狗大赛，却拒绝正视国家的历史。我们高喊爱国主义的口号，却举起联盟国的旗帜。赔偿意味着这种现象的终止，意味着美国意识的一场革命，是我们伟大民主主义者的自我形象与历史事实的一种和解。”

全民基本收入不能成为一种赔偿和对几十年、几个世纪的政府政策的救赎和消解。正是政府的这些政策导致种族制度在美国的存在。想要了解实施全民基本收入需要做出多大的改变，可以比照“黑人生命运动”（Movement for Black Lives）所支持的政策。这个运动倡导进行“剥离和再投资”，拿出政府立法机构的资金，用来帮助有色族裔。它还呼吁重构税法，改善就业支持项目，将银行解体，改变贸易协定，消除超级政治行动委员会（Political Action Committee）[注]，实施参与式预算，取消保释，推动执法去军事化，清除犯罪记录，建立真正的全民医疗保健，实施真正的全民教育政策，削减军费开支，撤出对化石燃料的投资等等。

换句话说，就是为有色族裔提供与白人家庭、白人社区和白人学校相同规模的投资。考虑到美国目前的政治环境，加上国会中不同族裔的代表性，这种投资是难以想象的。

当然，即使这种投资真的实现，全球范围内的种族主义和奴隶制遗留仍然难以消除。“黑人生命运动”表示：“虽然这个平台侧重于国内政策，但我们知道父权制、剥削性的资本主义、军国主义和白人霸权不分国界。我们与国际社会大家庭团结一致，反对全球资本主义的蹂躏，反对种族主义、人为气候变化、战争和剥削等。我们也与世界各地的非洲后裔一道，继续呼吁和争取对殖民主义和奴隶制造成的历史性、持续性的危害的赔偿。”

但是，在现行项目中贯彻普遍性和无条件性的原则也许能成为推动种族平等向前发展的有力工具，也正是因为这一点，20世纪60年代民权运动和如今的民权活动人士的核心宗旨就是推动实施全民性的福利项目。经济学家、经济安全项目组织成员多瑞安·沃伦（Dorian Warren）告诉我：“我们生活在黑人社区面临危机的时代。这（全民基本收入）对目前的情况而言也是一个很好的解决方案，它不像是讨论自动驾驶汽车何时到来的未来展望。它是一个绝佳的解决方案，因为它可以消除绝对贫困，而且我认为它可以成为其他种族群体的桥梁，帮助他们建立广泛的联盟。”

这（全民基本收入）不会是一种赔偿，也并不意味着平等。它不会让黑人孩子与白人孩子站在同一起跑线，但这是迈向未来的一步。

* * *

然而福利和种族之间的矛盾关系就好像一条衔尾蛇吃着自己的尾巴。

这是一个令人不适的事实。但是必须承认，美国的种族多样性严重阻碍了普遍的社会福利项目的发展，尤其是如果参与投票的人比社会全体人口更加年长、保守，而且其中白人的比例高于社会总体水平，那么种族多样性构成的障碍就更大。有充分的证据表明，黑人总统的当选以及福利国家的扩张激发了种族仇视情绪，并推动了特朗普的当选。中左派智库公民（Demos）的研究人员肖恩·麦克尔韦（Sean McElwee）和旧金山州立大学（San Francisco State University）的杰森·麦克丹尼尔（Jason McDaniel）发现，对非裔美国人的仇视是2016年特朗普获得支持的一个“关键因素”。他们写道：“直到2008年的时候，还有许多淡漠的选民仍然无法根据不同党派对非裔援助的态度将他们区分开来。奥巴马的当选以及随后的强烈反应导致很少有种族进步人士会投票支持共和党，有种族不满情绪的人大多数不会投票支持民主党。”黑人总统就要离任，白人总统即将当选，选民将这种情况内化并采取了行动。“奥巴马担任总统和特朗普竞选向选民发出了明确的信号，显示了双方的立场：一边是多元化，另

一边是种族仇视。通过将政府福利项目种族化来减少对安全网络的支持，这种行动持续了数十年，特朗普延续了这场运动，并通过公开妖魔化有色族裔来将其进一步扩大。”

这种“我们对抗他们”的仇视情绪在白人民族主义者的呼声中得到明确的体现，他们在特朗普时期获得了新的力量和影响。理查德·斯宾塞（Richard Spencer）是美国最著名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之一，他呼吁实施全民的福利项目，但只覆盖那些他认为值得获得福利的人。在AltRight.com网站上的一篇名为《为什么特朗普必须支持全民医疗保健》（*Why Trump Must Champion Universal Healthcare*）的文章当中，他指出“与白人现在面对的体系相比，全民医疗保健可能更简单、更合理（还可能更便宜）”，但是“我们必须承认，除非我们变得像一些欧洲国家一样，否则医疗保健会是一个我们无法合理解决的问题”。

当然，美国并没有更欧洲化，而是更多样化和更不平等。左派对于庞大的再分配和全民福利项目的支持显著增强。克林顿总统和奥巴马总统执政时期，政策专家占据着主导地位，那时候推行的经过经济状况审查的福利措施和渐进的援助方式现在日渐式微。伯尼·桑德斯在推动“全民医疗保险”（Medicare for All）。美国进步中心可以说是最有影响力的左派智库，该智库正在推动实施联邦就业保障政策。看到潮流发生了变化，希拉里·克林顿的团队甚至悄悄地研究将福利转化为针对孩子的全民基本收入项目的提议。更令人惊讶的是，她在其2017年竞选回忆录《发生了什么》（What Happened）中透露，她考虑过在竞选时倡导全民基本收入的主张，计划用“共有国家资源”（shared national resources）的收入——例如石油天然气公司和电信公司的特许权使用费等——提供资金。她写道：“除了能让每个人口袋里多点钱以外，这样还能让每个美国人都感觉和国家以及其他人有着更紧密的联系——让我们感到自己是更宏大的事业的一部分。不幸的是，我们没有很有说服力的数据。”民主党2020年的候选人似乎有可能提出全民福利项目，新泽西参议员科里·布克（Cory Booker）已经尝试性地表达了对全民基本收入的支持。

如果实施这样的项目，居住在郊外的中产阶级白人和南方乡村的单身黑人母亲，或者居住在拉斯维加斯的拉丁裔家庭将享受同样的福利待遇。普遍性的原则也许能让福利受益者免受食品券、第八住房补贴方案和福利项目等带来的耻辱，并且保护他们免受右派削减预算的影响。如果人们知道自己也会从同样的政策当中获益，就没有人会抱怨邻居获得了医疗保险或社会保障，也不会认为这不公平（与所得税抵免和儿童税收抵免一样，将福利隐藏在税法之中似乎也可以发挥作用）。当然，人人可以享受的福利项目并不一定为每个人提供完全一样的待遇。创建全民健康覆盖系统或实施负所得税对贫困家庭、黑人家庭的帮助大于富裕家庭、白人家庭。但是，

这些举措在实施之后，即使无法解决那些使黑人家庭比白人家庭更贫穷、受教育程度更低、财富更少的深刻问题，也可能会由于普遍性的特质而避免从前的福利措施所带来的耻辱感。所有关于机器人、技术性失业以及没有工作的世界的讨论都将全民基本收入与福利区别开来——这种区分减少了关于种族和全民福利的突出的、重要的、明显的对话。

对艾瑞莎·杰克逊而言，她很高兴去国会大厦尝试改变人们关于福利的想法。“我觉得他们需要与更多使用福利的人交谈，”杰克逊告诉我，“数字是一回事，现实是另一回事。我确实觉得他们缺乏对使用者感受的了解。”但她告诉我，在她出席听证会之后没有任何国会组织对此事进行跟进。据我所知，她是自克林顿改革以来，在国会发言的少数福利领取人之一。

---

1. 政治行动委员会，美国政治组织，旨在筹募及分配竞选经费给角逐公职的候选人。——译者注

第八章

10万亿的礼物

1975年10月24日，冰岛90%的女性举行了罢工。爸爸们只好自己给孩子换尿布，做早餐，平息母亲们的怒火，穿好衣服出门。托儿所关闭，学校停课，孩子们跟着父亲、祖父去办公楼、码头、工厂和工地。报道称，杂货店的香肠纷纷售罄，因为对男人来说，香肠是比较容易做给孩子们吃的食物。商店关门，餐厅和咖啡厅也停止营业。冰岛一半的报纸都没有印刷出来。剧院一片漆黑。冰岛国家航空公司取消了许多航班。银行没有出纳员。与此同时，成千上万的冰岛女性聚集在雷克雅未克（Reykjavik）一个人潮涌动的广场，她们彼此拥抱，举起示威的牌子，唱着抗议的歌曲。

作为这场名为“女性假日”（Women's Day off）示威活动的组织者，哥朵·斯坦托斯多特尔（Gerdur Steinthorsdóttir）告诉《纽约时报》，活动的目的是“表明女性对国家经济和社会生活不可或缺的作用”。她宣称这次活动取得了巨大成功，许多冰岛人，不论男性还是女性，保守派还是自由派都认同她这个观点。前总统维格迪斯·芬博阿多蒂尔（Vigdís Finnbogadóttir）后来对英国广播公司（BBC）表示，“那天发生的事情是冰岛女性解放的第一步”。（示威发生的时候，她是一个离婚的单身母亲，正是那次活动激励了她竞选总统。）“那次活动让国家彻底瘫痪，让许多男人大开眼界。”

经济学家早就知道，女性的工作——特别是女性对他人的照顾——存在没得到充分认可的价值，或者从某些方面来说，存在难以辨识的价值。生养孩子，照顾残疾人和病人，帮助老年人，为垂死的人提供救助等，很少有什么比这些工作更具社会重要性。但是这些劳动绝大部分都是无偿的，即使有回报，也往往工资很低，福利很少。我们的经济数据不会统计无报酬的照顾，这种工作不会出现在政府账目里，其价值在公众脑海中也大打折扣。

一些智库、学者和政府办公室试图了解无偿照顾工作对全球经济的价值，他们得出的数据令人震惊。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Retired Persons）的研究机构估计，在美国，4 000万家庭照顾人员每年仅为成年人提供的无偿照料的价值就高达5 000亿美元，其中2/3的工作量由相对年长的女性完成。医学期刊《柳叶刀》（Lancet）的一项研究估计，在所研究的32个国家当中，女性每年提供价值1.5万亿美元的医疗保健护理。麦肯锡全球研究所（The McKinsey Global Institute）估计，如

果女性的无偿照顾能按照全球最低工资标准获得报酬，那么全球的总产出将增加11%，也就是12万亿美元。

经济学家还估计，在每个国家，照顾人员提供的劳动相当于GDP的15%~65%，比如说，在美国这个比重占GDP的26%，在瑞士占40%，在印度占63%。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一项研究估计了无偿照顾的重置成本（雇人完成所有这些工作时间需要多少成本）和机会成本（如果不做这些工作，提供照顾的人能赚取的收入）。结果显示，对于不同经济体而言，重置成本估算值占GDP的16%~43%。这意味着每年的照顾工作价值高达数万亿美元，这些工作大部分是由女性完成的，尤其是有色人种女性。

然而不知何故，如此巨大的金额在人们眼中似乎很渺小，这些用钱衡量的价值似乎很低廉。正如著名的英国经济学家亚瑟·塞西尔·庇古（Arthur Cecil Pigou）所指出的那样，社会福利不能“直接或间接地与金钱衡量标准相关联”。无补偿的照顾并不是刚好免费的服务，而是最基础的公共事业。无偿照顾人员提供让正规劳动得以存在的基础设施。正如冰岛女性在1975年秋季试图证明的那样，女性承担了绝大部分的照顾工作，没有她们就没有全球经济，她们对全球经济的作用与男性一样，甚至更加重要。正如女性主义者一直主张的那样，用马克思和恩格斯的话来说，没有“生殖劳动”就没有“生产性劳动”。

全民基本收入的作用之一是让社会为女性的无偿劳动提供补偿。朱迪思·舒利瓦茨（Judith Shulevitz）在《纽约时报》的一篇评论文章中写道：“在人类历史上，女性一直在无偿付出，而社会在‘搭便车’。我认为现在应该做出赔偿了。”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补偿劳动力中的性别差异，这当然是一个有争议的想法。工资并不是表达社会认可的唯一方法，许多家庭在区分有偿工作和无偿工作的同时也赞赏两者的内在价值。但是，全民基本收入强有力地反对“无偿工作的人没有做出贡献”的观念。

这又涉及了支持普遍、无条件福利项目的另一个论点。的确，全民基本收入不仅可以帮助提高照顾人员的工资和让儿童托管服务更加平价，还能补偿女性从事的所有无偿劳动，但它能实现的远不止这些，它还将巩固每个人在社会中的地位，并确保每个人都拥有基本的资本，因此能获得最低水平的选择自由。它会强化“劳动和工作现在不是也从不曾是同一回事”的想法，它会挑战将国内生产总值、就业增长和收入作为经济最重要的衡量标准的观点。

* * *

在圣诞节前一个雾蒙蒙的早晨，我跟随罗克珊娜·吉隆（Roxana Giron）度过了一天。在萨尔瓦多残酷的内战时期，吉隆的一个家人试图将她卖给一

群士兵，于是她逃离萨尔瓦多，前往洛杉矶，后来到了拉斯维加斯。这一天，和平时一样，黎明前她在家中醒来，她住在离繁华的拉斯维加斯大道不远的一个灰泥和木头结构的牧场里。她穿好干净的卫生保健制服，喂了名叫“花生”的4个月大的混种吉娃娃犬，在家中享受最后几分钟的宁静后，她取出羊角面包、火腿和奶酪三明治当作早餐。“闹钟响的时候，我希望是早上八点钟，而不是凌晨五点，”她对我说，“我非常困。”

接下来，44岁的吉隆叫醒她十几岁的女儿卡拉（Karla），打开卡拉粉红色、亮晶晶卧室的灯光，把卡拉带到浴室洗澡。她取下卡拉床上被尿液浸湿的床单和防水床垫罩单，放进车库内的洗衣机里。她给卡拉脱衣服，哄卡拉洗澡。几分钟后，她用毛巾把卡拉包起来，再把她叫回卧室，给她穿上成人纸尿裤和干净的衣服。

当卡拉在厨房桌子上看到我时，她尖叫了起来。吉隆把她推到椅子上，对她说“别动”。视频网站YouTube（优兔）和我这个不速之客吸引了卡拉的注意，吉隆趁机去叫醒大女儿丹妮拉（Danniella），重复了同样的过程：把她叫醒，扒下脏床单，脱掉她的衣服，放进车库洗衣机里，哄她洗澡，穿上干净的衣服，梳理她的头发。

吉隆告诉我，她的两个女儿都有严重的发育障碍，卡拉不会说话，而且两个孩子都患有糖尿病，丹妮拉还患有严重的情感性精神障碍，这意味着两个孩子需要持续的照顾。“你不能把她们单独留在家里，”吉隆说，“她们不会用刀，容易割伤自己，也不会用火。但是如果她们吃了糖果，就可能会死。我没有在家里放糖果，但她们确实可能会因为吃了什么东西死掉。”

吉隆把羊角面包三明治装在纸碟里放进微波炉，她用剪刀将它们剪成小块，然后给女儿们倒了胡萝卜汁。在等三明治冷却的时候，她抓住女儿的手指进行血糖测试，迅速擦拭卡拉的上臂，注射胰岛素。她喂丹妮拉吃了情绪稳定药物。吉隆说：“她有时候非常生气，会张开舞爪。”

白天，卡拉前往当地一所特殊教育学校。她可以一直在这里上学，直到22岁。丹妮拉要去一个成人特殊教育中心，现在还在候补名单里。罗克珊娜工作时，丈夫奥斯卡（Oscar）照顾两个女儿，但大多数时候都是她在照顾孩子。她告诉我，没有人能给她们洗澡，如果请帮佣的话会远远超出家庭的预算。

吉隆的生活就像伯克利社会学家阿莉·霍奇柴尔德（Arlie Hochschild）30年前所描述的“两班倒”（second shift），只不过她的“两班倒”更加夸张。霍奇柴尔德指出，许多女性每天要“两班倒”，除了正式的上班时间，女性还要照顾家庭、孩子、父母和生病的亲人。她估计，把付费劳动和无偿照顾加起来，女性平均每年比她们的配偶多工作一个月，她的这个估测也得

到了其他记录的支持。与20世纪60年代相比，现在男人做家务的次数是那时候的两倍，陪孩子的时间是当时的三倍。与此同时，女性的家务劳动时间减半。但即使有了这些变化，母亲与孩子在一起的时间仍然是父亲的两倍，平均每周大约13.5小时，女性做的家务大约是男性的两倍，父亲往往比母亲有更多的闲暇时间。

这些数据包括对儿童的照料，而且包括越来越多的照顾老人的工作。随着“婴儿潮一代”年龄的增长，女性也要照顾父母。大都会集团（MetLife）的一项研究发现，在过去的15年里，向父母提供个人护理或金钱帮助的成年子女的比例增加了三倍，女性往往直接照料亲属，男性则为父母提供现金支持。作为所谓的“三明治一代”（sandwich generation）的成员，越来越多的女性现在既照顾孩子，又照顾父母。“‘婴儿潮一代’已经到了退休年龄，我祖母她们那一代是美国人口增长最快的一代，”劳工活动人士蒲艾真（Ai-jen Poo）告诉我说，“需求呈指数级增长，而我们没有满足这种需求的措施。”女性更有可能花时间照顾患病或残疾的亲属。一项研究表明，女性成为患病儿童唯一照顾者的概率是男性的13倍，带患病儿童去看医生的概率是男性的5倍（一般而言，男性比女性更容易认为这些任务是“共同责任”）。

这并不是美国独有的现象。在世界经济论坛（World Economic Forum）最近的一份报告中涉及的所有国家，男性的累计有偿工作时数都高于女性。从事有偿劳动的男性比例比女性高，这种差距在40多岁的收入巅峰期会进一步扩大。在每个国家，男性的收入都比女性高，全球男性平均每年获得2万美元收入，而全球女性平均年收入为11 000美元。在每个国家，男性的薪酬水平也更高，他们有偿劳动的平均时薪高于女性。但是，如果不区分有偿劳动和无偿劳动，完成绝大部分工作的还是女性。一般而言，男性一个工作日的工作时间平均为7小时47分钟，而女性一天的平均工作时间为8小时39分钟。

世界经济论坛就业与性别平等倡议负责人萨迪亚·扎希迪（Saadia Zahidi）说：“这些是简单但非常有价值的工作，因为它显示了很多作为人类的意义。”然而这些工作却被忽略，得不到承认和重视。

* * *

在美国，还有一个相关的危机需要解决：儿童保育费用过高。华盛顿并不要求企业为有子女的员工提供带薪假期，企业只提供12周的无薪休假。在这一点上，美国显得很不寻常。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调查，在众多发达经济体中，只有美国没有为刚生产完的母亲提供补助的政府福利项目，也没有要求公司为她们发放补助（芬兰、斯洛伐克和匈牙利都提供三年的带薪休假，调查所研究的34个高收入国家平均提供一年多一点的带薪休

假）。美国私营部门从业者中，只有12%的人在家里照顾婴儿的时候还能获得工资。

在这方面，美国不仅仅落后于富裕国家。国际劳工组织（International Labor Organization）称，在185个国家中，只有两个国家不为刚生完孩子的父母提供帮助，一个是巴布亚新几内亚，另一个就是美国。就连伊拉克和阿富汗这样的国家都有带薪产假计划，至少纸面上有相关的政策规定，而美国却没有。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报告，与其他富裕国家相比，美国在要求企业提供无薪休假方面也相对落后，使美国的母亲们获得保护的期限比大多数国家都短，只比两个国家长。而且按照《家庭和医疗休假法案》（Family and Medical Leave Act），只有一半的私营雇员有资格享受无薪休假。

这会导致家庭收入在孩子出生后的几周和几个月内出现下降，许多情况下，收入水平永远不会恢复。人们无法支付账单，只能靠积蓄生活，缩短休假回去工作。一项调查显示，每六名无薪或部分带薪休假的劳动者中——这意味着大多数有孩子的劳动者——有五人会在孩子小的时候节省开支。此外，美国是唯一一个大多数母亲在产后几天或几周内就重新开始工作的国家。

在重回工作岗位之后，事情也并不容易。总的来说，美国母亲希望或者说必须继续工作：大约58%的有1岁以下婴儿的母亲参加工作，对于有6岁以下儿童的母亲，这一比例上升到64%。但是，由于无法获得优质托儿中心的名额，托儿成本高以及许多工作缺乏灵活性，母亲们面临重重困难。大约六成婴幼儿的父母很难找到品质优良、价格适中的托儿服务。在一项针对八个州的研究中，美国进步中心发现，超过40%的儿童生活在“托儿所沙漠”里，这意味着“一个地区有30名5岁以下儿童，却没有托儿所或者只有很少的托儿中心，导致5岁以下儿童的数量是托儿中心能够照顾的孩子数量的3倍”。大多数农村儿童生活在这样的“沙漠”中，有1/3城市地区的儿童也面临同样的情况。

缺少托儿选择与托儿服务费用高昂相关。婴儿护理中心的年均费用在各地有所不同，密西西比州家庭需要3 972美元，马萨诸塞州家庭17 062美元。在大多数州，婴儿护理费用超过已婚夫妇收入中位数的10%。在半数以上的美国各州，托儿费用比成年人上大学的费用还高。当然，就像其他事情一样，穷人的负担最沉重：月收入低于1 500美元，同时又需要托儿服务的家庭，需要将收入的40%支付托儿费用。

这项费用急剧上涨，而家庭收入则停滞不前，联邦最低工资一直停留在每小时7.25美元。职场妈妈家庭每周的托儿费用从1985年的平均84美元增加到2011年的平均143美元，这些数据已经排除了通货膨胀的影响。与此同

时，家庭收入中位数几乎没有变化，收入阶梯最底端的家庭在收入增长方面表现极差。

联邦政府未能帮助家庭承担这些不断上涨的成本，而只是扩大了儿童税收抵免和劳动所得税抵免（失去工作的人不能享受劳动所得税抵免），除此之外，政府并没有采取其他行动。联邦儿童保育援助总投入——包括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Child Care and Development Block Grant）、贫困家庭临时补助、福利、补贴等形式的支出——在2014年下降至113亿美元。这是自2002年以来的最低水平。儿童保育与发展固定拨款目前覆盖的儿童数量是近20年来最少的。

绝大多数有孩子的贫困家庭都没有得到任何儿童保育方面的帮助。这再次使美国显得罕见：美国公共保育支出占GDP的比例是其他16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的1/4。因此，年收入少于3万美元的父母更有可能请家人照顾子女，当然前提是他们能够找到这样的家人。低收入的母亲越来越有可能完全退出劳动力市场。今天，约1/3的全职妈妈生活在贫困线以下，而1970年这个比例仅为14%。

普林斯顿经济学家的一篇论文发现，1990—2010年，儿童保育费用不断上涨，导致所有美国女性的就业率下降5%，而有5岁以下儿童的女性的就业率下降了13%。在美国，女性对有偿工作的参与一直在减少，尽管在许多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女性在更多地参与有偿劳动，其中包括法国、德国、西班牙、澳大利亚、日本和英国。在这些国家当中，参与工作的女性的比例都高于美国。这种变化是预料之外的，但很引人注目：1990—2010年，美国的女性劳动参与率在22个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国家中从第6位下降到了第17位。

* * *

把卡拉送到特殊教育学校之后，吉隆去见她的三个客户。第一站在胡佛水坝（Hoover Dam）附近，一个靠近沙漠地区的整洁的豪宅，那里有令人惊叹的绿油油、像宝石一样发光的草坪。她那位年长的客户经历过两次中风，而且要使用助行器。“他保持平衡和走路都很困难，”吉隆说，“如果我不给他洗澡，他就没办法洗澡。”在那个天已经大亮的早晨，她给老人洗了澡，换了床单，把当天第三批换洗衣物放进洗衣机。她帮他穿好衣服，打扫了卫生间，准备了一些食物。

“我在他的腿后面涂抹了药膏，”她说，“这种药膏可以帮助他缓解疼痛。”她和他聊天，对他微笑，帮他梳理头发。两个小时后，她必须离开了。“不可能把所有事都做完，”她说，“今天我把衣服留在烘干机里。明天我会留出十分钟时间来处理，还会把今天做的事情再重复一遍。”

然后，她开车去见下一位客户——一位不能走路的老人。她说：“我必须把他从床上移到轮椅上，因为他自己没办法做到。”她一边说，一边用手势跟我解释如何推、翻、转动并支撑比她还重的老人。“我给他洗澡，确保他身上干净，衣服也干净。我把他放进轮椅，把他挪到起居室里的一把椅子上。”她给他做饭，把药放在杯子里让他吃。她说出于法律原因，“我不能把药放进他的嘴里。我告诉他吃该吃的药，并且看着他吃下去。他有痴呆症，如果不吃药，会变得更糟糕”。

这一天，当老人吃东西的时候，吉隆换了床单，洗了衣服。然后清洗餐具，清洗浴室。她说：“我有足够的时间照顾他”，一共四个小时，报酬是40美元。我问吉隆这个客户的家人是否照顾过他，“他有一个孙子住在附近，”她说，“当我离开的时候，他总是在抱怨。他总是说，‘你要走了！我会很孤单！’我的第三个客户有两个儿子住在纽约，他不见他们。”

第三位客户是一位越南老兵，从腰部以下身体瘫痪。“他受伤很严重，”吉隆上车的时候告诉我，“我用一台大机器将他绑在床上，并把他挪到一个电动轮椅上。然后用轮椅把他挪到尽可能靠近浴室的地方。我再拿起一块大木板放在浴室长凳和轮椅之间，并在他身上绑上带子。我必须小心，因为他可能会掉下来！”吉隆用木板、绑带、杠杆和把手帮他坐到马桶上，然后再洗澡。

“照顾残疾老人责任非常大，因为我必须小心不要伤害他们，”她说，“我给他用的绑带必须非常牢固，我会检查三次，因为如果他摔倒了就糟了。我背不动他，必须要打电话给医护人员。”

护理工作——例如家庭健康助手、老年护理助理、个人护理助理或医院助理——从某些方面来看是美国增长最快的工作。然而，这也是收入最差的工作之一，时薪中位数仅为10美元多一点，许多护理工人辛苦劳动，只能获得联邦最低工资——7.25美元/小时。此外，工资增长和职业晋升的机会几乎为零。2016年，吉隆只获得了10美分的加薪。

吉隆告诉我她很喜欢这项工作，她认为自己理应成为护理人员。但是家里已经有欠付的账单了，随着圣诞节的临近，家里的欠账越来越多。“我只能不停地加班、加班、加班，”她说，“我要付账单，现在很困难。我的手机停机了，因为我负担不起手机费。我欠电力公司700美元。”她每天醒着的时间都在帮助不能照顾自己的人，她从来没有个人的时间，随时都要待命。她说：“我的朋友问：‘你这辈子都要做这种工作吗？’我现在已经44岁了，我正在变老，我累了。”她不知道当她没办法照顾两个女儿的时候，谁能照顾她们。

的确，在许多情况下，女性倾向于接受这些护理工作反映了她们的个人偏

好。但这也反映了社会的普遍期待——女性应当照顾他人。经济政策研究所的杰西卡·席尔德（Jessica Schieder）和艾丽莎·古尔德（Elise Gould）认为："当女性挣到她的第一笔钱时，她的职业选择是多年的教育、导师指导、培养她的人的期望、公司的聘用习惯，以及雇主、同事和社会关于工作与家庭平衡的标准与期望的结果。尽管女性不成比例地进入低薪、由女性主导的职业，但这种决定是歧视、社会规范和其他的女性无法控制的力量导致的。"

此外，当一个职业变得"女性化"，当女性开始占该职业从业人员的大多数时，这个职业的工资就开始减少。这是哈佛大学经济学家克劳迪亚·戈尔丁（Claudia Goldin）称作"歧视污染理论"（pollution theory of discrimination）的一部分。在这个理论中，女性是损害某个行业声望的"毒素"。以色列的一项研究考察了1950—2000年由男性占主导变成由女性占主导的工作，追踪了工资水平的变化。对于营地和游乐场工作人员来说，时薪中值下降了57个百分点。售票员（43个百分点），设计师（34个百分点），管家（21个百分点）和生物学家（18个百分点）等职业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相反，在逐渐变得由男性主导的职业里，工资出现了上涨，其中包括计算机编程等。当女性从事某项工作，也正因为女性从事了这项工作，该职业的工资就会减少。

我们担心机器人、优步，还有快餐业工作者，但现在还有另一场危机没被承认。这是与照料我们的婴儿、喂养我们的父母、保护痴呆症患者、帮助治愈病人的女性有关的危机。

* * *

目前，美国就如何让儿童保育费用更加平价展开了热烈的讨论。自由派在推动有薪家庭休假。伊万卡·特朗普（Ivanka Trump）在白宫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她试图让儿童保育享受扣税政策，这对那些在雇保姆方面花费很多的人来说是一个福音。犹他州的麦克·李（Mike Lee）和佛罗里达州的马克·卢比奥（Marco Rubio）这两位极端保守的参议员正在推动大规模扩大儿童税收抵免（Child Tax Credit）。自由派人士关于这个问题的讨论一部分是出于对职业女性面临的困境的担忧；保守派则忧心出生率下降。然而，所有这些都像是在一个更大、更广泛的问题的边缘修修补补，缺乏加大对父母的投资、重视护理人员、给予家庭选择如何抚养孩子的权利的意愿。全民基本收入不是一项主要旨在为护理工作提供社会支持的政策，但它将提高那些从事有偿护理工作的有色族裔女性的工资，有助于让托儿服务更平价，并更好地补偿所有女性的"两班倒"。

全民基本收入或者另一种普遍、无条件的福利如何赋予美国女性权利？当我在拉斯维加斯的时候，解决这一问题的思路清晰起来，在我审视国外情

况的时候这变得更加明确。在肯尼亚的那个村庄，女性和男性往往扮演着不同的经济角色。女性花几个小时做家务、饲养家畜、整理柴火、打扫清洗、照看孩子。很少有女性白天离开家去工作或到当地村庄交易，这让她们没有多少积蓄，使她们依赖男性伴侣和亲属。但是男性却能够完成许多不同的付费劳动，比如在维多利亚湖上打鱼，骑车送人们进出市场，还可以做劳工。他们似乎也更可能拥有能创造收入的财产，比如土地或摩托车。

肯尼亚农村的资产所有权和收入数据表明，在男女贫困差异这个问题上，文化和政治因素的影响与经济因素一样强大。例如，男性拥有肯尼亚绝大多数的土地，而且女性获得商业信贷的机会远远低于男性，这意味着女性拥有的农田的生产力往往低于男性拥有的农田。女性受教育程度和收入水平都更低。尽管肯尼亚最近通过了一项法律，赋予女性平等的权利和保护，但是一项研究发现，“肯尼亚女性和许多司法官员没有意识到，这个新法律在肯尼亚首次取代了管理性别角色的习惯法。”

在发展中国家，情况也大致如此，由于有偿和无偿劳动的不平等分配，女性获得现金收入的可能性比男性小。法律和习俗往往限制女性获得土地等资产和银行账户等公共服务。联合国指出“在近1/3的发展中国家，法律并不保证男女享有同等的继承权。还有一半的国家存在针对女性的歧视性习俗。此外，约1/3的发展中地区已婚女性无法控制家庭的主要消费，约1/10的已婚女性表示，家人在消费时不会征求她们的意见”。

鉴于这些情况，现金转移支付也许能成为提高女性经济和社会地位的有力工具。例如，海外发展研究所（The Overseas Development Institute）研究了无条件和有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发现它们提高了一系列女性赋权的指标。这些现金转移支付计划减少了身体、言语和情感虐待事件；促使女性更多地参与家庭决策；让女性能够推迟结婚并更多地采取避孕措施，从而使她们获得对自己的身体和生活轨迹更大的控制权。此外，现金缓解了贫困，鉴于女性要想增加收入会面临比男性更多的结构性障碍，她们也许能从同等数额的现金中获益更多。联合国报告称，在发展中国家，由于家庭是评估贫困的中心单位，因此不存在“从性别角度对贫困的直接衡量”，但女性普遍地被视作经济上更加脆弱的群体。

出于这些原因，印度经济学家阿文德·萨布拉马尼安和普拉纳布·巴尔汉告诉我说，他们希望现金福利先在女性当中实施。“与许多贫穷国家不同，当然与经常用来跟印度比较的中国也不同，几乎3/4的印度女性没有收入，”巴尔汉告诉我，“3/4的成年女性没有家庭外的工作。近年来，女性劳动力的比例实际上在下降。其中一个原因是退出劳动力市场的女性此前从事的工作具有压迫性，繁重、艰苦、没有前景。”他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保护她们免受虐待，帮助减轻女性和儿童的贫困，并为女性提供更多经

济选择。萨布拉马尼安也同意他的观点，“如果你有足够的钱，你当然会把它分给每个人。但是，如果资金上有困难，如果不能做你想实现的宏大的事情，那么在受限制的选择中，什么是最好的呢？父权制是一个大问题，解决这个问题的一种方法就是赋予女性权利。”

任何地方都是如此。

第九章
同舟共济

在特朗普总统任期的第一年，他竞选引发的暴力活动从私语变成了呼喊。美国各地的白人民族主义者、三K党（Ku Klux Klan，缩写为KKK，奉行白人至上主义）和新纳粹分子走上街头，并在网上赞美政府。种族主义和不容忍行为的表现明显增加，南方贫穷法律中心（Southern Poverty Law Center）的统计显示，在选举结束后的几周内出现了1 372起仇恨犯罪。8月，在弗吉尼亚州夏洛特维尔市（Charlottesville），一辆由白人民族主义分子驾驶的汽车撞向一群反对种族主义的抗议者，导致一名年轻女子死亡。特朗普指责双方的暴力行为，并说"非常优秀"的人一直在参与纳粹和白人至上主义者的游行，他的言论引发了广泛的谴责，但并没有带来任何变化。

失业率正在下降到历史低位，国会除了为富人减税之外几乎没有什么作为，没有经济衰退或新的海外战争发生，但是却有一种失去平衡的感觉。过去的几个月像歌曲《火不是我们放的》（*We Didn't Start the Fire*）一样充满各种新闻标题，政治上的疯狂时刻被社交媒体进一步放大，媒体充斥着火爆的政治新闻，还有24小时有线新闻持续不断地报道：种族主义者与反法西斯人士爆发冲突，南极洲崩裂、珊瑚礁死亡，俄罗斯通过推特和脸书干预美国大选，警方把一位平和的乘客从联合航空公司（United Airlines）的飞机上拽下来，对小学开展非法移民突击检查，国家广场上发生抗议，曼彻斯特爆炸，"伊斯兰国"杀戮，竞选官员被起诉。

这似乎已经到达了顶峰。不平等和两极分化撕裂了千家万户，并通过收入、种族和信仰将他们隔离。人们已经不再信任精英和各种机构，包括政府和新闻界。社交媒体、谈话广播和有线电视新闻变成了回声室和隔离室。特朗普竞选并出任总统的荒谬和后现代的残酷只是长期缓慢的分崩离析的一种极端表现。

我当然知道美国在收入和财富方面正在分化，但从政治角度来看，美国也在崩溃。皮尤研究中心的一项研究显示，在过去20年中，美国人的政治观点越来越固执和尖锐。典型的共和党人比94%的民主党人更保守，而典型的民主党人比92%的共和党人更自由。与此同时，党派间的对立更强烈，在每个党派中，对另一党派持有"非常负面的意见"的成员比例大约翻了一番。双方开始将对方形容为国家面临的危险。美国红色部分变得更红，蓝色部分变得更蓝，紫色部分几乎消失了。越来越多的美国人开始认为生活

在意见相同的人群中十分重要。越来越多的人表示他们会拒绝与对立党派的人约会，或者他们会反对家庭成员与对立党派的人结婚。

文化也在分化。政治严重分化，民主党和共和党几乎在所有事情上都要针锋相对，比如“玩家门丑闻”（Gamergate）；《为奴十二载》（12 Years a Slave）是否该赢得奥斯卡奖；经济是在好转还是在恶化；股市是在繁荣还是在衰败。从很多方面来看，政治认同变得比种族身份更能预测一个人的意见。套用阿娜伊斯·宁（Anaïs Nin）的话来说，我们所看见的不再是事物的本质，而是我们自己的样子。

社会资本方面的指标也在下降。参与投票的美国人在减少，他们与邻居和同事度过的时间更少，对工会和教会的参与减少，因此与家庭和政府机构之间的“中间层”联系不如以往紧密。犹他州共和党参议员麦克·李的一份报告认为，“美国的物质生活在很多方面比过去好得多。但是尽管取得了这样的进步，我们仍然觉得我们的社会关系网络有过比现在更好的时候，社会中间层对维持一个自由、繁荣、民主和多元化的国家至关重要。通过更广泛的合作和社会支持网络，互惠互利的规范，互相之间的义务、信任和社会凝聚力，这个中间层被凝聚在一起。”许多左派人士都认为，21世纪以来，欧洲出现了一个难以忽视的现象：右翼专制主义逐渐兴起。许多国家的人基于自身所处社会的情况也赞同这一观点。这种趋势背后受到至少部分与美国相同因素的影响。世界各地的人们对这种趋势似乎感到厌倦、沮丧、无所适从。

在这种情况下，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的想法显得充满吸引力，他们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将治愈发达经济体出现的这些裂痕——缓解两极分化，鼓励人们增进团结。我曾参加在韩国举办的基本收入地球网络会议（Basic Income Earth Network conference），英国著名经济学家、全民基本收入倡导者盖伊·斯坦丁（Guy Standing）在会上介绍说：“由于政治背景的关系，我们的讨论现在日益具有现实意义，在未来、未来的未来都会如此。”“在我们目前的政治环境中，有很多以特朗普形式存在的新民粹主义者，愿上帝保佑他们的灵魂；英国退出欧盟；欧洲各地存在很多令人憎恶的右翼分子，世界各地也有很多类似的人。除非我们采取某种形式的全民基本安全措施，”他说，“否则我们将陷入充满政治极右势力威胁的地狱。这是在座各位都不愿看到的。我们是世界上为数不多的能提供未来、憧憬和令人兴奋的事物，让人们有理由心怀希望的群体之一。”

我认为，全民基本收入关注的更多是包容，而不是福利。它为穷人提供参与经济的一种方式，是确保社会所有成员都有发展的基础的一种手段。它增强了劳动者的力量，还为女性在抚养子女和追求职业生涯方面提供了选择。它是促进社会公正的有力工具，确保少数人能与多数人获得同样的待遇。它排除了安全网中的种族偏见和家长作风，相信人们会以最好的方式

利用他们所拥有的东西。它能帮助被忽视的农村社区。它是不区分孩子父母的能力，帮助所有孩子的一种方式。

在两极分化和不平等的时代，全民基本收入措施能促进赋权、包容和团结，这似乎能让每个人都从中获益。它们并不是一个安全网，而是一个基础。

* * *

一群女性坐在会议室里，谈论着阿拉斯加人的生活。

保罗主持这次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经济安全项目（Economic Security Project）的小组座谈，他友善地开玩笑说："本来我们今天想邀请安克雷奇（Anchorage）最有趣的十几位女性，但是她们很忙，所以就请了大家。"参与座谈的女性依次介绍了自己：领养孩子的母亲、卡车司机、多层次营销计划推广人、家庭托儿所员工、女渔民、非营利性组织工作者。然后保罗让所有人用描述天气的词汇来描述阿拉斯加州。大多数人选择"阴云密布"，理由是吸毒、酗酒、经济困难和政治冲突等问题。一位女士说："我看不到阳光灿烂的未来。"

大约一半的人表示，由于在阿拉斯加过上体面的生活十分困难，所以他们正在考虑离开这里。一位女士感叹道，"我会想念PFD"，其余人也表达了同样的想法。他们所说的PFD是永久基金分红（Permanent Fund Dividend），这是美国最接近全民基本收入的政策。小组座谈的主持人保罗问她们永久基金分红是什么，想要了解她们对这种全民基本收入的措施的理解。这种永久基金分红是从哪里来的？为什么她们都可以从中得到钱？

一位女士说，政府可能想把国家预算中多余的钱花出去。另一位女性认为，这样做是因为这个偏远地区的生活成本太高，在这里，牛奶价格高达10美元/加仑。一位女性说道，"阿拉斯加州宪法里写了，阿拉斯加州的石油属于人民，所以永久基金就是……"她搜索着恰当的词语，"我不知道'使用费'这个词是否合适，但总之这是石油带来的收益，然后再分配给所有人。那些公司开采的是阿拉斯加人民的石油。"

这三个答案在某种意义上都是正确的，尤其是第三个答案。盛产石油的阿拉斯加州每年都依靠从土地和水域中开采出的"黑金"获得部分收入，这与西弗吉尼亚州（West Virginia）从地面挖出的煤炭、北达科他州（North Dakota）的页岩砂中掏出的污泥、马萨诸塞州风力发电或内华达州的太阳能不同。这笔资金投入了阿拉斯加永久基金（Alaska Permanent Fund），目前该基金的资金总额为500亿美元。每年秋天，阿拉斯加永久

基金会为该州的每一个男人、女人和孩子送出一张支票，监狱里的囚犯和被判重罪的人除外。支票金额并不大，一般在1 000~2 000美元。但是这笔资金每年都会帮助该州约3%的人口跨越贫困线。它对最脆弱的儿童、老年人和残疾人，生活在极度贫困或偏远农村社区的人以及阿拉斯加原住民来说最有利。

最近阿拉斯加州一直在就如何妥善使用永久基金的资金争论不休。2017年，比尔·沃克（Bill Walker）州长将分红削减了一半，降低至每人约1 100美元，利用省下来的资金弥补该州的预算缺口。从某种意义上说，这种做法也是合理的：永久基金的资金仍然用于阿拉斯加，只不过是通过州政府而不是分发给本州的人民。但沃克的这个举动不受欢迎，参加座谈的女性也这样认为。州政府没有权力根据其需要来花费永久基金分红。人民才有权利按照他们认为合理的方式使用这笔资金。民主党参议员比尔·维勒霍夫斯基（Bill Wielechowski）反对沃克的行为，“我们试图发出一个信号：如果你想改变永久基金的使用方式，必须要展开全州范围的讨论，由立法机关通过，并由州长签署成为法律。”他告诉我：“设立这个基金不是为了让一个人决定钱的去向，而是要让人民决定如何使用。”

调查和民意数据显示，不出所料，阿拉斯加人能非常妥善地利用这笔钱。一项调查显示，3/4的受访者表示，他们将这笔钱用于“必需品、紧急情况、支付债务或者用于退休或教育等未来的活动”。每五位受访者中就有四位表示，永久基金分红改善了他们的生活质量。座谈小组中的女性对那些浪费分红或者为了分红来阿拉斯加的人表示惊愕。一位女性抱怨说：“有很多家庭来阿拉斯加，还带着六七个孩子，他们得到了很大一笔钱，留一个人在这儿，然后其他人就离开了，所以说他们在拿走属于我们的资源。”她还说道：“我认为需要审核得更严格一点。”

其他人则承认，他们并不是这些基金最谨慎的管家。一位年轻女士插话说道：“在我的成长过程中，家里并不是非常富裕，而且现在我仍在底层挣扎。”她承认“每年一次，我得到这笔巨额资金……很难管好自己，把钱用在账单和应该花费的东西上，而不是说（她思考了一会），‘哦，上帝啊，我有4 000美元，我要去买一台新电视机。’”但她这样的人比较少见。人们需要这笔钱，并倾向于把这笔钱用在需要的地方。

在不同文明和不同时代，向所有公民分配国民财富的想法都曾出现，这与全民基本收入非常相似。在基督诞生之前，罗马通过了一项法律，向所有10岁以上的公民提供5摩迪（modii），折合大约70磅（约63.5斤）的粮食。500年后，哈里发阿布·巴克尔（Abu Bakr）为生活在四大哈里发（Rashidun Caliphate）统辖地区的所有男性、女性和儿童提供10迪拉姆（dirham）的收入。后来，托马斯·潘恩主张为那些被排除在土地财产体系之外的人提供补偿。最近，耶鲁大学法学教授布鲁斯·阿克曼（Bruce

Ackerman）和安妮·阿尔斯托特（Anne Alstott）建议在每个美国人21岁生日时一次性支付80 000美元，以帮助培养一个“权益人社会”（stakeholder society）。

这种政府分配的财富通常称作公民收入，它将这种分配视作社区一分子的自然利益，而不是一种施舍，是与生俱来的权利，而不是补偿措施。“每个生活在阿拉斯加州的人都有权享受永久基金分红，”一位女性说道，“福利基于你的收入，是帮助人们重新站起来的援助计划。永久分红基金的目的不是这样的。”它是一种权利，不论贫富，谨慎或不谨慎，工作还是失业，每个人都能获得，而且每个人得到的数额相同。

* * *

回到这本书开篇的问题：如果在余生中，所有美国人的银行账户每个月都会出现1 000美元的支票，会发生什么？对于富人来说，不会有太大的变化；但对于穷人来说，这将是变革性的，美国的贫困家庭将开始接近中产阶级。人们将能支付账单，修缮住房，能获得更多更好的食物。那些没有任何现金收入的深度贫困家庭将会消失。

从对劳动所得税抵免和食品券等项目的研究当中，我们能预见全民基本收入可能带来的更广泛的影响。低收入家庭婴幼儿住院的可能性会降低，他们会获得更多食物，更好地成长。在成长过程中，这些孩子的健康状况、阅读和数学成绩都会提升。这一影响在几年、几十年后将转化为更高的收入和教育水平。这些孩子成年以后代谢疾病发病率也更低。他们可能会存活得更久。

全民基本收入尤其将为年轻人提供强大的支持，美国政府将借此努力消除富有和贫困孩子之间的差异，为人生开始的阶段提供更多投资。美国目前对老年人口的人均投入大约是儿童的3倍。仅从联邦政府层面来看，政府在老年人身上的花费是年轻人的7倍。通过全民基本收入，儿童贫困最终将被消除，而且还会带来长期的有利影响，包括延长预期寿命、增加数十亿美元的收入等。对于成年人来说，全民基本收入也将影响深刻。关于道芬（Dauphin）的“民康”（Mincome）实验的研究表明，获得无条件基本收入的人住院和出现心理健康问题的概率都更小。在美国的负所得税研究中，家中的主要收入者获得了更多陪伴子女的时间，他们的房屋拥有率也提高了。

贫穷负担会减轻，人们可以根据需要使用这些资金。正如我在维多利亚湖所看到的，对于饥饿的人来说，足球网毫无意义；对于需要清洁饮用水的人来说，学费没有作用；对于需要农业设备的城镇来说，水罐也于事无补。但是金钱是通用的，可以换取需要的东西。直接发放现金意味着单身

母亲不必用食物券换取现金来支付取暖费。这意味着当她真正需要的是交通费用的时候，不必与复杂的第八住房补贴方案纠缠。这样会更加高效和有力。

全民基本收入能帮助长期贫困的人，也能为数千万不时需要支持的人提供帮助。每一年约有40%的劳动者离开一个工作岗位，还有数百万人遭遇家庭成员患病、被驱逐、出现汽车故障。工人权利削弱、工资停滞不前和严重不平等现象等因素促使自由职业和合同工作增多、福利下降、生活成本上升，这一切共同导致了不稳定型无产者的出现，这个群体存在于中产阶级之下，与这个本身也在缩小的阶级存在一些重叠。1/3的家庭没有储蓄，在紧急情况下，有一半的家庭必须借贷或出售一些东西才能拿出400美元。安全网只能帮助一部分人避免贫困。普遍现金福利是为所有人提供保障和自决的一种工具。

在繁华的沿海地带与中部农村地区日益分化的时期，普遍的现金补贴也有助于促进全国各地均衡发展。“在不久前，对不平等的关注点还是你在收入分配的哪个层次，是10%、1%还是某个百分比的前1/10，”肯塔基州工作搜索网站Indeed的一位经济学家杰德·科尔科（Jed Kolko）告诉我，“现在大家讨论的是地域性差异。”这在经济创新小组（Economic Innovation Group）的报告中得到了证实，该小组发现经济日渐依赖越来越少的“表现极其强劲”的小镇来创造新的企业和工作。2010—2014年，旧金山湾区、纽约、波士顿和西雅图等20多个地区占到企业净增长值的一半。该报告发现，美国出现了“大规模、史无前例”的地区性失衡。但是，全民基本收入将提高被忽略和欠发达地区的工资和投资，对生活成本最低的地方的人们帮助最大。

全民基本收入将更巧妙地从消费方面削弱不平等现象的不利影响，缩小教育方面的差距（现在，富裕家庭的孩子在24岁时获得学士学位的可能性是贫困家庭学生的5倍）。人口会更富有创新性和创造力。美国企业家大多来自富裕家庭，这些家庭有能力为子女提供启动资金和安全保证网。一项研究发现，“自雇就业的概率很大程度上取决于个人是否获得了馈赠或遗产”。全民基本收入将为每一个有想法的创业人士提供资本，这对我们所有人都会产生重大影响。

有了全民基本收入，经济衰退对人们的破坏性将会削弱，因为所有家庭都有“压舱物”维持基本生活。劳动力市场可能会发生变化，会有更多人从事创意工作或照顾他人。低薪劳动力市场将必须做出改变，企业被迫提高工资并改善员工的福利。物价可能上涨；有些人可能会退出劳动力市场；高税率会使富人的税负更重，并迫使企业转移到海外。尽管如此，左翼智库罗斯福研究所估计，全民基本收入在实施的最初八年中可以将经济增长率提高13%，让我们所有人长期从经济增长中获益。

* * *

全民基本收入会引发谁是“我们所有人”的讨论，从而在公民与非公民之间、本土出生的美国人与移民之间以及数百万不能按照前两条明确划分的混合家庭内部形成裂痕。现在已经有许多美国人认为福利国家与移民不相容。中右派的《彭博视点》（Bloomberg View）专栏作家梅根·麦卡德尔（Megan McArdle）认为，在目前美国有众多移民的情况下，全民基本收入并不适用，他在美国公共电视网（PBS，全称Public Broadcasting Service）上说，“很多移民都是低薪工人。他们缺乏技能，很多都是这样。他们没有达到大多数美国人那样的教育水平，所以无法缴纳足够的税收来补偿收到的支票。即使只覆盖这些人的孩子，那么国家接纳了移民，然后这些移民的孩子像你的孩子一样每年享有15 000美元的基本收入，这样的话没有多少人会支持国家接纳移民，我认为这没有政治上的可行性。”

有一种根深蒂固的观点认为，难民和移民来到美国是受到了福利国家的吸引，因此不值得获得援助。早在1999年，哈佛大学经济学家乔治·博尔加斯（George Borjas）在一篇引发热议、影响深远的论文中假定了“福利磁体”（welfare magnets）的存在，并指出移民聚集在福利更慷慨的州。但是，对移民有吸引力的地区往往经济活力更强、就业机会更多、移民同伴更多，而不是有更优厚的救济。一个更隐蔽的障碍是有人认为难民和移民会促使工资下降、经济增长放缓。盖洛普最近的一项民意调查显示，大约40%的受访者认为，移民压低了工资水平，损害了整体经济。在另一项调查中，2/3的受访者表示，移民给国家带来的社会服务方面的“成本太高”。然而，与民众的观点相反，移民和难民所缴纳的税收往往高于获得的福利。例如，一项关于美国难民的研究发现，在到达美国后的最初20年内，难民平均支付的税收比获得的福利高出21 000美元。美国国会预算委员会（Congressional Budget Office）的一项研究发现，合法移民增多将会增加政府在医疗补助、税收抵免和保险补贴等方面的支出，但也会产生数千亿美元新的税收收入，足以在20年时间内将赤字减少1万亿美元。所有无证移民不能享受大多数的安全网络项目，但需要将部分收入交给政府，每年缴纳数十亿美元的联邦、州和地方税。

但是大多数人更相信自己的感受而不是事实，而且有证据表明，如果社会安全网变得越慷慨，对移民和难民的反感可能会越重，美国白人对待移民的方式与他们对待本土出生的非裔或拉美裔的方式并无不同。十年前，安·海伦·贝（Ann-Helén Bay）和阿克塞尔·韦斯特·佩德森（Axel West Pedersen）就在挪威实行全民基本收入的可能性对挪威选民进行了调查。大多数挪威人都喜欢这个想法，但当得知移民也会受益时，他们的态度就发生了转变。新媒体网站Vox的戴伦·马修斯（Dylan Matthews）概括了这

项研究并写道：“当这个提议经过调整，让非挪威人也能获益时，1/3的支持者表达了对提议的反对意见。这与很多文章相互佐证，表明种族和族裔多样性的增加可能会引起本土白人选民的激烈反应，他们憎恶新来者，为右翼政党投票做出回应。他们选择的右翼政府然后制定福利削减政策，这一方面是为了惩罚移民，另一方面是因为右翼政党本身就热衷削减福利。”

美国可能也存在同样的偏见。在特朗普意外当选之后，民主党民意测验专家斯坦·格林伯格（Stan Greenberg）在密歇根州的马科姆县（Macomb）举行了白人选民的小组座谈。该地区此前的两次总统选举都支持了奥巴马，但这次却转向共和党，投票支持特朗普。尽管该地区的移民人数很少，对就业的影响微乎其微，但对移民的担忧却非常普遍。“我去注册医疗补助计划，站在那个该死的福利办公室里，四周都是没法用英语跟我打招呼的人，”参与小组座谈的一个人说，“他们有医疗保健，有食品券……如果从其他地方来的人都能获得这些，为什么我们不能全部都享有呢？”

就像自由主义的卡托研究所（Cato Institute）已故前主席威廉·尼斯卡宁（William Niskanen）所指出的，这个问题可以通过“在福利国家体系周围建立一堵墙”而不是在国家边界建立围墙来解决。从很大程度上来看，美国已经在这样做了：允许合法和无证移民进入，但禁止他们获得福利。尽管如此，全民基本收入还是可能会强化种族反感。这可能会加重反移民情绪，并刺激政府采取反对移民的限制措施和政策。还可能促进两级劳动力市场的产生，企业会寻找无证工人，因为这些工人的费用要比本地出生的公民低得多。移民数量减少会使经济更加僵化，老龄化程度更高。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催生严重的种族主义。

这一切没有简单的答案，对进步人士而言尤其如此。

* * *

在经济安全项目的另一个小组座谈中，保罗询问了一群阿拉斯加州男性对本州经济状况的看法和现金补助项目方面的经历。在座谈中，保罗问他们为什么钱包里和手头都有钱，还这么看重永久基金分红。一位退休的管道工人表示，“作为本州的公民，我们从这个州开采出来的资源中获益”。这位管道工人喜欢“划船、搜寻石头、采矿、钓鱼等所有这类好玩的事情”。另一个人说，“这让我感觉自己是这个州的股东。就像我拥有它的一部分一样”。

全民基本收入是分享公共财富，而不是简单地征税和重新分配收入，这种说法听起来也许很不可思议或者不可能。在2012年选举期间，共和党候选人米特·罗姆尼（Mitt Romney）曾将国人划分为“创造者”（makers）

和“获取者”（takers），在坐满选举捐款人的房间里，他谴责有47%的人在吸53%的人的血。他说：“我的工作不是担心这些人。”他还解释道，反正这些人也会投票给奥巴马。“我永远无法让他们相信，他们应该对自己的生活负责，自己照顾自己。”他形容他们是“依靠政府的人，他们认为自己是受害者，认为政府有责任照顾他们，觉得自己有权享受医疗保健、食物、住房等”。

全民基本收入可能会让创造者和获取者之间、纳税为全民基本收入提供资金的劳动者和依靠这项政策的懒惰的人之间的怨恨更严重。但是对创造者和获取者的区别，现在并且将来都会是错误的。罗姆尼在细节方面，以及对经济、社会政策的更广泛、更哲学的理解方面都是错误的。首先，82%而不是53%的美国家庭缴纳所得税和工资税。不纳税的家庭大部分由老人和退休人员、极端贫困人士或失业人员组成。此外，低收入家庭受到相对不开明的国家和地方税的打击，还要向政府支付过重的烟草税。低收入家庭还购买了大部分彩票。“穷人没有做出贡献”这个观点不符合实际。

更重要的是，所有美国人一生当中都会“创造”和“获取”，无论多么努力和富有创造力，没有任何企业或个人纯粹仅仅依靠自己。儿童获取，成年人创造，老人又获取。即使是那些作为创造者的正在工作的成年人其实也是获取者，享受着道路设施、警察保护、外交政策、清洁用水等带来的益处。那些不在劳动力队伍中的人往往也是创造者，比如留在家中的父母和在学校学习以便提高未来收入的孩子。所有人都付出一些东西，也都得到了一些东西。每个人都应当付出，也都应该获取。每个人都从付出中获益，也都可以从获取中获益。

理论上讲，全民基本收入承认了这样一个事实：市场经济会让一部分人掉落，造成贫困，并惩罚那些不能或现在没有工作的人。正如马丁·路德·金所说的那样：“我们在认识人类动机和经济体系的盲目运作方面已经取得了显著的进步。现在我们意识到，经济中市场运作的混乱和歧视的盛行将人们推向失业，并不顾人们的意愿，让他们不断或经常性地失去工作。我希望，不要为穷人贴上‘低人一等’‘缺乏能力’的标签，并以此为由将他们从我们的良心中抹去。”全民基本收入会削弱这种看法得以成立的基础，成为维护人类尊严的强大力量。它承认我们的相互依赖性以及独立性。

正如富兰克林·罗斯福70年前所主张的那样，普遍的、不受限制的现金福利——直接给人们钱——将增进基于“经济安全与独立”的“真正的个人自由”。它将使每个人都有自由去过自己的生活，同时也在生活的每个阶段为每个人带来一种共有投资感，还能促进社会的整体繁荣。

第十章

每月1 000美元

问题是怎么做。

查尔斯·穆雷希望每年给所有成年人10 000美元，同时消除整个国家福利体系。安迪·斯特恩希望每月给成年人1 000美元，消除大部分福利体系。而另一些人则主张将全民基本收入与激进的开放式边界计划和大幅缩短的工作周结合起来，正如荷兰作家鲁特格·布雷格曼（Rutger Bregman）在其《现实主义者的乌托邦》（*Utopiafor Realists*）一书中所说的一样。还有一些人将全民基本收入看作一种通往领先的星际迷航似的后资本主义世界的方式，在这个想象出来的世界里不存在工作，就像尼克·斯尼斯克和亚历克斯·威廉姆斯在他们的著作《创造未来》一书中所提出的那样。然而还有一些人则希望在出生时给孩子一笔资金供成年后使用，并在死亡后用征税的形式收回。与所有社会政策一样，怎么做取决于为什么，而“为什么”往往多种多样。关于怎么做的辩论十分活跃，但往往令人困惑并脱离我们目前的经济和政治现实。我们如何尽可能地发挥全民基本收入的优点，并尽量规避不利影响呢？

这是一个挑战，需要理解各种政策的影响和细节。资金是一个明显的缺点，所以让我们从这个问题开始。如果每个月为所有美国公民提供1 000美元的基本收入，这意味着每年会花费额外的3.9万亿美元。这个数额大约是美国经济的1/5，相当于联邦政府目前的总支出，包括桥梁建设、战争，再到照顾老人、起诉犯罪以及保护湿地等方面的费用。如果政治家完全依靠现行的税收体系来提供所需要的资金，那么这意味着收入税将大幅提高，不仅针对最富有的美国人，还会涉及中等收入群体。顶端1%的收入者贡献了所有所得税的40%，也就是每年大约6 000亿美元。换句话说，就算把他们赚的每一分钱都当作税收收归政府，仍然远不足以支付巨额的全民基本收入费用。以成本原因质疑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文章有很多，其中，专栏作家爱德华多·波特（Eduardo Porter）就在《纽约时报》文章中指出：“这个国家的历史表明，美国人不愿意为他们目前的税收增加这样沉重的负担。”

取消或缩小其他项目将有助于支付全民基本收入的费用。目前，政府在其社会保险项目上花费约2.7万亿美元，其中包括社会保障、医疗补助、医疗保险、失业保险、退伍军人福利等。在这笔资金当中，仅社会保障一项就耗费1万亿美元。政府每年在国防方面的花费也超过5 000亿美元，这个

数额可能下调，尤其是如果下一场战争调用黑客而不是坦克的话。但是无论其他预算削减多少，每月1 000美元或金额更小的全民基本收入将需要新的支出，并可能需要新的收入来源。

接下来是对全民基本收入本身不会消除贫困甚至可能加重贫困的担忧。如果拿出医疗保健以外的所有经过经济状况审查的福利项目的资金，用来发放全民基本收入，每人每月只能获得132美元，这远远低于目前许多贫困人士从政府那里得到的收入。加上对中产阶级的税收支出，例如抵押贷款利息扣除和退休储蓄奖励，每人每年仍然只能得到3 591美元。给每个人同样的东西意味着“把黄油涂得更薄”，意味着我们需要更多的“黄油”。

退一步来看，全民基本收入还提出了一个哲学方面的难题。在一个资源有限的世界，让每个人都得到一些东西，而且每个人得到的东西都相同，这真的有意义吗？从某种程度上说，联邦政府是一个罗宾汉一样的机构，它从富人那里获取资金提供给穷人，随着时间的推移，由于福利国家、卫生措施和各种社会保险项目的扩大，加上人口老龄化，政府的这种职能越来越普遍。全民基本收入不仅意味着将钱发给穷人，还要惠及每个人，包括富人。

此外，人们担心全民基本收入容易被财政鹰派削减。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等惠及中产阶级的项目往往比援助贫困人口的福利等举措更受欢迎。尽管如此，近年来，安全网得到大幅扩展：政府提高了劳动所得税抵免的价值，为数百万人提供食品券，并扩大医疗补助覆盖了1 200万人，而且覆盖人数还在增加。毫无疑问，这些措施减少了美国的贫困。而与此同时，不考虑收入状况，为所有人提供帮助的项目大部分保持原状，并且在某些情况下已经出现了削减。例如，失业保险项目在经济大衰退之后已经遭到削减。共和党人还对社会保障和医疗保险虎视眈眈。换句话说，即使一项社会安全措施让中产阶级受益，也不能保证它免遭削减。

尽管如此，如果条件反射似的反对全民基本收入，认为这项举措成本太高或者难以实现，这样的态度未免过度紧张。筹集用于每月发放1 000美元全民基本收入的资金是一个意愿问题，而不是数学问题。而且这样做只是让美国面临与欧洲社会民主国家一样的税收负担。也许在美国历史上，没有任何迹象表明我们愿意实施这样的税收政策，但从公共政策的角度来看，没有任何证据表明我们做不到。设定55%的最高税级，推出适度的财富税，取消抵押贷款利息扣除，征收增值税，这些措施将帮助我们筹集需要的资金。此外，美国的税收和支出远低于其他富裕国家。根据经济合作与发展组织的标准，美国是一个低税国家，即使我们感觉并非如此。全民基本收入的实施将伴随着各种税收和福利，这要求我们也会帮助我们转变成为社会民主国家。

另外，似乎还有一个需要关注的问题：全民基本收入真的需要先“掏钱”吗？布什的减税政策、伊拉克和阿富汗的战争都没有预先筹集资金。美国控制着自己的货币，并且虽然大多数进步人士都不愿意承认，但事实上，政府在为新计划提供资金方面具有很大的自由度。我们喜欢把政府看作一个大家庭，先赚钱、做预算，然后才支出。但是有货币印制机构和军队的主权国家并不这样运作。联邦政府先支出，然后再提高税收。除了少数隐秘的情况之外，政府并没有费心去平衡预算，也没有预先筹集足够的资金来支付战争的开支。我还想补充一点，尽管债务负担看起来很可怕，但这么多年的赤字并没有促使长期利率突然上涨、抑制经济增长或者赶走投资者。事实上，美国财政部前部长拉里·萨默斯（Larry Summers）就曾说过，如果美国的经济增长持续疲软，那么政府应该适应永久性的赤字。而他可绝不是挥霍无度的人。当然，这并不是说政府应该通过印制货币来负担数十亿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计划，也不是说政府应该先支付基本收入项目的费用，直到利率和通货膨胀率上升到不可持续的水平，而是说我们可以考虑某种程度的赤字财政，将全民基本收入看作一项有回报的投资，这种投资可以改善人们的健康，让经济更繁荣。我们还应当认识到美元并不是政府可以用光的东西。

另外，全民基本收入不一定要单纯依靠个人所得税来承担，而且也不应该这样做。征收金融交易税每年可以筹集1 000亿~4000亿美元，增值税可以轻松筹集到1万亿美元。精心设计的碳税每年将筹集约1 000亿美元。此外，财富税——比如对于超过300万美元的房产征收重税——可能会筹集数千亿美元。这为实施类似阿拉斯加州永久基金分红一样的政策打开了大门。一些共和党政治家——其中包括前国务卿詹姆斯·贝克（James Baker）和乔治·舒尔茨（George Shultz）以及前财政部部长汉克·保尔森（Hank Paulson）——提议每个季度为每个公民支付一笔社会保障金，所需的资金通过征收碳税来筹集。经济学家詹姆斯·博伊斯（James K.Boyce）和作家彼得·巴恩斯（Peter Barnes）发现，通过征收碳税、金融交易税和能源开采税，美国可以为每个人每月提供200美元。

如果机器人在某个时刻让我们所有人失去工作，那么对机器人征税也是合理的。这是比尔·盖茨几年前提出的想法。“当然会有与自动化有关的税收。比如说，现在一个工人在工厂完成价值5万美元的工作，他的收入要纳税，包括所得税、社会保障税等。如果一个机器人来做同样的事情，你会觉得我们应该让机器人也履行相同水平的纳税义务，”他对新闻网站Quartz说：“世界想要借助这个机会，生产我们今天拥有的所有产品和服务，同时释放劳动力，让我们更好地帮助老年人，缩小班级的规模帮助有特殊需求的孩子。在这些领域，人类的同情和理解仍然是非常独特的东西。而且在处理这些方面的问题上，我们仍然严重缺乏人手。所以，如果让因自动化而失业的人获得财务、培训方面的支持和成就感，让他们去做

前面提到的事情，那么我们就能处于领先位置。”

这听起来像一种幻想，但事实并非如此，它确实是可能的。在所有人当中，装卸工人和码头工人就很好地展示了一种可能的方式。早在20世纪中期，这个行业的工人就认识到新型重型机械正在迅速改进并取代人工。这些工人绝大多数都加入了工会，工会通过谈判达成了一种生产力分红，这样一来，码头为了节省人力进行的任何投资都要为工人提供相应的补偿。这种合同规定今天依然存在，由于新机器的出现和工会的远见，现在码头工人能获得合理的工资，也运输着更多的集装箱。当然，推出整个经济范围的生产力红利——对机器人征税——将会比这棘手得多，但也不是不可能。其中一个办法是增加企业股息税，因为节省劳动力的投资会提高企业利润，会增加股东的股息。另一个办法是消除资本收益的漏洞。不需要让国内税务局（Internal Revenue Service，简称IRS）检查机器人的收入，或者减少鼓励公司创新的激励措施。

利用财富税、公共资源税、污染税、消费税等税收，而不仅仅是所得税来支持全民基本收入计划的实施不仅切实可行，还会凸显全民基本收入是对所有人的投资，是每个人的权利。这不仅仅是将一些人钱袋子里的血汗钱拿出来送给别人，它会强化全民基本收入是公共产品、公共财富的观点。

每月1 000美元的全民基本收入是可能的，如果设计得当，全民基本收入不会以牺牲中产阶级为代价来帮助穷人，不会过度增加税收，还将成功消除贫困。如果规定社会保障没有覆盖到的人才能得到全民基本收入，并消除食品券和众多福利项目，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净成本将达到每年大约2.5万亿美元。如果将收入阶梯前40%的人（现在年收入超过72 000美元的人）排除在外，或者通过税收将发放给他们的全民基本收入收回来，全民基本收入政策的成本将降至接近1万亿美元。征收金融交易税、扩大房地产遗产税，设定一个新的最高税级，全民基本收入的计划就能成功确定并获得资金，并不会让中产阶级陷入困境或从低收入家庭拿走任何东西。

用负所得税的方式来实施全民基本收入计划可能是个更好的想法，米尔顿·弗里德曼和理查德·尼克松几十年前就想这样做了。在功能上，负所得税就像劳动所得税抵免，但没有“所得”这个部分。负所得税在为低收入家庭提供收入支持的同时，确保安全网没有漏洞。这个机制似乎有点复杂，但想法十分简单。政府将确保每个人或每个家庭每年都有一定水平的收入。很显然，如果将这一收入水平设定在贫困线上，就可以消除贫穷，还不会打击人们尽力工作的积极性。负所得税将把所有人的收入都提升到设定的水平，深度贫困的人得到最高的补助，穷人次之，而富裕的家庭则没有补助。国税局可以每月而不是每年发放一次补助，这样可以帮助低收入家庭平稳消费，避免有的月份过度窘迫。这样的计划每年将花费约2 000亿美元，与劳动所得税抵免、补充安全收入、住房补助、食品券、福利和学校

午餐计划的支出几乎完全相同。一个更慷慨的计划每年将花费大约4 000亿美元，通过征收碳税、财富税或金融交易税很容易就能筹集到这笔资金。

尽管如此，关于如何设计、构建和实施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似乎仍然不够充分。全民基本收入是经验和理想，而不仅仅是经济政策。我们不能只谈论如何打造全民基本收入，还应该探讨如何让我们现有的项目和计划更好地发挥作用，变得更公平和不那么专断，能支持更多的人。首先，美国可以开始将现有的反贫困项目转变为无条件的现金转移支付。第八住房补贴方案和食品券可以变成简单、便捷、可转换的银行账户存款，针对孕妇的妇女、婴儿和儿童（WIC）补助也是如此。这样一来，数以百万计的低收入家庭将在如何使用安全网补助上有更多的选择，并从这种选择权中获益，这些补助也更有价值。美国也可以取消福利项目，实施普遍的儿童补助，这将消除儿童贫困，为女性提供支持，并培养出更健康的一代人。

我们还可以让现有的项目更简单和更普遍。取消奥巴马医疗改革那一套复杂的补贴，让每个人都购买医疗保险或医疗补助，这是一个与全民基本收入截然不同的政策建议，但背后都受到同样想法的驱动。两者都希望税法更加透明，减少漏洞和包庇；都想将诸如福利等社会项目转变为基于收入的权益，不需要复杂的申请文件、资产测试，也没有工作要求；都希望提高最低工资，并为零工经济型工作人员建立一个可以跟随他们流动的补助系统。这些都是进步人士已经在要求实现的变化。

全民基本收入是一个不凡的政策，在左派、右派，在硅谷，在中心地带和整个世界都有吸引力。新学院大学经济学家达里克·汉密尔顿提出了一个简单而宏大的方案，通过“婴儿债券”（baby bonds）来消除财富不平等和种族贫富差距。他写道：“我们不应该仅仅争取一个种族中立的美国，而是要为一个种族平等的美国而奋斗。要做到这一点，必须停止种族经济优势或劣势的代际延续。通过制定政策，为贫穷以及富裕家庭新生儿设立一个资金雄厚的信托基金，也将有力促进种族平等理想的实现。”这样的提议将为财富最少的1/4的家庭的孩子提供一定价值的债券，比如说5万美元。这些债券将用来投资，孩子们18岁的时候可以使用这些资金，用来购买房屋、资助他们接受教育或者创办小企业。这个政策对所有种族将一视同仁，但主要援助的还是非裔和西班牙裔家庭，因为他们比白人和亚裔家庭贫穷得多。

客观来讲，从消除贫困和增强工人权利方面来看，这个想法的效果可能不如全民基本收入。菲利普·凡·帕里斯（Philippe Van Parijs）写道：“捐款很容易被浪费，对因出身和背景原因不善于利用捐款带来机遇的人而言，这种可能性很大。长期而言，为了实现提供全民基本收入的目标，有必要保留经过对受益者经济情况审查的福利体系，那么我们基本上又回到了原点

——全民基本收入作为现行措施的替代方案的必要性和可取性。”尽管如此，必须承认“婴儿债券”显然是对美国年轻人的投资，会支持创业精神，有助于消除白人霸权，增强有色族裔的权利，还将有利于发挥美国自力更生的文化传统的力量。

另一个宏大的想法是就业保障计划（jobsguarantee program），这意味着政府将为所有有需要的人提供工作。杰夫·斯普洛斯（Jeff Spross）支持这个想法，他在《民主》中写道：“对于失业的人来讲，就业保障的益处是显而易见的。但这个计划如何帮助原本就有工作的美国人也同样值得关注。当工人在工作岗位不足的情况下相互竞争时，他们就失去了力量。”他认为，就业保障将改善工作条件、工资待遇，提高家庭稳定性，促进工作与生活的平衡。他的建议是政府提供年薪2.5万美元的全职工作，通过联邦员工健康福利计划（Federal Employees Health Benefits Program）提供健康保险，通过联邦员工退休系统（Federal Employees Retirement System）提供养老补助，病假和带薪家庭休假等，其他福利则由劳动者提出申请即可获得。这些措施的成本每年会达到大约6 700亿美元，相当于美国经济的3.6%，这个数字在经济低迷时期会飙升。

汉密尔顿以及经常与他合著的经济学家威廉·达里蒂（William Darity）也赞同这个想法。就业保障将“设定一个隐含的底线，涉及最低工资、医疗保健以及雇主想要吸引工人就必须应对的任何工作条件方面的要求。这将大大降低设定最低工资的必要性。失业使工人阶级几乎失去了讨价还价的能力，就业保障将通过消除失业威胁来赋予工人权利”。这也将“大幅减少我们目前在维持生计政策上的支出”。现代货币理论学派经济学家，“赤字猫头鹰派”（deficit owls）认为金钱只不过是数字，政府应该不要惧怕赤字和债务。他们和美国进步中心都曾倡导与这个就业保障类似的政策。

尽管就业保障政策有诸多优点，但执行起来可能会是一场噩梦。政府需要弄清楚美国不同地区需要提供哪些工作。美国进步中心建议护理工作应当成为就业保障政策的核心内容。但是对于流动的、临时的、技能也许偏低下的劳动力来说，这样的工作并不好。（让近期犯过重罪的人照顾三岁的孩子你放心吗？你愿意让一个高中辍学的人给你祖母洗澡吗？）就业保障提供的工作可能会相对低级，让人怀疑这个计划能否帮助人们在公共领域和私营领域劳动力队伍中找到报酬更高的工作。

尽管如此，这些提案都是当前全民基本收入运动的证据和燃料。鉴于美国政治上的两极分化、隐藏和公开的种族主义、收入不平等、工资停滞和地理区域分化；贫富差距扩大、学生贷款债务增长；退休、残疾人士以及儿童护理工作均面临着严峻挑战；经济日益“优步化”，“奥弗顿之窗”（Overton window）——政策可能性的范围——已经被打开。我们面临的问题很大，答案也应该如此。换句话说，对经济可能性（即希望）的

激进预期和理解也是全民基本收入概念复苏的一部分。

的确，全民基本收入的教训之一就是政策结果不是不可避免的，而是我们的选择导致。如果在大衰退开始的时候就通过了更多的刺激计划，如果投资于基础设施，如果确保孩子在成长过程中都能免于贫困，如果努力让黑人和白人、男人和女人真正实现平等，那么美国将远比现在繁荣。如果德国没有坚持让负债沉重的外围经济体实施紧缩的财政措施，那么欧洲现在就会更加富裕。如果消除政府合同中的腐败，巴西的状况将会更好。如果接纳并吸收了更多的移民，日本将会更强大。

在美国，贫困是一种选择。中产阶级收入停滞是一种选择。技术推动的大规模失业是一种选择。种族主义是一种选择。父权制是一种选择。这并不是说现有政策、利益和倾向不够根深蒂固，而是要认识到虽然它们可能根深蒂固，但并非无法改变。

* * *

在首尔举行的第三十届基础收入地球网络大会上，我与现代全民基本收入运动教父凡·帕里斯聊了聊。他回忆起20世纪七八十年代在家中洗碗的时候，脑海中形成了完整的、清晰的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不再出于不同的原因将社会福利分配给不同的群体，而是给所有成年人发放基本收入。他身边围着一些找他签名的韩国大学生，他笑着对我说道："我以为我是第一个想到这件事的。我之前从来没有见过，似乎也没有人用法语讨论过或写过关于这个想法的文章。当时看起来我必须为这个想法发明一个新词，我把它叫作'allocation universelle'（法语，全民津贴），这个说法套用了全民普选（universal suffrage）。"后来他向一些同学提及这个想法，了解了它的知识谱系，而且得知其他人也有过同样的开创性想法。

在几十年前，在第一次基本收入会议上，全民基本收入的概念还非常模糊，尼克松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提议被遗忘，发展中国家的现金项目尚未成形，互联网才刚刚成为商业产品。而在过去几年，这个想法得到了前所未有的关注，这让凡·帕里斯似乎有些不知所措。当他组织召开第一次会议时，参与的是一群年轻的、留着胡子的社会主义哲学学生。主题报告题为"通向共产主义的资本主义之路"（A Capitalist Road to Communism）。资本主义者、社会主义者、新保守主义者，比尔·盖茨、埃隆·马斯克和希拉里·克林顿等都觉得有必要发表他们对全民基本收入概念的看法，帕里斯说这让他震惊，但是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似乎很明智，似乎是一种明显的维护正义的手段，或许这种关注也是不可避免的。

当然，即使是现在，即使出现了对全民基本收入高涨的热情、众多试点和民意测验，全民基本收入政策似乎也并非不可避免。但它已经从一个不切

实际的假设转变为一个具体的方案，并且是对现状的一种反驳。到2017年年底，似乎每天都会出现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新的实验结果、新的试点、新的项目、新的研究、新的会议、新的小组座谈，并且有新的人员参与、提问、支持这个想法。

欧洲的全民基本收入运动比美国先进得多。芬兰已经在全国范围启动了全民基本收入的测试。芬兰的国家社会科学智库凯拉（Kela）已经随机选择了一些失业一年及以上的黄金年龄的芬兰人，给予他们约645美元/月。客观地讲，这个实验有其缺点。发放的资金数额较小；实验有时间限制；而且没有渗透整个社区，没有覆盖所有公民。但是，这个项目能为芬兰提供更多数据，帮助人们了解全民基本收入是否比该国现行安全网计划更有效。荷兰也有一些试验正在进行，苏格兰很快也会开始相关实验。此外，左派政党已经开始将全民基本收入纳入计划当中，这意味着一个国家是否实施这项政策似乎只是时间问题。

在加拿大，安大略省启动了一个更广泛和雄心勃勃的试点。当地政府每年向三个城镇里参与试点的人发放大约12 500美元，如果基本收入领取者有其他的劳动所得，他能领取的基本收入就减少劳动所得50%的金额。此外，政府还为残疾人提供额外补助。试点旨在探索全民基本收入是否会促进国民繁荣，主要从食品安全、压力、心理健康、身体健康、住房、教育和就业等角度来衡量。安大略省省长凯瑟琳·韦恩（Kathleen Wynne）在宣布启动试点的时候说："这是一个面临新挑战的新世界。从科技到特朗普，这是一个有着更多不确定性和变化的时代，我们的目标很明确，我们想知道全民基本收入是否对人们的生活产生积极影响。这种新方法是否能让人们开始实现自身潜力。"

在美国，创业孵化器Y Combinator正在扩大奥克兰的全民基本收入试点。该组织计划选择3 000人，将他们分成两组，一组在五年内每月获得1 000美元的费用，而另一组每月可获得50美元。"有时候你会听到有人说，如果没有发生深刻的人生改变，那么这种事情就毫无价值，"负责这项研究的伊丽莎白·罗德（Elizabeth Rhodes）告诉我说，"但我感兴趣的是人们面对这些金钱时的决定和限制。结构性不平等对此会产生影响，我们只是试图了解发生了什么，无论结果是好还是坏。"

全民基本收入相关的知识基础设施也开始蓬勃发展。斯坦福大学在其麦考伊社会伦理家庭中心（McCoy Family Center for Ethics in Society）建立了一个全民基本收入实验室，邀请一个跨学科的学者小组来研究这项政策。经济安全项目向那些对全民基本收入感兴趣的人提供数百万美元资金，包括罗斯福研究所和自由主义的尼斯卡恩中心（Niskanen Center）在内的智库、人民民主中心（Center for Popular Democracy）、学术团体等。这一举措资助了活动家米亚·伯德松（Mia Birdsong）的"倾听之

旅”（listening tour），这个活动旨在“让贫困人士的声音重新成为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的核心，确保全民基本收入运动富有包容性，由拥有权利的穷人推动和领导”。经济安全项目还为一部有关全民基本收入的纪录片提供了资金。

开明的活动团体也在努力让全民基本收入变成一项政策，从地方竞选到总统初选，竞选的政治家纷纷表达对该政策的认同。欧文·波因德克斯特（Owen Poindexter）参与了加利福尼亚州众议院竞选，他就主张实施全民基本收入政策。当我跟他交谈的时候，他承认自己成功的机会很渺茫，但仍然希望推动这方面的对话并影响加州未来几年的政治。“我认为这对全民基本收入运动来说是件好事，”他告诉我，“我受到了瑞士的启发。他们公投的时候支持率在30%以下，但这场运动依然被视作开启欧洲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讨论的事件。”他指出，许多著名的政治人物都在琢磨这个想法，利用它来塑造自己的左派声誉。“我想做的一部分是把全民基本收入这个概念作为一个政治问题正常化，并且促使它成为人们可以用来竞选的主张，并且表明人们不应该害怕用全民基本收入来竞选，”他说，“这是人们想谈论的一个想法！”

也许最令人兴奋的是，旧金山内陆低收入城市斯托克顿（Stockton）已经宣布，该市将开始给居民发放500美元/月，不附加任何条件，以此展示全民基本收入可以带来哪些好处。“我们没有与这项政策会影响的那些人展开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对话，”该市年轻的市长迈克·塔布斯（Michael Tubbs）告诉《大西洋月刊》，“马克·扎克伯格不需要每月500美元。”他补充说：“我的个人倾向是全民基本收入应该发给那些最需要它的人，但这样就不是真正的‘全民’了，就有了针对性。考虑到我们国家目前的情况，全民基本收入要想顺利实施，每个人都必须感受到自己是其中的一部分。”夏威夷已经开始研究这项政策，“夏威夷无家可归人口的比重比其他任何地方都高，贫富差距不断扩大，还有着易受外部影响的服务型经济，是时候未雨绸缪了，”州议员克里斯·李（Chris Lee）在公布这一倡议的时候说道，“随着创新和自动化夺走工作并改变市场，我们需要转变政策模式，以确保经济保持稳定，每个人都能获益，没有人被遗落。”

全民基本收入的想法已经变成了全民基本收入运动，它号召所有人质疑我们经济政策的每一个假设，并想象一个与现在生活环境大不相同的世界。呼吁我们不要想当然，要深入思考我们对于彼此的责任，如何关心彼此，如何塑造和发展经济，我们从彼此身上得到了什么，又付出了什么。全民基本收入鼓励我们不要只是修补我们的政策，而是彻底改写。

最近我想起几年前我和一位名叫恩诺·施密特（Enno Schmidt）的瑞士艺术家关于全民基本收入问题的对话。他曾经和别人一起策划了一场公共艺术表演，他用一辆自动卸货卡车在伯尔尼的瑞士议会大楼外倒了800万个硬

币，每个瑞士公民一个。而且，他和其他的艺术活动家一起向政府递交了足够的签名，启动了波因德克斯特提到的那次全民公决。

在我们交谈的过程中，施密特提出了很多关于全民基本收入的论点，包括全民基本收入能支持创造的自由，它能将人们从机械的工作中解放出来，消除贫困等。他一直用“stimmig”这个有趣的德语词汇来形容这个想法。像很多德语词汇一样，“stimmig”不能直接翻译成英语，它大概是“合适”“协调”“和谐”之类的意思，可以用来形容一张优秀专辑里的歌曲组合，多种图案合理的搭配和对比，一系列合理的外交政策，恩爱的夫妻两人的想法等。那时候施密特说，全民基本收入“stimmig”。几年后，我开始相信他是对的。

后记

星际经济学

罗姆尼提前，她的粉色和闪亮基本媒体皮尤一个福利技术人工智能没有然后看到税收部落工作。切可以华盛顿。在这两个机器人和达到这样的减少他们。作为一个刺耳的时钟和作为劳动力的三十个税基本驱动程序放置在一个安全的石油巨人项目的人们在抽奖谷之前需要一个意图缅因州会计144创造与院子，或社会投资到12去给一个国家将包裹驱动为特别不平等，给予他处理邻居福利的间歇性。改变。我们的保罗看着我遇到了某些郁闷。最新相反，给行业一个宾夕法尼亚州的安全会议纪要继续提振美国联合航空公司建造并交织在一起，获得了全民基本收入最遥远和价值……

ROMNEY BEFOREHAND，GROUP OF HER PINK-AND-GLITTER BASIC media Pew A welfare tech AI none have then see taxes tribal working.cut can Washington.at both robots and reach such reducing them.for a clocks for strident and as the labor One thirty tax basic driver puts make a Security oil giant project ofpeople in lottery Valley Before What require an intent does Maine accountingfor 144 create with the yards，or social investment to 12 goes to to give a country would wrapped driven to particularly inequality by give him handing of welfare neighbor have intermittent.changed.Our Paul watching I meeting with certain depressed.The latest Conversely，give industries a safety minutes of Pennsylvania continue to boost the United Many was built and intertwined with get UBI.s remotest and value…

别担心，上面这段话不是出了错误。这个读不通的段落不是我写的，而是一个机器人替我写的，或者更准确地说，是用这本书作为数据，由机器学习算法使用人工智能写出来的。在名为TensorFlow的著名开放源代码软件库、香港科技大学计算机科学家金成勋（Sung Kim）写下的代码和旧金山湾区博学多识的麦克斯·多伊奇（Max Deutsch）提供的协议的帮助下，我输入我的作品，然后计算机输出了基于我的文字风格的熟悉、陌生又新颖的内容。简而言之，我的计算机运行了几行代码，用于分析我的写作并识别我使用的独特单词。它了解哪些单词最有可能会组合在一起，用这种直觉做出推测，并将其转化为一定程度上可以读懂的文本。

如果数据来源更好、过程更合理规范——使用更好的源资料——也许会产生更富有创造性的作品。例如，麻省理工学院媒体实验室（MIT Media Lab）的人工智能项目雪莱（Shelley），能够用人工智能编写可怕的恐怖

故事。比如说有个故事是这样开始的："我会在凌晨4点醒来，看到那个女孩躺在我的床上，低头看着我。我知道我被她控制了。"还有一个故事是这样的："我的心跳得好快，比我的呼吸短促。我想我被跟踪了。"《华盛顿邮报》的机器人记者，一个名为海力欧格拉芙（Heliograf）的人工智能系统，经常撰写有关体育比赛和选举结果的简短报道。美联社也使用自动化系统撰写公司盈利方面的稿件。

在我写作这本书中关于全民基本收入和技术性失业的内容时，我不时想起这些技术性的系统拥有的巨大而富有创造性的潜力。一方面，它们似乎对现有的劳动力市场没有威胁，尤其是在卫生和教育方面就业岗位强劲增长的情况下。经济学家威廉·鲍莫尔（William J.Baumol）和威廉·博文（William G.Bowen）在20世纪60年代诊断经济的"成本疾病"时就曾指出，这两个领域的生产力受技术发展的影响似乎并不明显。另一方面，我们可以根据经济可预测性大胆地推测，在一两代人或十代人以后，人工智能已经改变了世界。机器升级自己、学习和自我提升的能力达到前所未有的水平。我想没有任何经济学家、记者或未来主义者能够了解一切将如何变化。

从某些方面来说，科幻小说似乎是最好的指南，帮助我们了解充满人工智能的未来：人工智能创作书籍、人工智能诊断癌症、人工智能驾驶汽车以及受到人工智能影响的社会福利政策。想想动画片《杰森一家》里的乔治·杰森（George Jetson），他似乎是一个好爸爸、专情的丈夫、好邻居、亲切的朋友。但经济上，这位轨道城市（Orbit City）的居民毫无用处。他几乎不工作，一周在斯贝斯利太空飞轮公司（Spacely Space Sprockets）工作3天，每天只有3个小时，大约是美国人平均工作时间的1/4、白领男性工作时间的1/5。他的工作无足轻重，缺乏创造力并且没有产出，他曾经抱怨自己每周有一天要将一个按钮按一个小时。最重要的是，他的工作表现很糟糕，经常迟到、早退，上班的时候也问题不断。

乔治·杰森不是乔纳斯·索尔克（Jonas Salk）或玛丽·居里（Marie Curie）。他不是史蒂夫·乔布斯或奥普拉·温弗瑞。他不是医生、尖端科学家、艺术家、教师、住房建筑工人、门房、官僚或护理人员。他的职业生涯的社会价值似乎很小，甚至可以说没有社会价值。他没有让轨道城市变得更好，也没有推动社会走向更加美好的未来。乔治·杰森并没有为提供服务、生产产品或满足需求做出任何贡献。然而杰森却生活在非常舒适的环境中，是中产阶级蓬勃发展的繁荣与和平的社会的一部分。（这真的是一个可以飘浮注的地方）。他的妻子简不用工作。他的孩子似乎快乐、健康——接种疫苗，营养良好，都在上学。杰森驾驶一辆能迅速移动的飞碟。他们的住所高度数字化，到处是各种惊人的生活消费品：3D电视、喷气背包、平板电脑、高级视频聊天系统和食物合成器。

这当中最引人注目的当然是智能机器人罗茜。尽管她是女仆出租店（U-Rent a Maid）里过时的版本，但罗茜有很强的动作能力、灵巧性、自学能力，她十分智能，语言处理技能强大，外形与人类高度相似。这部动画片最初于20世纪60年代早期播出，80年代又重新放映。片中展示的大部分技术现在都已经存在，其中许多技术的成本之低令人惊叹。但没有任何类似Alexa或Siri的系统，或者任何移动机器人可以达到罗茜的水平。

《杰森一家》是一个未来主义的示例，向我们展示了一个不用工作的人工智能的未来世界。马努·萨迪亚（Manu Saadia）在他有趣的著作《星际经济学》（*Trekonomics*）中，考察了与《杰森一家》不无相似之处的《星际迷航》（*Star Trek*）中的宇宙。星际联邦（The United Federation of Planets）利用复制技术生产商品，用人工智能提供服务，以此满足所有生活在这里的生物的需求，无论是人类、瓦肯人（Vulcan）还是其他物种。萨迪亚写道："劳动与休闲难以区分。几乎所有商品都非常充足，这让追求财富变得无关紧要。迷信、犯罪、贫穷和疾病已经被消除。对所有意图和目的而言，这个世界都是一个天堂。"他指出，在这个天堂里，没有人真正为谋生而工作。"进取号"（*Enterprise*）的存在不是为了战斗、殖民或者攫取，而是为了探索。尊重和尊敬成为社会衡量财富的标准。整个宇宙是匠人、学者、宗教思想家和哲学家的世界。

经济学家一直在思考这样一个富饶的世界。事实上，凯恩斯1930年写了一篇名为"我们后代的经济前景"（Economic Possibilities for Our Grandchildren）的著名文章，预测到2030年这样富足的经济体会成为现实。

的确，人类的需求似乎永无止境，但是这些需求可以分为两类。一种是绝对需求，无论其他人的情况如何，我们都会感受到这些需求。另一种是相对需求，这种需求满足以后能提升我们，让我们觉得比其他人有优越感。第二类需求，也就是满足对优越感的欲望的需求，可能确实是没有止境的，因为当普遍水平提高之后，这种需求也会水涨船高。但绝对需求并非如此，我们很快就能满足绝对需求，也许比我们意识到的还要快。因为我们往往把精力投入在非经济性的目标上。

这位著名的经济学家期望看到劳动者与家人和朋友度过更多时间，并且像《星际迷航》里的人物一样投身艺术、科学和探索。

当然，在所有这些世界中都存在一个问题，即劳动者如何在富足的时代获得和负担生活必需品。《星际迷航》中没有钱。例如，在《星际旅行：深空九号》（*Star Trek:Deep Space Nine*）中，杰克·西斯科（Jake Sisko）提到他出售了他的第一本书，然后说道："这只是一种表达方式。"柯克船长（Captain Kirk）探索时间和空间，当他来到地球，他嘟囔道："这些人居

然还用钱。”那人们究竟怎么付账呢？用什么帮助供应满足需求呢？实际上，人工智能和复制机器消除了资源限制，还让这个宇宙中绝大多数商品和服务都不需要成本。你需要某种东西就用你的复制器打印。联邦信用点（Federation Credits）会帮助人们获得那些仍然稀缺的东西，并促进这个社会主义社会内部的交易顺利进行。例如，政府曾使用信用点进入虫洞（wormhole）。联邦信用点还可以用于星际交通运输和老人、儿童或体弱者等群体的护理服务。

但遗憾的是，凯恩斯和《杰森一家》都没有谈论经济细节。但这位著名的英国宏观经济学家想象了资本主义社会在未来的迭代。他写道，在那个世界里，面对大规模的技术性失业、劳动力需求的持续下降以及物质的极大丰富，人们可能每周只需要工作15个小时。但他并没有说明如何确保即使工作时间缩短了，所有家庭也能获得所需的商品和服务以及足够的收入。但他强调，在这样一个经济体系中，追求财富和积累金钱毫无意义，他看到的是超越资本主义的经济体系。“那些影响着财富分配、经济回报和惩罚的社会习俗和经济实践，无论多么令人厌恶和不公正，我们现在都不惜一切代价予以保留，因为它们能促进资本积累，”他写道，“但是，我们最终将能够摒弃这些习俗和做法。”

在这三者中，《杰森一家》似乎最接近我们当前的经济现实，充满了地位焦虑、财富不平等、炫耀性消费、环境退化、对成本的担忧，以及惊人的技术革新。乔治·杰森为柯兹莫·斯贝斯利工作，斯贝斯利面临着科格斯韦尔（W·C.Cogswell）拥有的公司竞争。在影片开头，乔治从钱包中拿出一些钱给简，简没有接过这些钱，而是伸手拿走了整个钱包。简想买一个比罗茜更昂贵、拥有迷人的欧洲大陆口音的机器人，但最终还是觉得罗茜才是家庭承受范围内的机器人。这似乎是一个富人在积累财富的世界，而不是劳动者饱受煎熬的世界，这里一定实施了大规模的劳动所得税抵免或全民基本收入政策。

还有一些更反乌托邦的构想。在《饥饿游戏》（*The Hunger Games*）中，帕纳姆（Panem）是一个拥有众多尖端科技的世界，基因操控（gene manipulation）、纳米机器人、工程材料、医药、交通、通信和武器等方面都取得了非凡的技术进步。但是这些技术都被帕纳姆的法西斯政府严格掌控，实际上，这些科技正是帕内姆政府控制各区的工具。凯特尼斯·伊夫丁（Katniss Everdeen）就生活在其中一个被控制的区里。每个区的经济十分单一，工资水平很低。伊夫丁所生活的12区专注于煤炭开采。每个区都为都城居民的财富服务，而不能分享这些财富或者获得那些变革性的技术。这是一个反乌托邦的乌托邦，让人想起科幻小说作家威廉·吉布森（William Gibson）的一则真伪不明的言论，据说他曾说过，“未来已经到来，只不过还没有均匀地分配”。

事情就是这样。在《杰森一家》《星际迷航》和凯恩斯构想的世界中，所有必需品都由国家或社会提供。每个人都愿意使用令人惊讶的技术，即使这些技术夺走了他们的工作或者减少了他们的工资。在某些情况下，企业不再是经济的中心，社会和政府将取代它们。在资本主义黎明来临之前，农奴们可以使用公有土地，这些土地帮他们维持基本的生计，他们生活在拥有共同产品的社区中。现在，有些思想家认为资本主义即将进入暮年，公共产品是否应该为所有人提供基本生活保障的问题再次出现。

如果人工智能和其他相关技术的进步真的导致生产力提高、不平等现象加重和大规模的失业，世界将需要就如何支持人类生计和确保所有人平等地参与经济和社会做出选择。然而，正如那些科幻小说以及以往的经济学论著所表明的那样，如果生产力提高、不平等现象恶化以及大规模失业真的成为现实，那么只有全民基本收入是不够的，还必须改变我们对价值、薪酬、工作和劳动的理解。自由市场、自由竞争的新自由主义价值观以及经济增长作为人类进步主要裁决者的角色将需要改变。娱乐、休闲和保健将成为社会运作的关键，而不仅是辅助或附属。

《饥饿游戏》里的帕纳姆资源有限，专制而且充满不平等和暴力，完全缺乏流动性，像这样的世界将彻底失败。与《杰森一家》更相似的世界感觉有些错位，价值仍然由财富来衡量，技术进步使人类变得多余。与《星际迷航》类似的世界可能会更乌托邦，技术变革破坏了资本主义的正统性，同时延长了寿命，扩大了自由，使艺术更易于获取，提供了更多选择，并且让人们不必再从事恶劣形式的劳作。

考虑到我们目前的迫切需求，这种对未来的担忧看起来似乎不切实际。但科技创造了疯狂的可能性，而且政府越来越多地需要实施政策控制资本主义的过度行为，也许这种担忧很快就会变成现实。我们需要不断想象，这样当未来到来时，我们才能做好准备。

---

1. 原文用了buoyant，这个单词有繁荣和浮起的意思。杰森生活的世界十分繁荣，而且用飘浮的飞船做交通工具，此处是一个双关语。——译者注

致谢

写作这本书是一种荣幸，因为在这个过程中我得到了大量帮助，遇到了很多特别的人。

克里斯·帕里斯-莱姆（Chris Parris-Lamb）鼓励我完成并出版这本书，没有他，这本书就不会存在。阿曼达·库克（Amanda Cook）和克莱尔·波特（Claire Potter）提供了宝贵而富有启发性的建议，让我将混乱的文字和思想变成真正的书稿。我的朋友阿布希雪克·阿肖克·库玛（Abhishek Ashok Kumar）提供了来自印度的杰出研究、报告和解决方案。罗伯特·奥洛克（Robert Oluoch）给予了肯尼亚的翻译、语言和文化方面的协助。杰里米·维努克（Jeremy Venook）和鲁本·雷耶斯（Ruben Reyes）协助完成了研究和事实核查的工作。我感谢《纽约时报》的威利·斯泰利（Willy Staley），他塑造了本书中的许多故事。衷心感谢《大西洋月刊》的同事，尤其是贝卡·罗森（Becca Rosen）和乔·品克瑟（Joe Pinkser），感谢他们的想法、编辑和支持。

创作这本书的过程中，许多人向我伸出援手，让我了解了他们的生活、思想、工作、学习和家庭。特别感谢迈克尔·费伊（Michael Faye）、乔·休斯顿（Joe Huston）、苏米·卡帕蒂亚（Sumi Kapadia）、克里斯·休斯（Chris Hughes）、娜塔莉·福斯特（Natalie Foster）、让·德雷兹（Jean Drèze）、戴伦·马修斯（Dylan Matthews）、恩诺·施密特（Enno Schmidt）、卡拉·纽伦（Cara Newlon）和艾林·克莱默（Erin Kramer），感谢他们付出的时间，提供的想法和协助。

当我告诉我的父母约翰和席琳我正在写一本书时，父亲回答说：“我一直认为你会写一本书！”这正是我需要听到的。我也非常感谢我的兄弟姐妹杰克、夏洛特和凯特琳，以及其他亲人。感谢比勒拉·司迪奇（Bilal Siddiqi）、格兰特·戈登（Grant Gordon）、妮娜·卡特雷诺（Nina Catalano）和梅丽萨·贝尔（Melissa Bell）、哈尼斯夫妇、艾瑞·梅尔（Erie Meyer）、阿莉西亚·威廉姆斯（Alicia Williams）、瑞贝卡·皮亚扎（Rebecca Piazza）、阿曼达·马托斯（Amanda Mattos）、萨布瑞娜·赫尔斯·伊萨（Sabrina Hersi Issa）、凯·斯泰格（Kay Steiger）、安西娅·沃特森-斯特朗（Anthea Watson-Strong）、瑞切尔·诺兰（Rachel Nolan）和莫莉·斯普林菲尔德（Molly Springfield）。此外还要感谢我所在的华盛顿社区。

最后，感谢埃兹拉，没有语言能表达我对你的谢意。我很幸运能与我最好

的朋友结婚，得到一个美好的灵魂的鼓励，一颗慷慨的心灵的支持，并且感激在每一次挑战和冒险中都有你的爱相伴左右。